
石破茂的性格及领袖特质

——基于石破茂出演的日本搞笑综艺的分析

王家胤

内容提要 搞笑(お笑い)是日本特有的喜剧文化,主要特点为具有市井气息和审丑戏谑,因此在受到平民阶级的热捧时也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俗艺术。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曾多次登上日本搞笑综艺节目,这一行为在日本政客中是极不寻常的一点,结合石破茂本人在节目上的表现及其过往言论进行结合分析,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石破茂本人的性格及领袖特质,包括平民主义路线和冒险主义色彩,能解释其上台后的种种不寻常表现。相关素材在国内现有的对石破茂的研究中未有提及,其冒险主义色彩亦未有学者指出。因此,这一新的视角能打开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及社会动态研究分析的新视域。此外,考虑到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娱乐化”浪潮与日本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现状,新视域的引入能对未来的日本政治动态研判提供有益帮助。

关键词 日本文化 石破茂 搞笑综艺 日本政治

作者简介: 王家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其名作《娱乐至死》中指出媒介的形态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框架,并传导至政治层面后,大众传媒与政治活动间的关系便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并以布赖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的《政治传播学引论》一书作为标志,开启了媒体传播与政治活动间的交叉研究。^①领导人在不同媒介上所展现的形象是研究焦点之一,与此同时也构建出了以领导人媒体形象作为切入口对领导人的性格及领袖特质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后来,相关研究则利用人格测量、文本分析等方法,对领导人进行个体分析后推断其特质及对外政策。^②现有研究在领导人的性格特质与其对外政策方面的因果机制识别与竞争性解释排除方面尚有欠缺,但已较为充分地说明了对领导人的性格及领袖特质的分析,有助于对该领导人治下国家政治的动向进行把握,也体现了依据特定素材的个案分析有其学术价值。就日本研

①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Bert N. Bakker, “Personality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Behavior,”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Jack S. Levy, Jennifer Jeri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21–64; Jonathan W. Keller and Yi Edward Yang, “Decision-Making in U.S. Foreign Policy Crises: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Outcom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75, No.3, 2021, pp. 562–575; 李宏洲、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2 期,第 11–22 页。

究而言,也有学者对前首相安倍晋三做过人格特质及对外偏好的分析研究。^①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上台后的一系列讲话与行为均引发了外界的热烈讨论,如:表态不参拜靖国神社但迅速供奉祭品;发文提出“亚洲版北约”、“日美对等同盟”等概念;依宪法要求的最低时长解散众议院导致其上台伊始便遭遇巨大挑战;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多有不当……这些言行引起了种种非议。不过,石破的这些言行实际上早有端倪:许多日本政客会因为各种动机参演综艺节目,但大多为性质较为严肃的谈话类综艺,但石破会“放下身段”,参演绝大多数日本政客都避之不及的搞笑综艺节目,这方面的“与众不同”有助于我们对其性格及领袖特质进行特别的分析。沿着该线索出发并结合其过往言行等进行交叉印证,能对国内现有对石破和日本政坛动向的分析研判提供新的认识与补充性解释,拓展相关研究的视域。

本文首先对日本的搞笑(お笑い)文化及其衍生出的搞笑综艺进行分析,讨论石破参与此类节目的特殊性,并论证从这一视角对其性格特征进行分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随后,简要介绍并分析石破在日本搞笑综艺上的言行;最后,将石破在搞笑综艺上的言行与其在正式场合的言行进行交叉结合分析,得出石破的性格及领袖特质方面的一些结论,及相关视角的引入在未来日本研究中所能提供的帮助。

一、石破茂参演日本搞笑综艺节目的特殊性

日本的搞笑综艺源于日本特有的搞笑文化,具有市井气息和扮丑戏谑的氛围,与需要与公众保持适当距离、维护自身公众形象的政客的需求间天然存在着张力。本节先简要介绍其他日本政客的综艺参演情况并点明石破茂参演日本搞笑综艺的特殊性,随后梳理日本搞笑文化的发展史,并分析及日本搞笑综艺与政客需求间的张力,旨在说明石破茂参演搞笑综艺是带有显著个人色彩的、能体现其性格特质(至少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的行为,因而是对其人开展分析时所必须纳入视野的素材。

(一)日本政客的综艺出演现象^②

随着电视的视听语言成为人们认识论的一部分进而统摄世界,政治人物通过电视媒体塑造自身形象、传播自身观点成为了刚需。^③另一方面,日本政坛的“世袭化”和“派阀化”也饱受诟病,因此对于日本政客而言,出演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综艺节目不仅可以展现自己平易近人的亲民形象、提升人们对自己的好感度,也可以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使得许多政客都会出演综艺节目,但都是带有谈话类节目性质的综艺。诸如《北野武的电视抢答》(ビートたけしのTVタックル)和《上田晋也的周六新闻》(上田晋也のサタデージャーナル)这类专攻

① 张勇:《韬晦之“鸢”: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5-131页。

② 本节中参演情况统计数据源于Oricon News中的「芸能人-TV出演」,可见<https://www.oricon.co.jp>。

③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政论,但又因主持人是资深搞笑艺人而显得氛围相对轻松、受众更为多样的综艺,也受到许多日本政客的青睐。除此之外,还有《笑笑又何妨》(笑っていいとも)或《Downtown Now》这类同样由资深搞笑艺人所主持的综艺,虽然以娱乐作为导向,但其中的搞笑色彩并不浓厚,也会是一些政客的选择。本文将离日本搞笑文化距离较远、参演嘉宾并不以搞笑艺人为主的综艺归为“严肃综艺”,而以逗笑观众为主要目的、参演嘉宾以搞笑艺人为主的则归为“搞笑综艺”。

表1对日本政客的综艺节目出演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分类,按照日本政客参演综艺时的从政情况(正在从政中/离开政坛后)与参演综艺的属性(严肃综艺/搞笑综艺)进行了划分。由于日本政坛的相对不稳定性,对“离开政坛”的判定为此人明确表示不再从政,或离职后的政治活动显著下降。由于参演严肃综艺的政客颇多,此列仅写出几位较有代表性的政客。

表1 日本政客出演综艺情况分类简介

	参演严肃综艺	参演搞笑综艺
正在从政中	安倍晋三、小池百合子等	石破茂、东国原英夫
离开政坛后	小泉纯一郎、滨田幸一等	东国原英夫

来源:笔者自制

可以发现,由于参演综艺能在自我形象塑造及政治观点宣传上提供有效帮助,从首相级别的安倍晋三、小泉纯一郎到政治明星小池百合子及1996年就退出政坛的老政客滨田幸一等都会在综艺节目中出现,不过绝大多数政客所参演的综艺节目都是严肃综艺。最具代表性的是安倍晋三于2014年3月21日参演了由日本国民级搞笑艺人塔摩利所主持的《笑笑又何妨》,这是日本在任首相第一次出演综艺节目。安倍在节目中谈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表达了自己对综艺的喜好,并分享了自己两次执政的心态变化,表示“如果陷入负面思维中,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日本,所以要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开朗”,节目播出后虽然遭受了反对派的强烈抨击,但收视率最高达到了19.2%,民众的反响也较为积极。^①

据公开资料统计,日本政客中仅有石破茂与东国原英夫二人参演过搞笑综艺。其中,东

① 「「笑っていいとも!」に安倍晋三首相が出演「バラエティー見えます」」、The Huffington Post, 2014年3月22日、https://www.huffingtonpost.jp/2014/03/21/waratte-yurushite-abe_n_5004634.html, (2024年12月6日访问); 「「いいとも」出演?安倍首相 悪政ごまかし 笑っていい…わけない!」『しんぶん赤旗』、2014年3月22日、https://www.jcp.or.jp/akahata/aik13/2014-03-22/2014032215_02_1.html, (2024年12月6日访问); 「「いいとも」安倍首相、イチゴ会食で瞬間最高19.2パーセント記録!」『ジネマトゥデイ』、2014年3月22日、<https://www.cinematoday.jp/news/N0061662>, (2024年12月6日访问); 「笑っていいとも」、gooブロッガー、2014年3月21日、<https://blog.goo.ne.jp/y-ohmura-1866/e/02bd5156a1411efdaa408c1742cc1b1c>, (2024年12月6日访问)。

国原英夫是由搞笑艺人转行从政的,系日本搞笑巨擘北野武旗下搞笑艺人小组的成员,由于其过往经历,东国原参演搞笑综艺可谓是无可指摘,但也属于特例。除有相关演艺经历且仕途并不顺利的东国原外,参演的只有石破一人,且石破还算是一位高官。日本政客普遍参演综艺而又会避开搞笑综艺的一大原因,在于日本搞笑文化的内核。

(二)日本搞笑文化简介

日本搞笑综艺根植于日本的搞笑文化,而日本搞笑文化的主要特点为其发展历史所造就的市井气息和审丑戏谑。日本最早带有喜剧元素的艺术形式是“猿乐”,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经由中国传入的“散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①猿乐在之后分化出了“能剧”与“狂言”两种艺术形式,而喜剧部分主要被洗练进了狂言之中,使狂言成为了一种大量运用讽刺手法与庶民阶层题材与视角的喜剧艺术形式。^②尽管后来狂言同能剧一样成为了属于贵族阶层的高雅艺术,但也使得日本社会及文化中建构了喜剧与庶民阶层之间深刻的关联认知并影响至今。

和狂言一样,曾同带有庶民阶层的精神内核而如今成为相对高雅的喜剧艺术形式的还有“落语”。落语起源于室町时代末期,成型于江户时代,也具备浓厚的庶民阶层气息。虽然如今的落语在日本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下健康发展,但早期的落语表演被认为是在冒犯幕府,因此只能在暗中进行,这一文化代代相传,也使得如今的落语表演者需要对落语的庶民文化内核有着深刻的认识。^③狂言与落语在当下的日本具有较高的地位,但表演内容中依然保留了其起源和历史发展中所造就的浓厚的庶民色彩。如今最为流行、更为平民化的喜剧艺术形式“漫才”更是庶民色彩浓重,也使得以漫才为主要基础所发展出的当代日本搞笑成为了带有浓厚市井气息的俗艺术。

漫才起源于民间年轻男女求爱时的习俗,传入宫廷后演化为“万岁”这一艺术形式,之后又再传回了民间,发展成为一种比落语门槛更低的大众娱乐方式,后在20世纪由日本娱乐公司吉本兴业改良并推广壮大,不仅使得漫才成为了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艺术形式,也奠定了吉本兴业在日本娱乐圈的领导地位。^④在吉本兴业的运营下,叠加日本的电视行业热,还使得日本涌现出了短剧、新喜剧等新的喜剧艺术形式,使得喜剧演员大受民众欢迎,并能够登上综艺、时事评论等各类电视节目,孵化出了如今规模庞大的日本搞笑文化和产业。有

① 文化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能楽への誘いー歴史」,<https://www2.ntj.jac.go.jp/unesco/noh/jp/history/>, (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② 文化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能楽への誘いー歴史」,<https://www2.ntj.jac.go.jp/unesco/noh/jp/history/>, (2024年12月6日访问);刘建伟:《日本狂言戏剧的种类和结构》,载《上海戏剧》1990年第5期,第44-45页。

③ 岳永逸:《日本落语的传承与文化自觉》,载《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第18-30页。

④ 刘子越:《漫才笑料的认知分析》,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3月,第2-3页;茶乌龙编:《知日·完全笑点说明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相羽秋夫「「お笑い」の歴史」『笑い学研究』、1994年第1卷、12-14頁。

业内人士表示,仅吉本兴业一家经纪公司下就有至少 11 位艺人年收入超过 1 亿日元。^①

然而,头部艺人的高收入并不能掩盖搞笑文化的俗气与搞笑艺人的地位低下。搞笑的社会地位自其诞生伊始便相对较低,且绝大多数搞笑艺人还需要进行其他社会兼职方能维持生计。除了私生活方面的各类丑闻外,日本搞笑艺人还时常有涉黑演艺活动,使得普通民众对该群体有较为负面的整体认知。^②另一方面,歌手、演员等社会地位较高的演艺圈人士会被称为“艺人”(芸能人),而搞笑艺人则有特定的“搞笑艺人”(芸人)一称,从称谓上便矮人一等;^③其他艺人们在参加被誉为“搞笑界的红白歌会”的《24 小时绝对不准笑》(絶対に笑ってはいけない24 時)时,常会用“自己怎么会出演这种节目”来自嘲,而能参加这一节目对于搞笑艺人来说则是极高的荣耀。此外,日本搞笑综艺中明显的“审丑”特质也注定其难登大雅之堂:各类整蛊类搞笑综艺本质上就是低俗地看人出丑;被认为是日本综艺一大招牌的知名搞笑综艺《伦敦之心》(London Hearts)最为知名的栏目本质上是“仙人跳”;^④用“徒手下油锅”、“铁盆砸头”一类的戏码,以搞笑艺人自身痛苦不堪的反应制造笑料的“身体搞笑”时至今日依旧存在……上述元素使得日本当代搞笑文化带有极强的市井气息,扮丑戏谑作为其诞生伊始的内核也被继承了下来,相关节目及头部从业者虽然人气与收入均高,但社会对其整体观感不佳。虽然以逗人发笑为业的人的社会地位在各国都相对不高,但由于日本搞笑文化的特性,该现象在日本尤甚。

不过,新生代的日本搞笑艺人们也随着日本搞笑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转型,逐步开始以口才、金句作为自己的卖点,头部艺人的光鲜亮丽和高收入叠加入行的门槛较低,也使得在阶层相对固化的日本社会中不愿意子承父业的年轻人们愿意转向搞笑行业谋求新路,加之社会压力较大催生出的娱乐业需求,搞笑文化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人中间的受欢迎程度也不断增加。叠加综艺节目的观众往往并不会主动关心政治,这便让需要选票和支持率来源更为广泛的政客从中看到了机会与舞台。

然而,参演综艺节目对于政客而言亦存在着被指“不务正业”的风险。安倍晋三所参演的《笑笑又何妨》属于日本的现象级国民综艺,整体格调在综艺节目中属于第一梯队,尚且引发了一些争议,参演格调相对较低的搞笑综艺的风险更甚,这种风险源于政客与搞笑综艺间存在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张力。

① 「吉本芸人“億イレブン”以外に年収 1 億超え芸人は「さらに 4 人」その全実名『女性自身』、2024 年 6 月 13 日、<https://jsin.jp/entertainment/entertainment-news/2336569/>、(2024 年 12 月 6 日访问)。

② 片野利彦「2019 年の放送界概観」『ジャーナリズム & メディア: 新聞学研究所紀要』、日本大学法学部新聞学研究所編、2020 年第 14 巻、153-155 頁。

③ 由于二者的中译过于接近,下文出现的“艺人”全部指代非搞笑艺人外的其他类型艺人。

④ 《伦敦之心》的招牌栏目包括“恶魔短信”、“恶魔三角”等,内容为主持人遥控美丽的女性勾引男性艺人,或是试探有女朋友的男性是否会出轨,全过程都有摄像机在暗中记录,待对方上钩后再用话术诱导男方在镜头前吐露不堪言论以制造笑料。这使得中国台湾地区在引进该节目时将其译为“男女纠察队”。

(三)政客与搞笑综艺间的天然张力

搞笑综艺的核心目的是让观众笑,而笑的核心则是反差。康德和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在谈论笑为何物时,均认为笑的背后是反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笑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笑料中存在着的“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是不同的观念震荡后所形成的反差产生的心理活动;^①叔本华也认为,笑的根源是客体和概念的不相吻合,且二者之间的对照愈强烈,发笑效果也就愈强烈;^②日本学者兼搞笑艺人安部达雄在讨论漫才的时候也将漫才的发笑逻辑归结为不同概念间的强行类比所造成的反差感。^③搞笑背后的“反差感”、“错位感”正是政客与搞笑之间的深刻张力的根源。

喜剧往往讲究戏谑、讽刺上层或者解构权威,作为上位者的政客本身就是被戏谑嘲讽的对象,这一点在基于猿乐、狂言和落语等以讽刺为内核的喜剧艺术形式上发展出的日本搞笑文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政客而言,其在所负责领域的专业性、权威感和公众形象也需要建构,而搞笑则会对这些要素进行解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明确给出了领导人必须避免自己受到轻视的论断,而在日本搞笑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政客的搞笑行为无疑会让自己受到轻视。^④即使是在大众传媒、全民媒体的时代,公众人物可以通过展现自己的风趣幽默来提升风评,但这与主动地“搞笑”之间依然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其第一任期内的许多言行常被人调侃为在搞笑,但这些都是外界的评价,特朗普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主动搞笑,因而也没有自我矮化的嫌疑,且特朗普的“搞笑”言行与他实际的“严肃”间的反差,叠加其总统身份,正是其令人发笑的内核。

而且,日本与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文化也不同。目前市井气息浓厚的日本搞笑文化与搞笑艺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遍认知,都使得日本政客和这些人打交道会显得“有失身份”。事实上,除东国原英夫外,大多数日本政客出演的综艺,与其共演的搞笑艺人们都是业界数一数二的顶流大腕,而和这些顶流搞笑艺人共演已能满足政客构建亲民的、平易近人的形象的要求,也从侧面佐证了搞笑艺人与搞笑艺术的社会地位之低。石破茂也不例外,出演的都是日本顶级搞笑组合 Downtown 的王牌节目,多少弥补了一些内在张力,但石破在节目中一同表演的搭档均为一般搞笑艺人,这点与其明星政客的身份亦不相符。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搞笑的主要特点为具有市井气息和审丑戏谑,加之搞笑文化的社会地位较低及其与政客身份间的内在张力,虽然日本政客参演综艺节目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常年在日本政坛身居要职的石破茂参演相较于寻常综艺格调更俗的日本搞笑综艺的行为极不

① [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75-177 页。

②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0 页。

③ 安部達雄「漫才における『フリ』『ボケ』『ツッコミ』のダイナミズム」『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 3 分册、2006 年 2 月、69-79 頁。

④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87 页。

寻常,因而是在分析其人时需要关注的重要素材。

二、搞笑综艺中的石破茂

在本节先对石破茂的综艺参演情况进行简单梳理,随后着重介绍并分析石破在日本搞笑综艺节目上的具体出演内容,并结合当时的时局背景及其节目中的表现,对其参演动机进行分析。

(一)石破茂参演日本综艺的总体情况

石破茂参演过大量的日本综艺,不完全统计就有 43 档之多,包括了搞笑组合 DOWNTOWN 的《24 小时绝对不准笑》和《DOWNTOWN NOW》、《北野武的电视抢答》和时下由于女性主义热潮而大火的女艺人 Hikorohi 的《今日 korohi》(キョコロヒー)等。^① 在石破参演的综艺节目中,绝大多数属于其他政客也会参加的严肃综艺,虽然次数较多,但并非惊人之举。石破本人在 2017 年时对自己参演综艺节目的动机说法是:“让每天都很忙的普通人了解平时接触机会很少的领域,10 个人中能有 2 到 3 个人理解就足够了。如宪法、安全保障和地方创生。”^② 另外也有开拓自己视野的想法:“如果一味地接触令自己愉悦的知识和言论,就很容易变得视野狭窄、自以为是,必须要经常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爆笑问题的太田光先生的交流对我来说也学到了很多。”^③

不过,在这些其他政客亦有参与的严肃综艺中,石破茂的表现也与他人稍有区别:许多不知名政客上电视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明星则会更多地用来展示自己“普通人”的一面,如安倍晋三就在节目中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和麻生太郎的生活本质上与常人一般,但石破作为广为人知的日本国防专精官僚,却没有通过综艺节目这一有别于书籍、报刊的媒介平台来丰富自己的形象,而是继续强化自己的防卫省特色,并有意凸显自己在外交和国防上的造诣,且对这一专业形象的树立并不完全服务于自己的任职。例如,在 2016 年 3 月 25 日播出的《DOWNTOWN NOW》中,时任地方创生相的石破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与田中角荣的趣事,也讨论了朝鲜核问题等日本安全问题,而对于自己当下所负责的地方创生话题则未有提及。结合其在担任首相后发表的言论大多围绕日本的国家安全问题展开,可见石破本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始终与防卫相挂钩,即使已不在相关领域工作,也时刻准备着重在这一领域大展拳脚。

(二)石破茂两次出演《24 小时绝对不准笑》

石破茂与其他参演综艺节目的日本政客间的决定性不同点是石破茂曾两次出演《24 小时绝对不准笑》,且在该节目上的表现堪称“石破天惊”。该节目是日本搞笑组合 DOWNTOWN 的电视节目《DOWNTOWN 的不做小瘪三!!》(ダウンタウンのガキの使いやあらへんで!!)的年末

① 「石破茂」『ザテレビジョン』、<https://thetv.jp/person/1000024578/>, (2024 年 12 月 6 日访问)。

② 「バラエティ出演など」、水月會、2017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suigetsukai.org/20171228_ishiba/, (2024 年 12 月 6 日访问)。

特别跨年节目,定于每年的12月31日播出,亦有“搞笑界的红白歌会”之称。Downtown组合由松本人志与滨田雅功组成,其中的松本人志才华横溢,用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大地开拓了漫才艺术的题材边界,有着“搞笑之神”之称,也被认为是“日本搞笑的分水岭”,该组合的地位亦常年位于日本娱乐圈顶部。^①然而,松本也是日本如今的搞笑文化从庶民气息进一步下沉至市井气息的一大推手,日本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有对该组合及其主导的节目过于低俗的批评,旨在保障儿童身心健康的日本PTA全国协议会也将Downtown的节目明确列为“少儿不宜”,但松本并不认为自身的低俗是一个缺点。^②尽管该组合地位极高,但整体评价并不如前文所提到的北野武、塔摩利等其他顶级搞笑艺人一样以正面评价为主,而是颇具争议。

《Downtown的不做小瘪三!!》则是该组合的一档专属硬核搞笑节目,早期内容承袭了松本人志一贯的想象力和低俗,以各种具有市井气息的、猎奇的、审丑的方法进行搞笑,《24小时绝对不准笑》则脱胎于该节目2000年时的一项特别企划,在播出后受到观众的追捧成为了固定栏目并不断优化,后于2006年正式确定为年末特别节目,直至2020年由于Downtown组合的二人年事已高等原因而停播。随着收视率的不断提升,节目的档次也愈来愈高,成为了红白歌会外日本人的跨年电视节目首选,并开始转向合家欢类型,地位更高的艺人及一些文娱界大腕也开始参与其中。然而,该节目的底色及核心策划团队使其在不断发展中依然保持了“身体搞笑”、“猎奇审丑”等元素,非搞笑艺人在该节目中露面登场时也时常配有观众发出的“诶~”的画外音,强调反差感及其衍生出的意外感,侧面也反映出了这档地位极高的综艺的市井气息。

石破茂曾先后于2010年和2020年参演此节目。2010年时该节目尚处于发展期,虽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仅在日本搞笑界具有较高地位,鲜有艺人及跨界大腕参与,这也使得时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的石破的出现格外引人瞩目。如果仅从Downtown的资历及该节目的收视率和地位来看,石破登上该节目倒也不算有辱身份,但考虑到该节目的调性及政客与搞笑节目之间的张力,此举让人大跌眼镜。此外,作为非文娱界人士而参演该节目的也仅有石破一人。

2010年时,石破茂与搞笑艺人Jimmy大西搭档,共同表演了一段小品。Jimmy大西的演艺风格充满市井气息与审丑意味,以荒诞、愚蠢而自然的扮丑表现来引人发笑,日本坊间亦不乏对大西此人患有如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一类的精神疾病的传闻。^③该小品模仿

① 茶乌龙编:《知日·完全笑点说明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② 松本人志『好きか、嫌いか 松本人志の二元論』,集英社,2004年;松本人志『遺書』,朝日新聞社,1994年;「松本人志、ダウンタウンを“侮辱芸”と例えて葛藤を吐露「第三者が怒る世の中になってきた」」,excite News,2022年3月30日、https://www.excite.co.jp/news/article/Techinsight_20220330_868051/,(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③ 「特性を活かして好きなことを伸ばしたから?発達障害がある著名人」,Haru,2022年12月29日、<https://hirakata-haru.net/news/news-10503/>,(2024年12月6日访问)。

严肃的政论对话节目,由大西在小品中扮演“军事评论家”,石破茂则以自身身份出现,就日本的国家安全话题展开对话,具体内容如下:

石破茂在开场寒暄两句后展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长门号战列舰模型,询问大西这艘战舰的名称,大西答道“朝日新闻号”,石破茂询问缘由,大西说因为上面有“朝日新闻的国旗”,石破茂解释道这是日本海军的军旗。短短两句对话,就已经勾勒出了大西的荒诞与无知,奠定了该小品审丑与戏谑的基调。

石破茂之后直接切入“我国应该为了世界做些什么?”这一话题,并直接询问大西对于 PKO[全称为 Peace-Keeping Operation,即联合国维和行动,日本在 1992 年所通过的 PKO 法案允许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日本自卫队出国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也引发了违宪争议。]的看法,大西不知所云,石破茂追问大西 PKO 的全称,大西继续胡言乱语。

石破茂随后转换话题,询问大西对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看法,大西突兀地回了一句:“官僚们都在赌博。”石破茂对这一消息表达震惊后问大西从何处得知这一消息,大西说是首相告诉他的。石破茂继续问大西日本首相的名字是什么,大西回答是“菅单人”。^①

在直接嘲讽现任首相后,石破茂向大西确认:“这个‘菅单人’和‘菅直人’是同一个人吗?”大西对“菅直人”这个名字表达了一下困惑后,说自己“认识这个叫菅的人”。石破茂在白板上用汉字写下了菅直人的名字后,大西指着白板连连说“就是这个,菅单人”,并确认自己对官员赌博一事的信源就是他。石破茂再问“那这位菅先生有和你聊过什么别的烦恼么?”“关于他老婆的事。”石破茂顺着话问大西对菅直人夫妇怎么看,大西说他们是“假面夫妻”。石破茂向大西确认了他是否理解自己发言的内容,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表示自己不能再接着问下去了,小品也随之结束。

2010 年时的这段小品基于严肃的政论节目设定与大西荒诞的发言、大西专业的人设与不知道基本常识的表现、内行的高级政客石破茂与市井气息的搞笑节目这三种反差间的内在张力作为笑点,以对时任民主党政府首相的直接讽刺作为最大笑料,喜剧效果很好,但也充满了政治意味。需要说明的是,该节目为录播节目,且整段小品内容与节奏均十分紧凑,负责通过提问来推进流程的也是石破茂,因而可以认为石破完全了解小品的内容,不存在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严肃地和大西对谈的情况。另外,在《24 小时绝对不准笑》14 年的历史,含有政治意味的小品有且只有两段,因此先有该涉政小品的剧本后再邀请相应的嘉宾的可能性极低,可以进一步认为石破是这段小品的主策划之一。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该节目历史上

^① 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的名字发音应训读为“なと”,大西则按照音读念成了“ちよくと”,不仅是一个谐音梗,同时也有暗讽菅直人头脑过于简单、直接的意思。中国台湾的纬来电视台在译制该片段时将其译为“菅俗人”,本文按照谐音的元素与内涵,将其译为“菅单人(简单人)”。

另一段带有政治意味的表演就是石破 2020 年时第二次在该节目中的出现：

石破茂作为“达人秀”节目的评委出场，在“达人秀”这样的舞台上用政治话语及话题严肃地对表演者做出点评，以此引发的荒诞感和反差感作为笑点。石破茂甫一出场就被问起参与动机，石破茂严肃地表示“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会为了国民的接受感与认可感而真诚地努力。”这段氛围错位的回答的反差感立刻引发了笑声，内在逻辑亦有“参加这种节目怎么能获得国民的接受感与认可感？”的成分。

第一段节目是日本知名演员武田铁矢演唱该年十分流行的歌曲《香水》，另一位知名演员万田久子为其伴舞，主要笑点是这两位演艺圈大腕的身份，及武田铁矢的演唱风格与该节目和该曲目之间的反差感。石破茂点评时表示，万田的伴舞让他很感动，因为“万田女士对武田先生的保护就像宙斯盾战舰一样，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他人，这种精神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而言十分重要。”

第二段节目由搞笑艺人“中山肌肉君”主演，实力唱将小柳由纪现场为其演唱背景音乐《It's my life》，主要笑点是中山夸张地将芝士粉撒到错误的地方，及以小柳由纪的身份却来为该节目现场献唱所带来的反差感。由于《It's my life》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Bon Jovi)的代表作、中山与小柳的服装都有明显的美国国旗图案、小柳曾在 2000 年时的日美棒球国家赛前献唱两国国歌并引发轰动，故石破茂在点评时称“日美同盟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美国为矛、日本为盾……重要的不是单方获利，而是互相为对方着想。”

第三段节目是搞笑艺人口智充演唱《蒲公英》，笑点为山口一开始的人物设定是凶悍的刚出狱的黑社会头目与其开口演唱后活泼俏皮的表现间的反差。石破茂点评时用官腔说：“这是人生可以重来的最佳表现，我看到了他积极面对人生的赤诚之心，并为此深刻地感动。”

第四段是拳击手兼演员的片冈鹤太郎表演瑜伽术排毒，随后让两位丑闻搞笑艺人半裸登台道歉，并被滚烫的关东煮泼身，属于相对低俗的“身体搞笑”。在播出内容中未见石破茂对此表演发表评论。

在当代日本搞笑重要基石的漫才艺术中，一般分设“装傻役”与“吐槽役”两种角色，装傻役负责发表异想天开的言论，吐槽役则作为正常人指出其荒谬之处，并推进表演内容。^①因此，吐槽役的相对地位一般比装傻役高。石破茂在 2010 年的表演中扮演的实际上是吐槽役，而在 2020 年时则成为了装傻役，不仅是全面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与其政客身份间的反差也更大，从引导着别人逗观众笑变成自己让观众笑，从侧面体现了石破对于搞笑的接受程度

① 安部達雄「漫才における『フリ』『ボケ』『ツッコミ』のダイナミズム」『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 3 分冊、2006 年 2 月、69-79 頁。

极高。通过对石破所参演的搞笑内容的分析也可以佐证,反差是贯穿其中的发笑逻辑,喜剧对于严肃内容的解构能力也在这两段内容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而对于有志于成为日本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石破而言,这类会对他的权威性 & 领袖形象产生解构的演出是本应极力避免的,说明了石破参演搞笑综艺的行为并非是纯粹的个人理性判断,其性格因素所致的认知判断在相关决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而是分析其性格与领袖特质的重要素材。

(三) 石破茂参演搞笑综艺的动机分析

政客参演综艺节目的动机大抵都是为了向民众展示其意图展示的形象。^① 石破茂和其他日本政客参演综艺节目的主要动机一样包括了塑造亲民形象和传递个人政见。由于石破在自民党内派阀根基较浅,还有过退党经历,整体上在党内高层间并非很受欢迎,所受支持亦有限,因此石破长久以来都在强调自己的庶民路线,参演市井气息浓郁的搞笑综艺亦服务于此。石破在两次节目中发言的关键词“索马里海盗”、“PKO”、“宙斯盾战舰”和“日美同盟”则均和石破当时的主要政见有关:2010 年时,石破反对日本因索马里海盗问题而援引 PKO 法案进而派遣自卫队舰船;2020 年时,对于是否要通过建造新型宙斯盾驱逐舰以替代被放弃的“陆上宙斯盾”计划的问题,石破则在节目中表达了支持。在石破就任首相后所发表的,引发外界热议的对日美同盟的重新构想,也在该节目中清楚地表示过。石破在 2020 年的节目中所发表的人生感悟则疑似是对其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不敌菅义伟,遭遇第四次竞选失利后的心路。

强化自己的专业形象也是石破茂的主要动机之一。一如其在担任地方创生相时却在综艺上大谈自己在外交和国防上的认识一样,石破两次出演搞笑综艺时的发言主题也围绕着国防安全展开。2010 年石破在节目中亮相时,屏幕下方的头衔除了“自由民主党政调会长”外,还专门加上了“原防卫相”,他在小品开始时的自我介绍中也以原防卫相自称。虽然强调该职务也与小品内容和剧情有关,但经由前述对小品构成的分析可以认为,强调该身份应为石破参演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点与石破离开防卫省历任他职时依然在各种正式场合讨论日本的安全问题的行为一致,其在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期间参与的正式活动亦会采用“前防卫相”一称。^② 此外,石破两次出演中的内容中均体现了其有将日本外交与国防紧密联立的认知,这点亦可从其在 2020 年自民党总裁竞选中在外交领域中所提出的“DIME”战略,及其在担任首相后任命长期在防卫省任职的岩屋毅担任外相等诸多言行中得到佐证。^③ 2020 年时石破所扮演的装傻役角色,背后也有借喜剧的手法来刻画一个“满脑子想着国防安全问题的

① [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6 页。

② “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中国日报》,2010 年 8 月 31 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hqgj/2010-08/31/content_11233362.htm, (2024 年 12 月 6 日访问)。

③ “DIME”为外交、影响力、军事与经济四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石破茂在当时提出的日本外交战略思想,核心依然是推动安全保障。具体可见:「総裁選 2020 納得と共感、石破茂 外交・安全保障」、http://www.ishiba.com/sousaisen/gaikou_anzenhosyou/, (2024 年 12 月 6 日访问)。

痴人”的形象的意味。

此外,石破茂参演搞笑节目也有一定的投机因素。2010 年时石破在节目中攻击菅直人的三个段子均有深意:菅直人以对麻将狂热著称,拥有麻将得分计算器这一专利发明,亦有消息称菅直人在深夜依然不知疲倦地在网上打麻将,所以“官僚们都在赌博”;菅直人执政期间表现不佳,饱受批评,所以可见“头脑简单”;菅直人担任首相后,其妻子公然出版书籍披露菅直人的各种缺点,所以看似恩爱实则“假面夫妻”。^① 这些在国民级节目上播出的精心设计的段子迎合了当时民间对民主党政权的不满与怀疑情绪,并放大了相关传闻的负面观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民主党政权,也有石破为自己能在未来的民主党—自民党政权更迭之时更进一步捞取政治资本的考量。在近年来女性主义思潮迎来高峰时,石破茂也多次表达过与女性主义思潮相切的观点,在出演《今日 korohi》时对主持人 Hikorohi 的称赞也为其赢得了一些女性支持者,但其担任首相后内阁中的女性成员人数减少至 2 人,也可说明石破的相关言论存在投机性。^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石破茂多次出演 Downtown 的综艺节目,且 Downtown 中的松本人志也曾多次表达过自身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而这与石破茂所宣扬的政见较为接近。如松本在其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大日本人》中,表达了对日本发展的失落与反思,以及对美国阉割日本的国家主权、对日文化入侵等问题的思考,在《Downtown 的不做小瘪三!!》的常规节目中也隐晦地表达过对日美同盟现状的不满。^③ 石破上任首相后发表的施政演说及其之前发表过的对日美同盟的理想化调整构想,包括“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推进日本自卫队对驻日美军设施的共同使用”等政见也有同样的日本民族主义色彩。^④ 除此以外,松本也有着浓厚的

① 「理系出身の発明王?」『日本経済新聞』、2010年6月5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D-ZO08694850V00C10A6M10400/>, (2024年12月6日访问); 人民网:《麻将: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新华网,2014年10月11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10/11/c_127084453_2.htm, (2024年12月6日访问); 「菅首相の伸子夫人が新書出版 / この人が首相でよいの?」『四国新聞社』、2010年7月20日、<http://www.shikoku-np.co.jp/national/political/20100720000412>, (2024年12月6日访问); 《日本第一夫人著书调侃做首相的丈夫》, BBC中文网, 2010年7月22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0/07/100722_japanbook, (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② 高橋史弥「「男女フェアな社会」掲げた石破茂氏『女性活躍』が日本で進まない理由、どう語った?」*The Huffington Post*, 2020年9月4日、https://www.huffingtonpost.jp/entry/story_jp_5f51ce11c5b6578026cbd00d, (2024年12月6日访问); 「副大臣・政務官女性ゼロで 自民・石破氏「クオータ制も選択肢に」」『朝日新聞』、2023年9月15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R9H6VX2R9HUTFK027.html>, (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③ 见《ダウントウンのガキの使いやあらへんで!!》2023年4月30日期, 大致内容是节目常规出演嘉宾之一的远藤章造在高温酷暑下,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不停地唱跳歌颂美日关系的流行歌曲《U.S.A.》, 直到“有美国人被吸引过来为止”。该期节目意在嘲讽日本对美国的谄媚态度、日美同盟的不平等关系, 及表达对美国是否真的会在日本需要的时候出现的质疑。

④ 「第二百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石破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24年11月29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3/statement/2024/1129shoshinhyomei.html>, (2024年12月6日访问)。

庶民气质并为此自豪、时常语出惊人、对自己颇有自信,这些性格特质也有石破颇为相似。^①考虑到二人间的政见和性格较为相近的因素,他们可能颇为投缘,因此石破会在《24小时绝对不准笑》的上升期参演,自降身份帮助该节目拓宽了参演嘉宾的范围,也在该节目的最后一期再次登台作为告别纪念,而松本也作为回报为石破提供了一个高收视率的表演舞台,并为其策划了符合其需求的搞笑段子。因此松本人志也可以作为对石破茂的性格特质进行分析时的一个侧面参考。

三、石破茂的性格及领袖特质

国内现有学者分析认为,石破茂的右翼言论是短期行为,实际政策主张可能会比较稳重,颁布有“政治冒险”色彩政策的可能性较低;石破茂胜选后未必会很快解散众议院。^②“未必很快解散众议院”这一判断已被证伪,石破的实际政策“稳重”与否也有待商榷。在引入了搞笑综艺的相关素材进行分析后,能为国内的现有分析打开新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本章将对前述内容中涉及石破茂的性格及领袖特质的表现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并结合其在正式场合的言行对其性格及领袖特质进行交叉结合分析。

(一)石破茂的整体性格及领袖特质

在个人性格方面,学界常用托普斯(Ernest C. Tupes)和克里斯托(Raymond E. Christal)所归纳出的五种普遍的人格维度,即“大五人格”框架的理论对领导人进行个人分析。^③这一框架理论从五个维度划分了不同的主要性格特质:神经质(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其中,神经质维度表示情绪稳定性;外向性维度表示个体在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社交能力,及更关注外部世界还是个人内心世界;开放性维度表示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以及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等;宜人性维度关注个体的同情心、对他人的友善程度及获得周围人喜爱的能力;尽责性维度则表示其责任心、自律程度及对目标的关注度及实现能力。对于领导者所期望构建的公众形象而言,外向性、宜人性及尽责性都应当偏高,神经质则偏低,开放性则根据其政见而定,如保守主义领导人所希望建构的公众形象往往更传统、遵守习俗。

如忽视综艺节目的素材影响,石破茂所建构的公众形象所体现出的性格特质较为符合上述框架中对保守主义领导人的形象构建,在外向型、宜人性和尽责性上得分较高,神经质得分则相对一般,主要性格特征包括积极外向、亲民和善、尽责尽职和性情中人。积极外向方

① 松本人志的性格除其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外,亦可见其著作松本人志『遺書』、朝日新聞社、1994年。

② 吴彬彬、冷汐:《石破茂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并将出任首相 他将把日本带向何方?》,载《南方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007版。

③ Ernest C. Tupes and Raymond E. Christal, “Recurrent personality Factors Based on Trait Rat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60, No. 2, 1992, pp.225-251; 李宏洲、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期,第11-22页。

面,除了会与搞笑艺人这样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士打交道外,石破也积极参加各类外交活动,在当选首相后积极寻找机会与各国首脑交流并建立联系,且决定在外交预算、人员和驻外使馆方面均进行“根本性的扩充”;亲民和善方面,除了参演市井气息浓厚的搞笑综艺外,石破也有大打日本庶民阶层饮食代表的“拉面牌”的举动,通过宣扬自己对于这种庶民色彩浓厚的食物的热爱来拉近和民众间的距离和感情,还担任了“拉面文化振兴议员联盟”的主席;尽职尽责上,石破不仅在搞笑综艺上也不忘强调自己的国防专才形象,当选首相后也迅速就日本民众关注的黑金丑闻事件主动道歉,也迅速推出了对应的经济刺激及税制改革计划,实现竞选承诺,曾与石破茂有工作交集的宫家邦彦也回忆称,石破茂在工作中不仅会努力了解问题的政治方面,也会努力了解事实和法律细节;而在搞笑节目上直接讽刺时任首相、多次发表过激烈演说、坦言自己“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的石破茂是一个性情中人则是非常显然之事。^①多年前的2期搞笑综艺中所透露的信息便可与其近来担任首相后的诸多言行实现交叉印证,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相关素材及视角具备充足的信度。

除此之外,石破茂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便是思维开放。正如石破茂本人所言,参演综艺节目会提升他的思维开放性,罔论参演搞笑综艺。^②另外,石破茂还有身着《七龙珠》中的“魔人布欧”的玩偶服参与公开活动的事迹,且据主办方称,在参与活动之前并未告知石破茂需要穿上玩偶服,但石破茂临时得知这一安排后依然“笑咪咪地答应了”。^③对于作为有意竞选首相之位的人,面对在公开场合穿玩偶服的突然要求欣然接纳不仅体现了石破茂在宜人性和尽责性上的高得分,同样也能证明其思维的开放性,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非常宽容,然而这一点却与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颇为不符。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指出,保守主义的一

① 《中日首脑会谈,石破茂对访华表现积极意愿》,《日经中文网》,2024年11月18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57270-2024-11-18-09-08-19.html>,(2024年12月6日访问);「外交力の抜本的な強化を関係会議が石破総理、岩屋外務大臣に申し入れ」、自民党,2024年12月3日,<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9528.html>,(2024年12月6日访问);「〈自民党新総裁・石破茂のラーメン愛〉「人生で一番辛かった時期、深夜に妻と食べた一杯」石破茂ラーメン議連会長が語る思い出のラーメンBEST3」、Yahoo Japan,2024年9月27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59085c444d74c123968b5ca7a4ee88ad1a4beed1>,(2024年12月6日访问);张骁:《石破茂就“黑金”丑闻致歉 称接受民众批判和众议院选举结果》,《第一财经》,2024年10月28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2330361.html>,(2024年12月6日访问);泰勒:《日本首相石破茂将宣布14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基金报》,2024年11月21日,<https://www.chnfund.com/article/AR4a366c0c-c891-86b7-3879-3a16610079b6>,(2024年12月6日访问);陈佳琳:《日本新首相,才上台就公开道歉》,《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0月16日,<http://www.inewsweek.cn/world/2024-10-16/23373.shtml>,(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② 「バラエティ出演など」、水月會,2017年12月28日,https://www.suigetsukai.org/20171228_ishiba/,(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③ 奥原慎平「石破茂氏といえば…「魔人ブウ」のコスプレ 仕掛け人は「だまし討ちもニコニコ受けた」」『産経ニュース』,2024年9月27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40927-ANVDT5CEM-ND4DI7RK3LTGY4AHU>,(2024年12月6日访问)。

大特征便是对于熟悉的、尝试过的事物的偏好,与对未知的、未经尝试过事物的抵触,这与石破茂所展现的高开放性之间的张力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①

在领导人特质方面,詹姆斯·巴伯(James D. Barber)从“工作投入程度”的积极与消极,及“对领导人职位的兴趣”的正面与负面,将领导人特质划分为了四个象限,张勇则在此基础上将四个象限所对应的特质进行了凝练的重新命名。^②二者结合后的象限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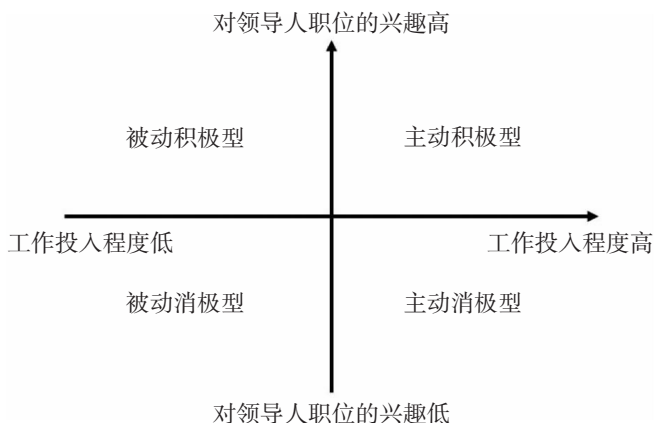


图 1 领导人特质象限图

来源:笔者自制

具体而言,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同时热衷于工作和最高领导人的职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属于该类型;主动消极型虽对工作热情投入,但自身投入被内心保持权力的情绪扭曲;被动积极型由于渴望与人为善所以不太热心政治工作;被动消极型则只是得过且过地履行领导人的工作。^③该分类法从客观上的工作投入与主观上的对职位的兴趣进行了交叉结合的划分,理应能较为全面地覆盖各类领导人的情况,但石破茂在这一框架下的对应象限却相对模糊:石破无疑属于主动性,从其过往到当选首相后一个多月来积极寻求外交突破,主动尝试联系特朗普并积极与中方领导人会晤的表现来看,其对从政工作抱有较高的投入度,先后五次竞选首相也表明了其对于领导人职位有着浓厚的兴趣,但 11 月 11 日在国会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时打瞌睡、在 APEC 峰会上玩手机的行为很难想象其是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近期曾与石破茂、小泉进次郎和河野太郎等政客均对谈过的堀江贵文表示石破茂是这些政客中对外交、经济工作兴趣最低的人,也有基于微表情的分析指出石破担任首相后的笑容非

① Michael Oak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thuen. 1962, pp.168-196.

② 詹姆斯·巴伯著,赵广成译:《总统的性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15 页;张勇:《韬晦之“鸢”: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第 105-131 页。

③ 同上。

常不自然,折射出内心的不自然,似是对担任首相一职很不习惯。^①石破的领导人特质属于主动积极型还是主动消极型的问题与其在“大五人格”框架理论下体现的保守主义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相互映照,可通过其参演搞笑综艺节目的表现串联起来得出解释,即石破是秉持平民主义立场的,带有冒险主义色彩的主动积极型领导人。

(二)石破茂的平民主义与冒险主义

石破茂的平民主义色彩相对突出且广为人知,除了参演综艺节目外,由于石破茂曾在1993–1997年间脱离自民党,其在党内高层支持率一向低迷,主要依赖亲民路线来获取支持,但日本政坛的选举制度和特点使得普通国民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限,也使得石破茂的从政之路较为坎坷。石破本人先前也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当选首相的可能性极低。^②但石破较为富有进取心和理想主义色彩,他在公开正式场合中也多次标榜自己是田中角荣路线的继承者,秉持着对平民的关怀以及与官僚主义间的对抗性。^③在日本派阀政治色彩浓厚、官僚主义文化盛行的政坛背景下,坚持平民主义的石破面临着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体现出来的便是他的总体言行难以判断其对领导人职位的兴趣究竟如何,并使其难以在领导人特质象限图上被准确定位。结合石破参演以讽刺上层、权贵作为根源的日本搞笑综艺节目及其他性格特质可以认为,石破对派阀政治和官僚主义掣肘下的首相之位存在抵触情绪,但又渴望这一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职位,因此呈现出了他在领导人特质上的摇摆。石破并不担心参演搞笑综艺对自身权威感的解构,因为他本人也对官僚主义的气质有所不满,而参演搞笑综艺这种会解构自身权威特质的行为会进一步放大自己的平民主义色彩,也能凸显自己的开放性并反衬其他传统政客的古板。这种主动求变的行为说明石破所呈现对于领导人职位的兴趣的消极一面并非出于对自身权力的保持欲望,其领导人特质也可以被确定为主动积极型。

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特质及平民主义路线使得石破茂在日本政坛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时会积极求变,试图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改变现实而非妥协。但与同为主动积极型的安倍晋三不同,石破茂属于日本保守势力中的自由派,政见与自民党党内高层不符,且由于离党事

① 「堀江貴文氏「石破さんは外交と経済に興味がない どうでもいいと思ってる」所信表明演説の出来の悪さに納得「官僚も短命と思ってる」」、Yahoo Japan、2024年12月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b4c952ce5a948308861380e6058cb4355d39f20d>, (2024年12月6日访问);「新総裁石破氏の表情分析～国民に信頼されるリーダーシップの鍵～」、国際ボディランゲージ協会、<https://www.body-language-expert.com/single-post/%E6%96%B0%E7%B7%8F%E8%A3%81%E7%9F%B3%E7%A0%B4%E6%B0%8F%E3%81%AE%E8%A1%A8%E6%83%85%E5%88%86%E6%9E%90%E3%80%9C%E5%9B%BD%E6%B0%91%E3%81%AB%E4%BF%A1%E9%A0%BC%E3%81%95%E3%82%8C%E3%82%8B%E3%83%AA%E3%83%BC%E3%83%80%E3%83%BC%E3%82%B7%E3%83%83%E3%83%97%E3%81%AE%E9%8D%B5%E3%80%9C>, (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② 陈沁涵:《日本自民党新总裁石破茂:曾与安倍和麻生交恶,提出在美设自卫队基地》,《澎湃新闻》,2024年9月27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876605, (2024年12月6日访问)。

③ Harris T, “The Idealist”, *Observing Japan*, September.25th.2024, <https://observingjapan.substack.com/p/the-idealist>, (2024年12月1日访问)。

件缺乏党内认可度,使得石破的力量远不及安倍,也不足以改变封闭僵化已久的日本政坛。自田中角荣处继承的理想主义、平民主义色彩与石破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特质相互催化,让石破孕育出了一种冒险主义,即通过开放性的思维找到潜在突破口后采取出人意料的行为,而他参演搞笑综艺的行为则说明了其在具体行动层面不太受传统的制约。纵观石破提出的施政纲领,其所谓的保守主义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日本价值观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而冒险主义也正是日本的一种传统价值观。石破的冒险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参演搞笑综艺等在其他政客身上极为罕见的行为上,其在自民党支持率严重下滑的背景下上任首相后,想挟胜选之余威火速解散众议院再选的行为也可见一斑。石破在领导人间的关系建立上比起安倍的投其所好更讲究“以我为主”。^① 这点也可以认为是其冒险主义和主动积极型领导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松本人志允许当时在野的自民党成员石破茂在自己的娱乐节目中进行攻击时任首相的涉政演出,叠加松本在日本搞笑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亦可判断松本也具备较高的开放性与冒险主义色彩,松本与石破在这一方面的共性可能是石破愿意多次出演 Downtown 的节目的原因之一。

(三)综艺节目视角引入的补充性

伴随着全球右转与保守主义思潮回归的大势一同出现的,还有“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的现象。除了电视明星特朗普、喜剧演员泽连斯基、经济学“网红”米莱等政治素人登上政治舞台外,泰勒·斯威夫特、乔·罗根(Joe Rogan)等以往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娱乐圈明星也纷纷在政治活动中站队表态。究其原因,在于左翼进步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在冷战结束后持续发展近 30 年而已沉痾日现。在此基础上,不仅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变革转向,且由于绝大多数的精英的意识形态都已相对接近,使得平民主义的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人士,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在原有政治格局中的生态位优势,新的保守主义意见领袖在其他领域获取知名度及影响力后转而从政方可破局,这也倒逼着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均有优势的娱乐圈人士需要进行政治站队,而政治人物在当今的全民媒体时代也可以通过娱乐化来获取知名度和影响力。

日本政坛的情况尽管相对特殊,毫无政治根基之人不可能通过日本的民主选举当选首相,但大体脉络依然遵从于这一世界趋势,即原有政治格局由于沉痾亟需变革、变革方向为保守主义、代言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且与原有政治格局相对距离较远,以及通过娱乐化的方式获取政治资本。石破茂的当选固然有着偶然性,但派阀政治的松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日本的政治格局有望随着派阀解散而恢复一定活力、日本国债收益率飙升,日本年轻人的参政热情可能伴随着政坛活力上升和经济发展回暖而得到提升,叠加日本高度发达的娱乐业,政客通过参演综艺节目来获取年轻人支持的行为亦会增加,助推“政治

^① 张望:《石破茂的外交触礁》,载《明报》,2024 年 11 月 26 日 A15 版。

娱乐化,娱乐政治化”的趋势在日本的发展。石破内阁中的前娱乐圈人士三原顺子的入阁也揭示了这一潜在发展态势。

四、结 语

政客通过媒体建构自身形象并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活动,而在当下这般各路信息争抢人们的注意力的时代下,“政治娱乐化”现象愈发普遍,政客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获取关注进而实现政治目标的行为也愈发常见,例如韩国的反对党领袖李在明就在12月3日的韩国戒严风波中,对其进入国会的过程进行了直播,鼓动了其支持者与其一同反抗戒严。然而,通过搞笑的方式吸引眼球的政客终究是极少数,盖因“发笑”这一行为的内在逻辑源于“反差感”,而反差感会消解政客所需的权威感、严肃感,与政客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张力。

特别是对于日本社会而言,由于日本搞笑文化自诞生以来便有着对上位者的讽刺作为底层逻辑、庶民气息作为底色,且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下沉为市井气息,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日本政客与搞笑间的张力更为深刻,在此背景下,作为以田中角荣为偶像,有志于竞选首相并改变日本社会的石破茂2次出演搞笑综艺的行为更是显得格外突出,但现有国内对于石破的分析中未见有文章提及相关素材,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石破的分析中忽略了其冒险主义色彩,进而在对其执政动态的预判上存在偏差。通过对石破在搞笑综艺上的出演内容的梳理分析,并结合其在公开正式场合的言行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相关素材不仅能够体现其积极外向、亲民和善、尽职尽责、性情中人、思路开放、主动积极的特性,也能经由搞笑与政客之间的张力揭示石破在日本政治生态中为了坚持平民路线而孕育出的冒险主义,为其担任首相后的言行提供更全面的认识与解释。

此外,日本也受到了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所发生的剧烈变动的的影响,尽管由于日本政治格局的特殊性使得“政治娱乐化”、“素人执政”等现象并不十分明显,但影响已逐渐增加。综艺节目视角的引入可以有效丰富对参演节目的日本政客的认识,打开新的视域,是我国目前的日本研究所亟待补充的视角。

日本老龄化发展历程与政策

——经验与启示

曹昱亮 王雅影 刘 伟

内容提要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繁荣,医疗水平不断提升,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大。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观念的转变,日本生育率增速下降,人口转型成就“少生少死”的局面。日本在1990年少年儿童人口占比跌破19%,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间已久,在养老、医疗、福利保健、育儿等诸多层面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拥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与体系制度。中国在地域分布、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化进程等方面与日本高度相似。对此,中国可以结合两国人口发展的共同特征,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相关经验,为构建高质量人口发展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 日本 老龄化 老龄化进程 人口现状 体系制度

作者简介: 曹昱亮,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王雅影,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伟,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子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编号19BRK020)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再次强调“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比重持续加大,生育水平却逐年下降,人口增长趋势逐渐放缓,由此引发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尝试通过“三孩政策”、延迟退休、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效果不佳。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人口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有相似之处,并且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间已久,政策相对成熟,中国可以取长补短,反思其不足,在保险、福利、育儿等政策方面进行经验借鉴,以更好地应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难题。

一、日本老龄化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50—1970年),初显老龄化阶段。据数据可知,195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4.9%。^①此后,日本死亡率降低且出生率下降,从1955年到1970年少儿人口数量比重由33.4%下降到23.9%,减少了9.5%。在此期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涨1.8%。概括而言,日本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年人口死亡率与少儿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等因素。此外,少年儿童人口绝对数的增长起到了主要作用。^②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1%,按照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为老龄化社会这一国际标准,日本从197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二阶段(1970—1995年),步入老龄化阶段。在此阶段,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1%上升到14.6%,仅经历了25年时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涨了一倍;出生率从18.8‰下降到9.5‰,下降了9.3个百分点;0—14岁人口比重从23.9%下降到16.0%;65岁及以上的高龄组人口死亡率下降了74.8‰。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使得人口平均寿命延长,由此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促使老龄化现象更加严重。此外人口受出生率降低和死亡率降低两方面的影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使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第三阶段(1995—2006年),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1995年以来0—14岁人口增加率一直呈现负增长趋势,随着出生率的大幅降低,日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口快速老化进程。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到17.4%,直至2005年达到了20.2%,占总人口的1/5。在1995年之前,0至14岁的青少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比65岁及以上人口更高,但1995年以后这一比例关系发生了逆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逐渐开始高于0—14岁低龄人口比例且差距不断扩大。在此阶段日本的人口死亡率持续降低,老年人口队伍不断壮大,人口变化趋势表现为出生率、死亡率降低,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低值。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第四阶段(2006—),超老龄化阶段。2007年日本老年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数量的21%,步入超老龄社会。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2010年所占比例达22.5%,2015年达到26%,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时日本老年人口比例在2040年将会上升到33.2%,而老化系数^③也会超出200%;据推算2050年日本人口数量将由2000年的1.26亿人跌至1.01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5.7%。^④目前日本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

①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総計資料集』, <https://www.ipss.go.jp/publication/j/shiryou/jinkokenshiryou.html>, (2023年10月7日访问)。

② 张航空、吴晓燕:《日本人口老龄化历史进程(1920—20)》,载《社会发展》2007年第9期,第59—60页。

③ 老化系数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对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之比。

④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総計資料集』, <https://www.ipss.go.jp/publication/j/shiryou/jinkokenshiryou.html>, (2023年10月7日访问)。

家,但是低出生率的现状会更大程度地加速其老龄化进程,导致社会保障负担越发沉重,给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表 1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占比

年份	0-14 岁 (%)	15-64 岁 (%)	65 岁及以上 (%)
1950	35.4	59.7	4.9
1955	33.4	61.3	5.3
1960	30.0	64.2	5.7
1965	25.6	68.1	6.3
1970	23.9	69.0	7.1
1975	24.3	67.7	7.9
1980	23.5	67.4	9.1
1985	21.5	68.2	10.3
1990	18.2	69.7	12.1
1995	16.0	69.5	14.6
2000	14.6	68.1	17.4
2005	13.8	66.1	20.2
2010	13.4	64.1	22.5
2015	12.8	61.2	26.0
2020	12.2	60.0	27.9
2025	11.6	59.7	28.7
2030	11.3	59.2	29.6
2035	11.1	58.0	30.9
2040	11.0	55.8	33.2
2045	10.9	54.4	34.7
2050	10.8	53.6	35.7

数据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2022.『人口総計資料集』

二、日本各阶段老龄化的应对措施与实施效果

(一)日本老龄化相应政策

对于日本老龄化发展历程已经提到分为四个阶段,日本在 1995 年彻底进入老龄社会,因此以 1995 年为分界点,1995 年之前包括第一阶段(1950—1970 年)和第二阶段(1970—1995 年),其特点是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大于老龄人口;1995 年之后包括第三阶段(1995—2006 年)和第四阶段(2006—),特点则是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小于老龄人口。针对发展历程中所表现的人口特点不同,在 1995 年之前和 1995 年之后政府实施政策的重心也有所不同。

1. 老龄化社会和老龄社会

在 1995 年之前,日本处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阶段,并在 1995 年彻底发展成老龄社会^①。因此,日本政府在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出台政策以减轻老年人生活负担。

① 养老保险制度

从 1961 年《国民年金法》生效以来,为提高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日本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养老政策。不过,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入,老年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此,政府出台了《老年人就业推进法》,以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鼓励老年人就业。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和日本经济进入低迷期的双重压力下,1985 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国民年金法》做出修改,将国民年金作为最基础年金,年龄范围处于 20 到 60 岁之间的国民必须加入,在缴费期满 25 年后,65 岁及以上的国民都可以领取相应的养老年金。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经济呈下行趋势,老龄人口快速增加导致需要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量增加,然而少子化使得保险缴纳人数与领取养老金人数不平衡,政府财政压力大。因此再一次改革规定 60 岁及以上老龄者的雇佣与年金制相结合,提倡老年人再就业,并提出了年金的支付水平要由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决定。^②

② 医疗保险制度

在 1970 年后,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保健医疗需求加大,政府为了保障老龄人口的医疗福利,提出对 70 岁及以上的参保老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费用由政府承担。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享受免费医疗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难以承担其产生的费用,在 1982 年《老人保健法》中废除了免费医疗制度,规定高龄者才能享受国家的补贴,规定 70 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自己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政府承担余下的费用。与此同时开始保健事业以此来延长健康寿命,进而减少老年人医疗负担。

2. 超老龄社会

1995 年之后,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加快,现已步入了超老龄社会^③。日本政府除了要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医疗保健外,还要面对超老龄社会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负增长的挑战,政府需要针对老年人就业、护理、育儿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主要内容如图 1。

① 养老保险制度

2000 年养老金改革主要目的是通过保障养老金缴纳来源的稳定性来保障和维护老年人晚年养老生活,首先是降低厚生年金的支付水平,领取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将按月收入收取的保险费改成按年收入收取;其次,将缴费灵活化,20 岁及以上的无收入学生,可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在就业 10 年后补交保险费;并且对于养老金支付方面政府放宽养老金运

① 老龄化社会是老龄社会的过程,老龄社会是由老龄化社会演变而来的。

② 杜莎莎:《日本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第 14-20 页。

③ 国际上把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0% 定位为超老龄社会。

营的限制,积极引入商业模式将养老金投放市场。^①2004年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明确了养老金的待遇和缴纳两方面问题,日本政府设立了相关理事会来强化对养老金的运营和管理,将政府所负担的养老金比例从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并上调了年金支付。

②医疗保险制度

老龄人口增加,慢性疾病患病率也不断增长,因而治疗这类疾病的医疗费用支出逐年增加,日本政府意识到要促进国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减少政府医疗负担的切入点。2000年,政府发起了“21世纪国民健康建设运动”,2003年正式实施《健康促进法》,2008年开始实施“特定健康检查”和“特定保险指导”,用以达到“防控疾病、增进健康”的目的。^②为了应对高龄人群,2008年开始实施《高龄者医疗确保法》,成立了老龄者的医疗保险制度。

③促进老年人就业

据日本经济新闻于2023年8月6日刊发的关于日本老年职场人的话题,可知目前日元贬值,外来劳动者减少,且生育率下降,本国青年劳动者匮乏,如此背景下,职场存续的未来在于老年一代。为了鼓励老年人就业,日本推动多项老年人就业的政策,《高龄者雇佣稳定法》表明为雇佣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企业提供补贴;《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中明确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建立老年人就业推荐制度,禁止企业招聘时设置招聘的年龄限制,取消老年人工作年龄限制,惩戒不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新事业创业法》中强调降低老年人创业启动金,鼓励老年人创业。除此之外,日本企业存在留任老年人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持续强化高龄人员的市场职能,通过企业推行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变革,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来确保老年人的再就业市场。由于高龄少子化,日本的劳动力明显不足,发展老年就业对缓解“民工荒”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老年人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实现“双赢”的策略。然而,积极促进老年人就业会带来相应风险,例如工伤的激增,年轻一代可以避免的工伤却可能在老年劳动者身上避无可避;又例如工资分配的问题反而使得70岁以上的劳动者投入低工资高体力的工作中,解决此类问题也是刻不容缓。

④护理保险制度

2000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以此提高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生活待遇。关于护理服务,据统计,2000年其市场规模大约为3.7万亿日元,2010年增加至7.5万亿日元,接受护理保险服务的人从2000年4月的149万人增加至2010年4月的403万人。因此实行本项制度有效扩大了日本老年人的护理规模,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③此项制度包括对居家老人和养老院老人的两项服务。前者是确保居家老

① 王莉莉、郭平:《日本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北京: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② 张慧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养老福利制度的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23页。

③ 「高齢者人口が3.3億人となる中国介護保険制度導入が鍵」、『毎日新聞』、2012年9月11日;「介護保険の10年と2011年改定の動向」『労働旬報社』、2011年。

年人同样能够享受护理服务,以维系家庭关系,减轻家庭赡养老年人的负担。目前,关于开设护理保险服务的相关机构已经开设在日本的各地各区,以提高老年人退休后的福利待遇。^①

⑤完善育儿政策

自 1995 年后少年儿童人口持续负增长,出生率急剧下降,事实上日本政府在 1994 年就制定了《今后育儿支持措施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此项计划明确表示要做好育儿与事业的平衡工作,提高育儿的客观条件,降低家庭支付育儿的各项成本,提供育儿保障与支持。即使曾经日本政府为了缓解少子化问题制定了相关政策,例如 1999 年出台的《推进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但到了 21 世纪,少子化问题进一步加重,政府再次出台《兼顾工作和育儿的支持政策方针》。此项政策进一步加强育儿服务,改善育儿环境,为家庭的育儿保障提供明确发展方向与改良措施。发展至今,日本政府为缓解少子化问题,在育儿、妇女工作、生育环境、降低育儿成本、增加托儿所等方面不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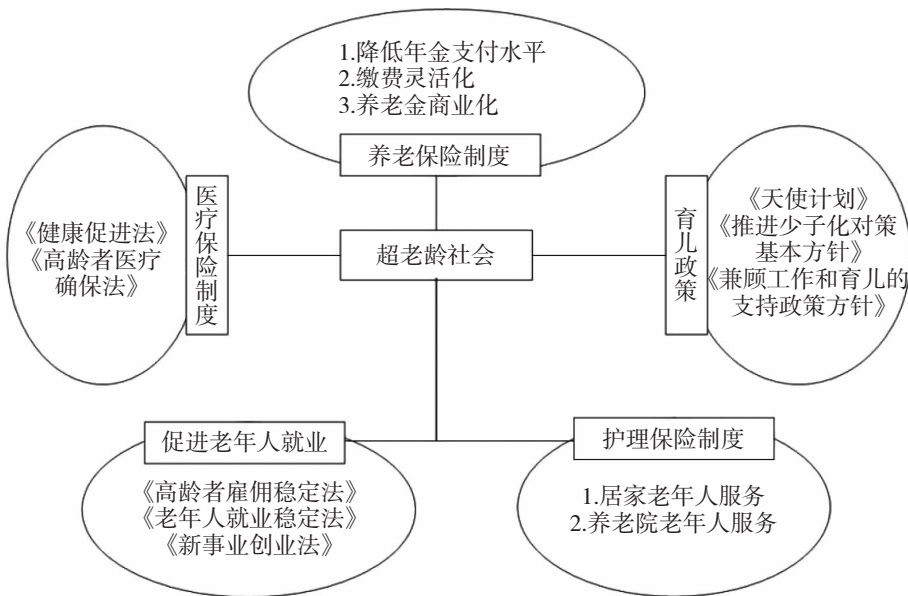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超老龄社会政策体系示意图

(二)日本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与经验

1.养老保险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为此日本进行一系列养老金制度改革以缓解日本财政收支压力。2001 年日本补充改革第二支柱养老保险,2002 年又引入第三支柱商业保险,实现从负债型养老金体系向商业型养老金体系的改革。而今,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秉承着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由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构成的

^① 厚生労働省『介護保険事業状況報告(年報)(2019 年度)』, <https://www.mhlw.go.jp/topics/kaigo/osirase/jigyoyo/19/index.html>, (2023 年 11 月 15 日访问)。

公共强制性养老金,该年金基本覆盖了全日本所有人口;第二支柱是以固定收益计划(DB)和缴费确定型计划(DC)为主的企业养老金计划,企业养老金目前与公共养老金并驾齐驱,成为日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重要保障;第三支柱则是个人自愿加入计划,其中包括2001年引入的个人型DC计划(iDeCo)和2014年开始的个人储蓄账户计划(NISA),前者是由国家养老基金联合会负责,适用于20岁至59岁人群缴纳,后者是由日本金融厅负责,任何年龄段均可以参与。

即便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较为完善,但仍存在养老金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即年轻人参与养老金制度,通过缴纳保险费用来供养老年人。而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由表1可知,202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7.9%,但劳动人口数仅占54.58%,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两个年轻劳动力人口要供养一个老年人,日本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同时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数量规模的扩张以及退休年龄的延长让年轻人认为养老保险制度回报率降低,从而影响年轻人参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性。此外,日本2017年9月因超十万人被漏发养老金的丑闻报道,让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代际矛盾愈发严重。

许誉丹曾梳理日本的实践经验,指出日本通过提高养老金缴费水平,依靠当前缴费者来负担养老金的给付不仅会加重代际矛盾,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削弱国家竞争力。^①因此即便在日本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依然要优先强调政府责任,提高养老金给付中的政府负担比例,同时应该考虑社会实际发展状况来调整财政支出的自动平衡机制。

郭秀云表明日本的“宏观经济调整指数”并不能完全化解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养老金收支压力,因此需要引入考虑人口因素的养老金待遇指数化调整机制,通过适度抑制受益水平的上涨幅度来控制缴费者的上涨压力。^②同时相对于退休者来说,在职者在养老金给付缺口弥补任务中确实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综上所述,即便日本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但面对日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现象,日本仍然出现了难以轻易调和的养老金给付矛盾。政府作为养老金制度的主导者在给付筹资方面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如何考虑日本人口结构现状,在不激化代际矛盾与不加重财政支出压力的前提下保障养老金制度的顺利实施,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医疗保险政策

致力于实现“全民皆保险”的日本医保政策,一直备受追捧。日本医疗保险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是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被保险人包括公共事业从业者、产业工人等具有固定收入的在职人群及其家属,保险费用由所属企业事先强制性地从工资中扣除个人需要缴纳的

^① 许誉丹:《深度老龄化视角下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6月,第42-43页。

^② 郭秀云、朱浩:《公共养老金待遇调整的代际分担机制研究——以德国和日本为例》,载《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4期,第160-168页。

医疗保险费用,企业与职工本人各负责 50%的缴纳比例;其二是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包括个体经营者、农民、无固定职业者和退休人员,参保人一般是低收入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这类保险是只要户主参与,全家均能够享受 80%的医疗费用报销待遇;其三是高龄者保险,被保险人主要针对日本 75 岁以上老年人和 65 岁至 75 岁中没有自理能力或卧病在床的特殊老年人人群,为缓解日本财政支出压力,这类保险由公共财政、参保人本人以及援助金三方面构成,其他医疗保险的风险共计援助金占比 40%,公共财政占比 50%,参保本人占比 10%。

目前,“全民皆保险”的医疗政策已经成为日本财政高额支出的负担。在日本一度出现“社会性住院”的不良现象,很多老年人住院并非为了治疗,而是为了获取专业、优惠的医疗护理服务,不仅浪费过多的医疗资源,同时进一步激发了代际矛盾。原医疗保险制度的初心是为了保障老年人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医疗待遇,但缴费比例偏低的老年人享受高标准的医疗待遇,愈发加重了日本的财政支出与年轻劳动人口的保险缴纳压力。为此日本也加快了解决如今医疗保障困境的探索进程。

蒋浩琛曾提出日本选择了一条碎片化的医保道路,保留了职场和地域两大体系,又为高龄老年人单独建制,试图通过三个制度之间的财政援助来克服制度差距,但无疑引发了诸多问题。^① 高龄者医保制度被视为年龄歧视,同时强化了年轻一代对自我负担加重的观念,加剧了代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此类保险也被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保形式所隔绝,这无疑强化了“家庭分离”的概念,违背“家庭团结”的参保理念。此外,在职工医保、国民医保与高龄者医保的划分下,大量老年退休者退出职工医保,而转向国民医保,削弱了“制度团结”能力。日本“碎片化参保”教训历历在目,因此顺应社会变化调整社会保险制度变得尤为重要。

华颖却指出日本通过按就业形态、年龄等划分不同类型参保者的多个制度来实现医保覆盖全民,即使多个制度看似分立,但各制度之间却有互助共济、资金调节机制,不同群体之间的医保待遇相差不大,可以追求实质公平的统一性制度安排,它的医疗保险制度在本国的检验下无疑是成功的,因此可以通过借鉴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来调整我国的医保立法。^②

综上所述,没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政府部门和年轻一代的支出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在结合本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日本医保立法经验“取其精华”,逐步调整本国医保政策的完善是应有之义。

3. 老年人雇用状况

在《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中规定,对于 65 岁之内的老年人,企业必须采取“废除退休制

^① 蒋浩琛、李珍:《从参保机制看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经验与教训》,载《社会保障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03-111 页。

^② 华颖:《典型国家医疗保险立法及其启示》,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34-41 页。

度”、“上调退休年龄”、“导入继续雇用制度”^① 三项制度的某一项来确保老年人就业。并且从 2021 年 4 月 1 日开始,将适用年龄上调为 70 岁,并且加入了“工作委托契约”和“从事社会贡献事业”两项制度,作为企业义务,必须在上述五项制度中进行选择。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 2021 年展开大规模企业调研,根据对从业人员 21 人以上的 232059 家企业的调查,共有 99.7%的企业已经实施了 65 岁以下老年人雇佣保护措施,其中采取“导入继续雇用制度”的企业为 71.9%。^② 将退休年龄设置为 65 岁的企业占比为 21.1%。已经完全导入 70 岁以下老年人就业保障措施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 25.6%。其中,废除了退休制度的企业占比为 4%。根据上述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老年人就业,给企业出了一道五选一的选择题。在调查范围内,企业对于政策的回应率很高,但回应率高不意味着效果良好。

角田大祐通过对东京周边的四家中小企业进行深度调查后发现,这四家企业全部导入了有利于老年人就业的相关制度,但仅限于对法律最低限度的执行,并且其相关制度的制定也只是照搬法律条文,并没有做出细致的政策解读和制度展开,反映出中小企业并不希望雇佣老年人。^③ 虽然调查的企业数量较少,但管中窥豹,在实施了 65 岁以下老年人雇佣保护措施的 99.7%的企业中,有部分企业的政策落地可能存在困难或者对待政策存在消极意愿。

岡村薫于 2019 年对日本“银发人才中心”(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的会员登记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自 2013 年会员登录人数逐步减少。但是划分年龄后发现,60 岁—69 岁之间的会员登录人数在减少,70 岁及以上的会员登记人数尤其是女性,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④ 他认为,企业确立的“继续雇佣制度”是 60 岁—69 岁老年人不再需要“银发人才中心”的主要原因。通过对老年人再就业主要媒介的登录人员调研,可知《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对于稳定老年人的就业和再就业具有积极影响。

梶谷真也通过对老年人的工作水平和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替代性角度进行了讨论,如果老年人继续就业或再就业后从事的工作有利于自身技能发挥,企业支付的报酬与老年人之前收入差异不大。^⑤ 如果老年人从事的工作与之前工作经验相差较大的话,企业就会削减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但如果对老年人实施了雇佣保护措施,年轻人就得不到相应的工作机会,

① 继续雇用制度是指正处在被雇用状态的员工,如果提出了退休年龄后仍继续工作的申请,企业就必须继续雇用。

② 厚生労働省「令和 3 年「高齢者雇用状況等報告」の集計結果」,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26246.html, (2023 年 11 月 20 日访问)。

③ 角田大祐「高齢者雇用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小企業における高齢者雇用の実態と展望を中心に」『高千穂論叢』高千穂商科大学商学会、2019 年。

④ 岡村薫「高齢者雇用政策が高齢者の就労行動に与えた影響」『産業経営研究』熊本学園大学産業経営研究第 39 号、2020 年。

⑤ 梶谷真也「高齢者の雇用確保と企業側の調整」『日本労働研究雑誌』労働政策と訓練の研究所、2021 年。

企业也失去了技能与经验传承的重要对象,造成人才断层。梶谷通过调查发现,调查范围内的多数老年人希望能够继续就业或再就业,同时认为自己不能承受之前的工作强度。因此梶谷认为,随着老年人雇佣年限的延长,在工作内容不变的情况下,要适当减轻其工作量,使企业维持老年人工作的同时,也能够顺利注入新鲜血液。

综上所述,对于老年人雇佣情况,即便是在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日本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地较为消极、老年人与年轻人争夺就业机会等问题。即便企业给老年人提供了与之能力和体力相适应的工作,对于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工资待遇减少的事实,仍然是日本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4. 老年人护理保险政策

对于日本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医疗保险的尽头是护理保险,由于晚婚不婚、晚育不育、大家族观念的淡漠,日本独居老人数量连年增长。因此,护理保险保障了身边没有亲人或配偶的老年人对自尊自立的追求。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具有覆盖面广、适用范围宽的特点且护理服务分类细致,有 24 小时全天候的敬老院,也有只在白天服务的托老所,还有家庭访问式护理等不同类型的护理服务供被保险人使用。其服务内容更是多样化,从洗衣做饭等日常生活服务到定期巡视、夜间服务、临终关怀等,基本覆盖了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方方面面。

虽然日本的护理保险较为健全,但是未来护理保险面临着严重的财政不足问题。首先,从护理保险的构成来看,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 50%,第一号被保险人承担 23%,第二号被保险人承担 27%,即护理保险的财政来源是由税金和 40 岁及以上被保险者的保险费构成。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护理支出势必会增加,同时随着少子化进程的加剧,未来数年间,40 岁及以上被保险者的数量又会逐年减少。因此如何确保护理保险的财政来源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巨大难题。如果未来增加护理保险使用者的承担额度,或者降低被保险者的底线年龄,势必会产生重大舆情。

在此背景下,石桥敏郎对降低被保险者的底线年龄、严格限制保险使用条件、积极采取护理预防这三个手段分别进行了探讨。^①如果直接降低底线年龄会使不会得老年疾病的年轻人缴纳更长时间的保险,直至自己到达可能罹患老年疾病的年龄(45 岁及以上),这样势必会招致收入水平较低的年轻一代的不满。如果严格限制保险使用条件,受委托的第三方是否值得信赖是个未知数。因此,石桥等对建立护理保险的预防系统最为认可。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上,地方行政部门应该切实推进健康保障事业,从根源上减少需要被护理的老年人和中年人。

三原岳认为,要加强护理保险使用者的居家看护医疗条件,将都道府县的高水平医疗条件与市町村主导的日常护理预防手段相结合,通过强健身体,延缓被保险人成为保险使用者

^① 石桥敏郎、緒方裕子、紫牟田佳子、角森輝美「高齢者をめぐる医療・介護・福祉政策の最近の動向について」『アドミニストレーション』2018 年、第 25 卷、第 1 号、1-50 頁。

的时间,可以有效减轻财政负担,同时达到全民健康的目的。^①

目前来看护理保险制度的修改和应用仍有改进空间,只是通过护理预防让中青年人加强身体锻炼来延长成为保险使用者的时间这种手段比较被动。在日本经济日渐低迷的背景下,普通的年轻劳动者在工作上长时间的投入和相对较少的经济回报并不成正比,在收入和锻炼身体之间,大部分人会把工作放在锻炼之前。

5. 育儿政策

1994 年日本颁布《天使计划》,主张“生育奖励政策”,以此为依据提出的《紧急保育对策 5 年计划》要求在政策实施 5 年内扩大育儿所建设与育儿规模,但因财政支持缺乏对应的法律依据,没有足够的政府支持力度达到建设目标而完成率偏低。1999 年日本推出《新天使计划》,即《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该计划并未对《天使计划》中缺失的财政支出法律依据进行补充,而是新增了 21 项工作内容,扩大了应对少子化的对策范畴,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效果,但仍因政府支持力度有限而没有彻底落实有关内容。2002 年日本推出《少子化对策 +1——关于进一步充实少子化对策的提案》,该提案首次从政府角度剖析了日本政策的不足之处,并开始推行育儿支援政策法治化。2004 年日本通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将育儿政策推向新征程。2020 年 5 月日本确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为 2025 年日本育儿政策提供了基本方针指引。然而虽然大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出生率,但较多日本民众认为其中的目标脱离社会实际情况,措施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张昕艺指出目前日本育儿压力仍然较大,并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梳理了日本育儿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日本应该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改革工作方式,减轻员工的育儿压力。^②同时重视男性的双重角色,鼓励女性实现自我价值,减轻女性育儿压力,建立起政府、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相互配合的育儿支持网络。

金慢然提出在日本育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三十年间,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育儿政策的体系建构,搭建了相对完善的育儿支援网络结构,充实了育儿支援的一系列公共服务。^③但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需要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显著问题并逐步完善,日本的育儿政策在制定之初就存在财政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况,政策实施一直依靠各区的财政支出,因各区域的经济水平发展不同而导致各区域的育儿政策发展不平衡。同时还存在育儿专业人员缺失和传统文化带来的阻力等诸多问题。因此日本仍需不断完善育儿支援的相关政策,整合协调育儿资源要素的发展。

综上所述,少子化是政策、社会、家庭、文化等多方面不足的复杂问题,提高生育率的目的

① 三原岳「介護保険制度の現状と課題」『一橋大学政策フォーラム』一橋大学, <https://www.hit-u.ac.jp/kenkyu/file/2019forum2/1-3.Mihara.pdf>, (2023 年 12 月 1 日访问)。

② 张昕艺:《日本育儿政策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8 年,第 36-38 页。

③ 金慢然:《日本育儿支援政策及实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 年,第 178-179 页。

标无法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剖析当前少子化问题的产生根源,提出针对性和可行性兼具的有效措施来拉动社会育儿积极性。

三、日本老龄化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

据统计,中国在200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7.0%,0至14岁人口比例达到24.5%,年龄结构正式调整为老年型,迈入老龄化国家。直至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达到12.6%,平均预计寿命达到78.1岁,同时据国家卫健委指出,预计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成为重度老年化社会阶段,可见,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

中国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实施了独生政策后,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持续下滑状态。在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后,中国对于生育数据越发关注,202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①仅为1.8,成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政策干预对于我国人口变化将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大致有以下特点:

第一,老龄化群体规模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在1985年就已经超过10亿,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1.67%,在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下,同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6.9%,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82%,由此可见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第二,人口老龄化增速快。中国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人口峰值,而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5%,中国老龄人口发展速度将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老年人口比重从7%上升至14%的过程中,日本经历了24年,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用了数十年,其中法国达到130年,瑞典达到84年,而中国,据人口数据预测,将使用25年经历此过程,速度仅慢于日本。在如此快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下,老龄带来的社会不利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第三,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适配。观察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情况是同步且适配的,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却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在步入老龄社会的初期是一个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口大国,但是当时中国的老龄化发展程度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当,成为了一个典型“未富先老”的国家。

第四,高龄化、空巢化现象显著。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会超过两倍,正式步入长寿年代。而在高龄老年人口众多的社会环境下,老年人的晚年照顾成为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据民政部调查,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已经达到一半,甚至有些农村地区或城市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70%,大部分老年人并没有与子女生活在一起,无法受到子女的照顾,老人生活不便,甚至会产生安全风险。

①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终身生育的子女数。

第五,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大。目前城乡老人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天差地别。以收入来说,大部分城里老人即使没有缴纳社保,在“视同缴费”的制度下,每月都可以领三千到四千的退休金以保障生活质量。而农村老人每月却只能领到几百块的养老补贴以保障基本生活,甚至需要部分体力劳动、农产品售卖等增加生活收入。以医疗来说,相较于城里老人可以享受到较高比例的医疗报销,农村老人仅能享受较低比例的农村医疗,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过低导致农村老人忍受小病、拖延大病,不利于老人晚年生活的调养。

(二)中日老龄化发展共性分析

第一,少子老龄化问题显著。相比于日本少子老龄化所呈现出的“周期长、进展快、不易扭转”等特点,中国少子老龄化现象也越发显著。对于少子化现象,一方面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形势影响了当代人的婚育观念,晚婚晚育成为普遍趋势。对于老龄化现象,中国同日本相同,医疗水平的提升使中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上升,致使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增加,老龄化速度加快。

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似。对比分析两国人口增长率、预期寿命以及年龄结构,见图2、图3、图4。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两国都经历过类似的人口低谷期和增长高峰期,中国更甚,在1960年达到负增长,70年代又达到高峰,在80年代后,虽然中国在90年代出现了增长率急速下降的情况,但两国人口增长率变化趋同,都处于增长率缓慢下降的趋势,日本增长变化趋势快于中国,甚至在21世纪后逐步出现负增长。以两国的人口增长趋同性可预知中国未来的人口变化情况。其次,中国在1960年处于预期寿命低谷期,在60年代后两国的预期寿命变化基本相同,呈现平稳上升状态。中国与日本在1950年的预期寿命分别为43.7、59.2,到2020年分别达到78.1、84.7,中国延长了34.4年,而日本延长了25.5年。在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延长了3.7年,日本延长1.7年;在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延长2.5年,日本延长1.8年,这都有赖于两国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的提升。日本预期寿命从60岁左右开始上升,而中国60岁以后的预期寿命增长幅度与日本相似度很高,两国预期寿命变化具有相同趋势,且近些年来看日本的养老措施更优于中国。最后,分析两国的年龄结构变化发现,日本早在1970年老年人口超过7%,进入老年化社会,相较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00年超过7%的进程而言快了30年;随后,日本在199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快于中国二十多年;同时,日本在1990年少年人口跌破19%,2020年0-14岁人口达到13%,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两国年龄结构的变化虽有略微差异,但少子老龄化的变化趋势确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且中国处于日本的变化滞后期,中国的少子老龄化进程更甚于日本,两国老龄现象出现相差三十年,少子化却只相差二十年,因此参考日本老龄化措施来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具有可实践的意义。

第三,老龄化地域分布不均。与日本相似,中国城乡高龄化特征差异显著,农村高龄特征远远大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医疗、养老等资源的匮乏导致农村养老成本远远高于城镇,同时贫困地区养老金等费用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农村地区老年人普遍存在对于养老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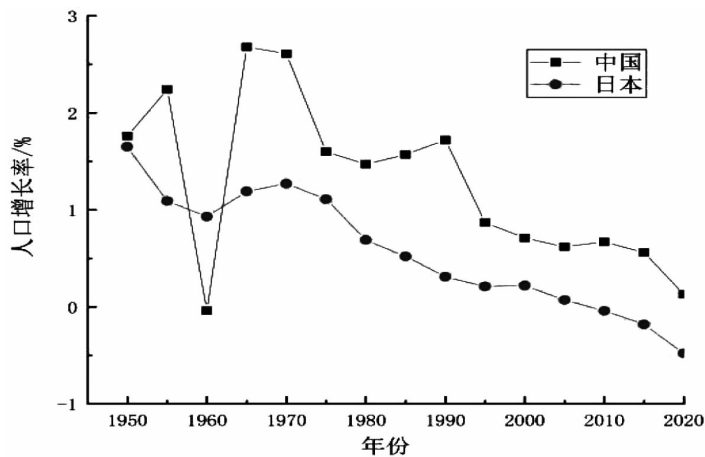


图2 中日人口增长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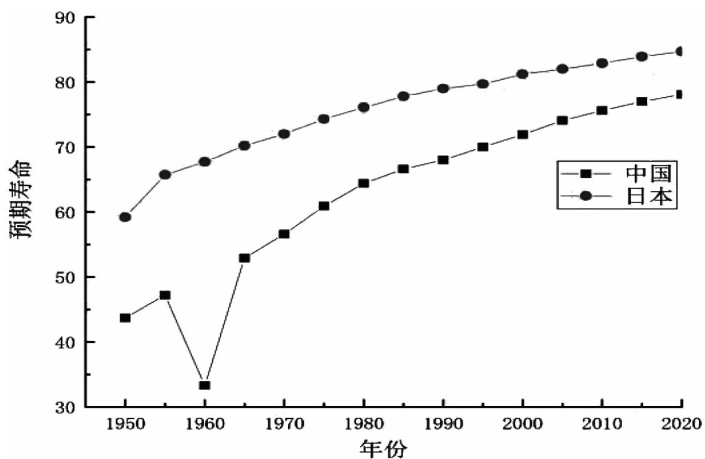


图3 中日预期寿命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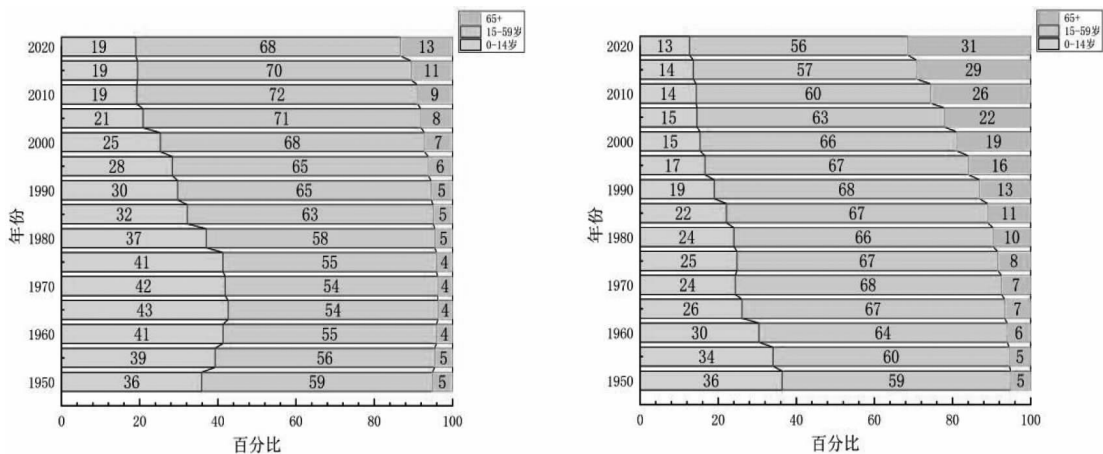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左)与日本(右)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

担忧,贫困地区更甚。

(三)中国可借鉴的日本老龄化政策

第一,改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贫困地区承担的养老金费用要比中东部地区的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养老政策,根据地区的经济情况设定适当的养老金费用。目前许多国家开始了年金计划,年金计划是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它是允许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和个人上缴一定年限的养老金,在个人退休后可以定期获得收入。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企业还不够积极,缺少相关意识。为了促进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采取税制上的优惠措施来刺激企业缴纳年金。

第二,制度的设定要适应本国国情。日本老年人医疗保险一直随着本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基准而调整。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比重处于高位,享受着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日本实行了“国民皆保险”。随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不得已日本自1983年起废除了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实行由各种保险分担医疗保险费用的方式。随着日本迈入超老龄社会,日本政策的医疗负担更加繁重,因此日本为65岁至75岁的老年人制定了前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而为75岁的老年人制定了一项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通过各种制度间财政支出的调整来减轻高龄者医疗费用的巨大负担。由此可见,日本每一次对于养老医疗费用的变革调整都很好地做到了与本国形势相适应。因此中国有必要根据本国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调整和制定出更加贴合本国国情的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

第三,扩大福利机构建设方面的支出。相对于中国农村地区来说,城镇地区更有福利机构保障的需求,由于农村住房较为宽敞,老年人可以与子女同住,进而能够得到相应的照顾。然而城市住房面积一般较小,老年人一般不与子女同住,因此会缺少子女的照顾。同时城镇里大部分福利机构为私营,不仅费用高而且各个福利机构水平标准参差不齐,专业度得不到保障。面对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在财政上扩大老年福利支出,整顿私营福利机构的经营。2017年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30.72%,而同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仅为3.02%(仅统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①另外还需注意对护工人才的培养,中国缺少这类专业人才,由于这份职业得不到重视,护工不仅收入低,而且社会地位也很低。在当今中国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在教育方面应该开设相关课程,培养护工人才,提高护理人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第四,为老年人就业创业提供财政补贴与优惠政策。据厚生劳动省可知,拥有70岁以上人群仍可以就业制度的日本企业在2022年达到了39%,超过2012的二倍。由此可见日本对于老年劳动者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日本自1971年便出台了《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强制

^① 数据来源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社会保障费用统计(平成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

性对企业要求“三选一”政策,即继续雇佣老年人、延长老年人退休年龄、废除退休限制。2021年日本正式实行《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强调将老年人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相比而言,中国一直缺乏对于鼓励老年人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顶层设计,部分地区提出的鼓励老年人就业措施即使提出也只是流于表面,未能有真正的实施效果。因此,中国可以仿效日本设立相关优惠政策与老年人就业创业的财政补贴,以降低本国老年人的赡养负担。从财政补贴上,政府可以要求企业只有与老年人签订长期有效的雇佣合同才能够领取一定补贴,而补贴标准可以参考老年人的工资比例;而从优惠措施上,对于老年人创业公司和雇佣老年人的企业均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政策。同时,政府还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鼓励老年人就业创业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需要贴合本国的经济形势与老龄化进程发展阶段而不断加强就业创业老年人的保障程度,例如为老年人设立工伤保险、要求企业改善工作环境以适应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第五,完善生育制度。在日本老龄化发展进程中,日本政府一直不断出台或调整政策制度以缓解老龄少子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在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该意识到三孩政策对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的重要意义。在政策层面上,中国应积极加快落实生育保障措施,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减轻适龄人群的生育之苦、育儿之忧,才能提高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在育儿方面,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鼓励生育,当今社会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生活压力和育儿压力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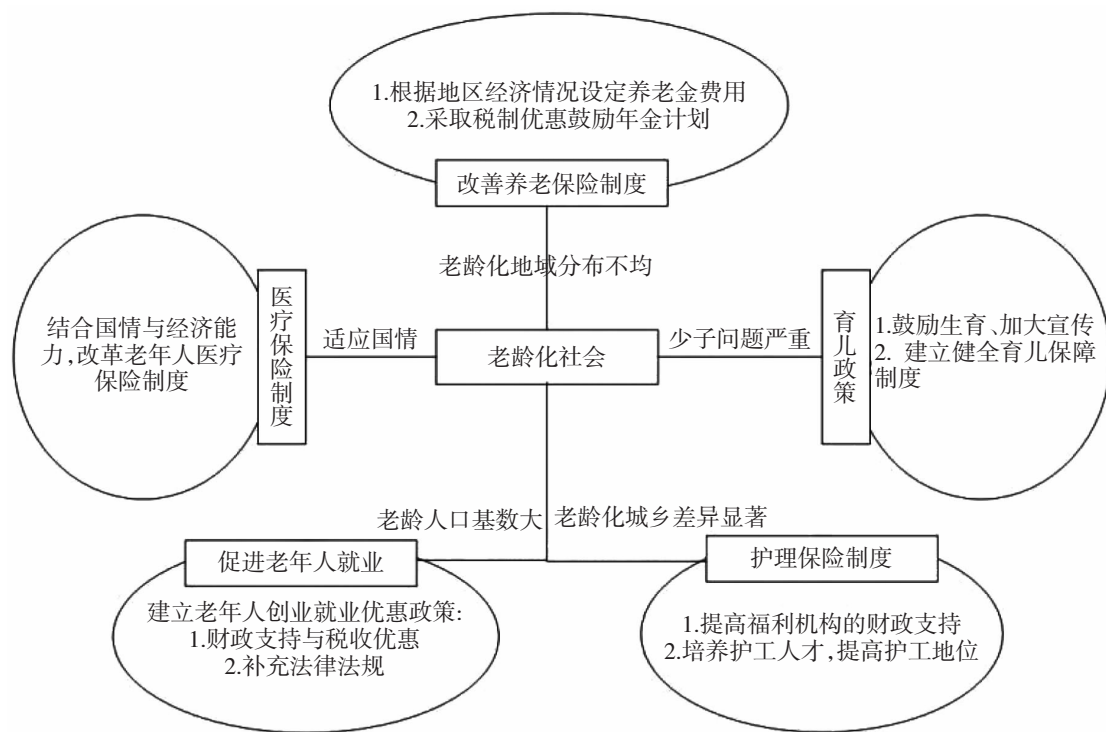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借鉴日本老龄化政策体系图

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消除中国家庭的育儿担忧,提高家庭生育儿女的意愿,提高本国出生率。另一方面是通过健全完善育儿保障制度,通过制度设计给予中国家庭育儿支持,降低育儿成本,从而提高中国夫妻的育儿积极性,缓解中国少子问题,同时也可以加强对于幼儿监管机构的监察与管理,在父母忙于工作之际可以减轻育儿压力,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家庭的育儿担忧。

结 语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其到来无法逆转,其趋势无法阻挡,而其带来的各项问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把握好人口老龄化这一战略契机,注重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带来的市场供需变化,在挑战中寻求经济增长的再发展机遇。同时,在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中国要从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到保障老年人“幸福生活”,做到老有所依、幸福安康。

地位寻求、同盟关系与日本对美国的追随策略

梁嘉伟

内容提要 “印太战略”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但该概念却被美国政府推广且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日本其后也表现出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的动向,其原因与日本寻求国际地位进程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密切相关。日本为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利用美国“印太战略”推行自身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求实现“借船出海”的目标。而美国又以安全保障为筹码约束日本,使日本在关键议题上与美国达成统一。本文从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的视角,思考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立场上追随行为的本质,并以日本在台湾问题立场上的对美趋同为案例具体考察追随战略的生成逻辑。

关键词 日本外交 地位寻求 同盟约束 印太战略

作者简介: 梁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真心实意配合美国?——日本参与印太战略的多重考量分析”研究成果(编号 202403600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日本为提升自身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力推行以“自由”、“开放性”、“多样性”、“包容性”和尊重“法治”为核心的“印太战略”。^①“印太战略”作为一种服务日本国家利益的区域战略,自安倍内阁提出后不断深化。日本通过参与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和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等已经显著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需意识到日本并非单纯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地区架构,同时也有寻求自主性和领导力的意图。例如,日本借助对东南亚和南亚的官方安全援助(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实现自身防务输出、强军扩武的目标,该计划独立于美国设置的地区架构之外。日本同南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合作亦体现出上述意图。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众多、泛安全化色彩浓重,是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②日本历任政府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也实实在在地为了这一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战略做了不少工作。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地区大国的日本在参与美国“印太战略”上表现出了在关键议题和利益冲突议题上同美国一致的行为选择,日本在“印太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受什么影响导致其行为选择范围由自主宽泛缩小至向美国靠近。这种靠

① 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95351.pdf>, 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7 日。

② 王旭、徐永智:《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2 期,第 100 页。

近或说一致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日本在参与美国“印太战略”过程中的行为转变?威胁认知、安全诉求还是战略文化、经济贸易抑或其他?其背后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本文认为日本为扩大其自身实力、影响力的地位寻求和由非对称性同盟带来的同盟约束影响了日本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进而导致了日本积极融入美国“印太战略”而遏制中国。

二、研究评述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十分丰富,具体涉及生成原因、动态追踪、地缘政治、对华战略遏制、安全合作、国家战略对冲等领域。这些研究与本文所讨论的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关系不大,在此不再赘述。从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视角分析日本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但从理论层面讨论地位寻求和同盟理论中关于同盟约束的成果却很丰富。本文基于“日本为何追随美国”以及“日本为何/如何寻求国际地位”等问题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一)国家为何选择追随

“追随”(Bandwagoning),在英语中本意为“随波逐流”。国际关系中的“追随”概念最早由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引入,他将“追随”视为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政策,指加入更为强大的一方。^①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则将“追随”理解为“与危险源保持一致”,其涉及不平等的交换,易受伤害的国家对主导者作出不对称的让步,并接受附属者的角色,这意味着愿意支持或容忍主导国的非法行为。^②从赖特到沃尔特,国际政治中追随的概念不断精细化,本文倾向于沃尔特的定义,日本在对待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向美国作出不对称的让步,忍受并支持美国非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这种追随是以安全焦虑为原因的被动式追随。岳小颖认为,国家出于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获取利益以及趁机扩大影响力的动机,也会采取追随行为,这种“追随”是主动的。^③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在对沃尔特的“追随”命题背后的逻辑进行考证批判之后,将“追随”定义为“加入强大的国家或同盟”,认为国家选择追随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扩展未得利益,因为利益诉求决定了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而非权力的不平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④施韦勒从“追随”概念本身的范围上对沃尔特的定义进行了增补,考虑到了除受安全威胁以外的修正

① Quincy Wright, Abridged by Louise Leonard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136.

②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2, 1988, p.282.

③ 岳小颖:《国际政治中的‘追随’理论》,载《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9期,第35-36页。

④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

主义国家或者是未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存在。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题为《志同道合的盟友？印太伙伴组织对美国与台湾关系可能发生变化的看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日本赞成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多种形式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类似的政策，且日本把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视为美国对自身安全承诺减弱的信号。^①日本追随美国的最主要原因是美日同盟关系中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如果美国不干涉台湾问题了，日本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进而美国对日本安全保障承诺的可信度也将大打折扣，日本恐惧在联盟中被“抛弃”，只能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一致。对此，凌胜利和李航还从威胁认知角度探讨了美国亚太盟友对美追随的差异性。^②杨鲁慧和李彩军从威胁、利益和决策者认知三个角度，对英国、日本和泰国对美国追随政策进行了对比研究。^③此类研究日本追随美国的文献量较多，且大部分从同盟关系和安全焦虑角度出发。然而，将日本自身地位寻求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停留在日本自身发展与美国利益一致时，而对美国的追随行为。日本在追随美国时，势必是以自身利益作为首要出发点，如果没有日本自身的地位寻求和利益追求为出发点，又何谈追随美国呢？

（二）国家为何追求国际地位

地位是指对国家在某种重要属性上——财富、文化、社会政治组织——所处位置的所持有的集体信念。^④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在人类社会的日常实践中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几乎所有人和国家都渴望更高的地位。此外，更高的地位则可以带来一些现实或潜在的利益和好处，这是追求更高地位的有形收益。当然，追求更高地位也会有很多无形收益，诸如国际承认、国际影响力、国家声誉等。从地位政治角度来说，地位寻求是一国发展的自然行为。还有学者从相对收益、获得感来谈地位寻求，史蒂芬·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指出，“也许地位很重要，不是因为我们赢了之后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享受战胜其他人的过程，也就是胜利的行为本身，而不是胜利的实际后果。”^⑤这种相对于他国比较带来的相对优势而带来的获得感也是国家追求地位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国家过分关注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引发的地位迷思（myth of status）会导致崛起国战略透支。所谓“地位迷思”指的是，崛起国沉迷于国际地位追求，甚至于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成为了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

① “Like-Minded Allies? Indo-Pacific Partners' Views on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739-7.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6日。

② 凌胜利、李航:《规范认同、规范威胁与亚太盟国对美追随差异——基于涉华政治议题的分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25页。

③ 杨鲁慧、李彩军:《追随理论视角下国家追随行为研究——以泰国、英国、日本对美追随政策为例》,载《国际观察》,2018年第5期,第95-96页。

④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

⑤ Stephen Peter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3.

点。^①

地位政治视域关注于国家对地位的追求如何影响其外交战略与政策,包括获取武器、结交友盟、加入国际机构、爆发冲突等。一国追求地位的提升有很多路径,社会认同理论从国家获取地位的手段来阐释地位追求,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认为国家获取地位的方式有三种策略——竞争策略、模仿策略和创新策略。^② 社会认同理论归纳了三种社会群体追求地位的方式社会流动、社会竞争和社会创造。社会流动指通过模仿高地位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或制度等来实现地位的跃升,加入精英俱乐部;社会竞争指通过在其拥有优势的领域内,与高地位群体达到平等甚至将他们超越,来达到地位的伸张;社会创造是指将消极属性重新定义为积极属性,或者强调不同领域的成就。^③ 还有学者将地位追求策略分为耐心进取和强势竞逐两种理想类型:前者指国家宁愿承受较高时间成本也要在和平环境中争取外界逐渐改变承认态度,是时间成本高但冲突风险小的地位追求策略;后者指国家宁愿承受较大冲突风险也要在较短时期内驱使外界明确转变承认态度,是时间成本低但冲突风险大的地位追求策略。^④ 铃木彰吾(Shogo Suzuki)利用这一理论,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从合法性角度来论证大国寻求国际地位的相应策略。^⑤ 这些研究已对国家追求国际地位的方式做了很详细的研究,本文则将地位追求作为影响一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论证。

(三)同盟约束

同盟约束简言之就是在非对称同盟关系下,盟主国利用安全保障作为筹码约束盟友国行为的过程。约束方式具体表现为安全约束、延伸威慑等。强国与弱国结成非对称同盟时,强国将同盟用于追求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方向,弱国通过提供军事基地或国内外合作等方式向强国提供支持,自己则从强国那里获得应对外部威胁的安全保障。^⑥ 弱小国家可以通过结盟获得很多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全保障,而强国结盟也不是赔本买卖,强国可以通过结盟获得驻外军事基地、安全合作、国际承认以及关键议题上对盟友的支持等实在利益。结盟诉求的差异和国家间实力的不平等导致了非对称同盟的产生,美日同盟就属于这一类型。李冲和漆海霞从盟主国声誉和盟国对盟主国安全依赖角度出发,提出了安全依赖对盟主国声誉的调节作用理论。如果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高,盟主国声誉越好,自身

① 丁思齐:《地位迷思与崛起国的战略透支》,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3期,第47页。

② Larson D W and Shevchenko A,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王福泽:《地位政治视域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第27-30页。

④ 刘博文:《国际承认、国内政治与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第5期,第102页。

⑤ Shogo Suzuki, "Seeking 'Legitimate'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s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UNPK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1, 2008, pp.45-63.

⑥ 朴东吉:《非对称同盟关系约束下韩国在美韩同盟中的能动性作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页。

被牵连的风险就越高。此时盟主国会对盟国采取约束措施,盟主国声誉主要发挥约束效应。盟主国的声誉越好,盟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越低。^①显然,日本属于对其盟主国安全依赖程度较高的类型,这种理论有其学理性和应用性所在,但这种理论是从冲突产生角度来考虑同盟约束效应,本文更多的是从施耐德(Glenn H. Snyder)“联盟安全困境”视角考虑盟国因面临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而不得不做出的履行承诺行为。^②进而分析日本参与美国“印太战略”过程中在涉台问题立场上所受同盟约束的因果机制。

三、核心假设与分析框架

影响一国战略行为选择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决策者个人的认知心理因素、官僚政治因素、战略文化因素等,笔者认为日本参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行为态度主要是受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两因素影响,具体影响流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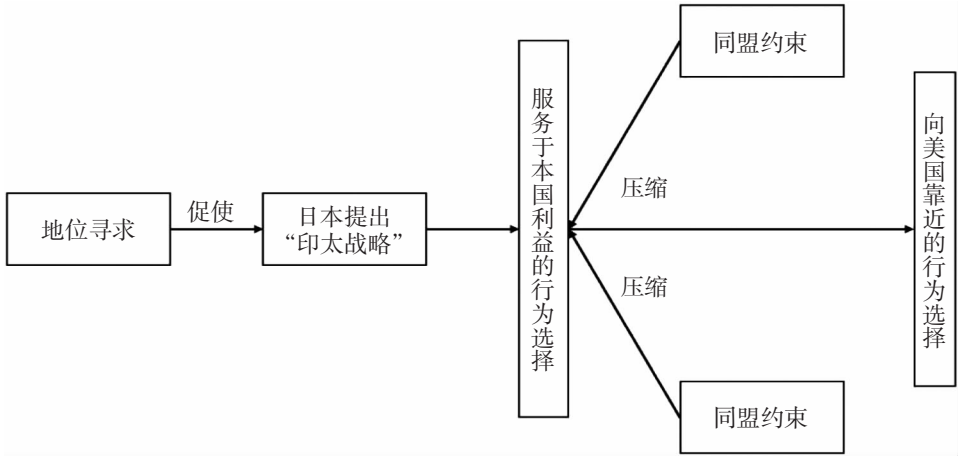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参与“印太战略”行为选择逻辑简图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民众对提高国家尊严的诉求以及对安全 and 经济优势的追求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这种诉求可能比其他任何大国的民众都强烈。^③对于国家地位的追求已经植根进入了日本国家和民众的行为中,民众呼唤国家做出更有为的外交政策,国家也正按照民众所期望的去逐步制定本国国策。英国学派的学者们长期以来已经认识到存在一种独立的国家实体,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还享有社会承认作为“合法大国”的地位。日本中的地位寻求在本质上是寻求更广泛的国际承认,且地位只有通过国际承认才能体现出来。正是这种地位追求促使了日本最先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进而一步步将其塑造为

① 李冲、漆海霞:《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与冲突爆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第27页。

②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479.

③ Ronald Dore, *Japan,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U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98.

服务国家利益的综合性国家战略。

地位寻求是指国家为维持或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所采取的对外行动。国家寻求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地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地位不仅可以协助一国在与他国的战略互动中取得优势,还可以提升他国对本国的尊重。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等级社会”,国家需要通过自身绝对实力和他国的承认来界定自身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一国荣誉实现的过程。较高的国际地位通常意味着拥有更多特权、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更强的安全感。^① 国家热衷追求地位主要源于人性的心理特质和工具理性。国家之所以关注并追求地位,本质上在于人类对荣誉、自尊、威望和权威的渴求,正因为如此,国家会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下展开地位竞争。^②

从地位寻求角度来看,日本追求自身国际地位、承认、影响力的扩大化。日本追逐本国利益具有排他性,即无法在扩张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对其他国家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日本也不可能完全迎合来自美国的“印太战略”,日本在涉外立场上还是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基础。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总会在成本和收益中做出考量,日本会利用“印太战略”中可以促进自身国家发展利益的部分,日本也会放弃掉其中不符合自身国家发展利益的部分。

美日同盟这一对非对称性同盟中盟主(美国)对盟友国(日本)有安全保障的责任,反而日本也有承认美国、与美一致的义务。日本对于“印太战略”中不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部分(就本文的案例而言,即在台海局势上与中国挑起争端)理应表现一种拒绝、沉默或中立态度,但由于日本同时受制于以美国为盟主的同盟约束,美国利用安全保障这一筹码将日本从以本国利益出发的宽泛对外行为选择范围压缩至与美一致,尤其是在当下日本对华威胁认知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显得这一约束更为有力。日本会出于惧怕同盟破裂被盟主“抛弃”所带来的安全危机而迫使自身对外行为态度向美国靠近,这一靠近尤其体现在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同盟中的利益纽带和安全保障要求日本不能抽身保持中立,必须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结果自然是日本加入同其最关系最好的盟友——美国一方。作为一个正在失去优势的非典型地区强国,在政治大国实现无望,经济大国地位又受到挑战,国内政治亦变局迭生的背景下,日本迫切希望避免在东亚被边缘化。然而,日本深知自身无力单独扭转这一局面,促成一个制衡中国的集团,便成为日本决策者的重要战略目标。^③

作为区域性大国,日本在参与“印太战略”进程中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主,不断寻求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承认,这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发展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日本在积极寻求国际

① 孙志强、张蕴岭:《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英国脱欧后的对外政策调整》,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0页。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s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8.

③ 唐小松、张豪杰:《地区强国缘何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以印度、日本为例》,载《国际观察》,2024年第1期,第121页。

地位的过程中,自身的国家战略势必占据主导地位。日本虽首次提出了“印太战略”这一概念,但真正使该战略从共同价值层面发展至涵盖众多国家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还是由美国推动并完成的。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最忠诚盟友,起着“民主桥头堡”的作用,日本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可帮助其实现国际地位提升和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部分加以利用,表现出主动、积极参与的行为态度。尽管美日两国的基本战略利益具有相当的兼容性。然而,由于不同的力量对比、不同的利益认知、不同的战略取向和相异的政治文化,这一双边同盟将难以逃脱常规的联盟困境。^①

施耐德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② 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③ 盟国借助盟主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盟主以保护盟国安全的责任作为约束盟国对外行为的筹码。日本正是因为出于这种怕被抛弃的“担忧”,即自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日本才会在对外行为上受到盟主美国的同盟约束,进而在参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受制于美国,表现出在台湾问题上与美行为一致的对外选择。

四、案例研究

近年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愈发强硬,且同美国态度愈发一致,日本某些政客甚至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是一个国家”等错误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最早出自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21年12月1日,安倍在台湾智库组织国策研究院举行的座谈谈及台湾问题时,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る),称中国大陆若武装入侵台湾,将对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此等错误言论至今已提出3年有余,日本政坛仍是每隔一段时间,每当台海地区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把“台湾有事”搬出来炒作一番刺激中国的神经,日本政客对于“台湾有事”的使用已经达到一种极其恶劣的程度。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于2024年10月22日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选举游说时则提及台湾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国家”。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日本大打特打“台湾牌”,某些激烈的言辞已然超出同美国一致的对外行为选择,在一些议题上比美国更要激进,充当起美国“印太战略”中遏制中国的东亚急先锋。

2021年4月16日,拜登在白宫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会后,日美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时隔52年再度提及台湾——这是自1969年尼克松与佐藤荣作会谈以

① 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15页。

②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1, 1990, p.104.

③ 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9年第5期,第19页。

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1969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当时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为“首相表示,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那时中日两国之间还没互相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中日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第三条已经写的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①此次联合声明中直接提及台湾问题“我们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②虽然表述没有使用过于强硬的词语,但任何国家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坚决不允许任何域外国家干涉,更何况在两个国家官方政府的联合声明中提及。此次日美联合声明重新提及台湾问题也就意味着日本在参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其行为选择已与美一致,且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向后倒退了52年。此事件还在海外引发了广泛(尽管经常具有误导性或不准确)的断言,即日本对“台湾意外事件”的立场已经突然或根本地发生了变化。^③

日本干涉台湾事务有很多原因,诸如殖民历史、安全考量、遏制中国崛起等。但这些原因不是本节讨论的重心,本节主要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态度与美国一致这一现象作为案例,从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角度来分析日本在参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行为选择为何与美国一致。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这两种因素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两种因素的共同刺激下,日本选择参与美国“印太战略”联合制华,并利用自身在台湾问题上与美一致甚至有甚之的外交立场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具体逻辑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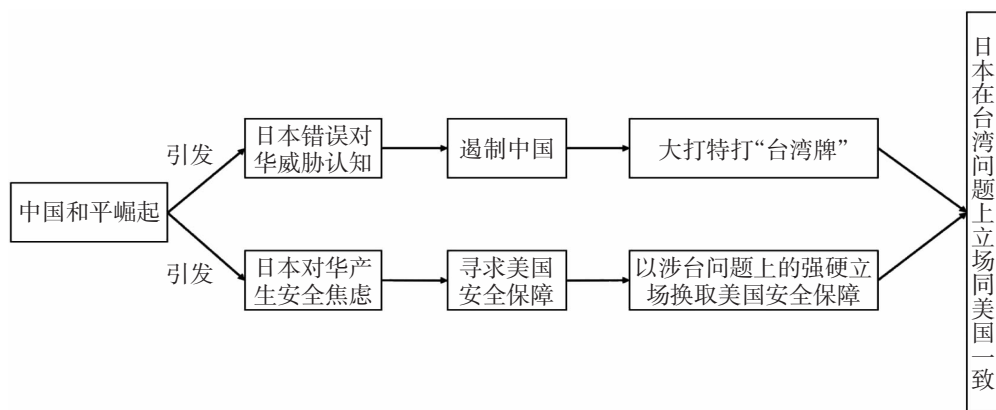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同美国一致逻辑图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①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1207_676848/197209/t19720929_269810.s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7日。

② 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令和3年4月16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8.pdf>,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7日。

③ Adam P. Lif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aiwan,” *Asia Policy*, Vol.17, No.3, 2022, p.126.

(一)地位寻求

日本为实现本国的发展追逐提升自身国际地位,获得更多国家的承认,期待更强的国际影响力,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会从国际体系上影响日本的地位寻求,客观上压缩日本的发展空间,日本则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影响其发展的政治和安全威胁,这种错误的对华威胁认知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了战略误判,进而日本不断强军扩武,对外防务输出,大搞经济安保,提升自身“反击能力”。日本为寻求其误认为被中国所压缩的发展空间在对外行为上选择遏制中国,而不断炒作台湾问题只是日本为实现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工具。2022年12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三份新版安保战略文件,它们分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備计划》。这些修改后的文件明确指出日本将拥有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①将增强长射程的导弹;文件还称,在2023-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用总额将达到约43万亿日元(约合2.18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于2019-2023财年约27万亿日元,防卫费用增长了近60%。此次通过的“安保三文件”关于“反击能力构建”及“扩充防卫开支”等内容,标志着岸田内阁在延续日本右倾保守主义路线及推动军事大国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将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转折。^②此外,据日本外务省官网中有关官方安全援助(OSA)的表述,由于日本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中,日本必须大幅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并增强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和威慑能力,以防止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特别是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创造一个对日本有利的安全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官方发展援助”外,日本还决定为武装部队和其他有关组织建立一个新的合作框架——“官方安全援助”,根据各国的安全需要,提供物资和设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援助。^③日本内阁于2022年12月16日批准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就明确提及了官方安全援助。

日本在2023年防卫省白皮书中将中国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对中国的评价是“中国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快速增强包括核导弹战斗力在内的军事力量,同时在东海和南海继续并加强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及其企图。”^④日方把我国在南海、台湾地区、钓鱼岛等地合理合法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的巡航、海警船驱逐、航载机起降等行为解读为“战略威胁”,通过构建“假想敌”的方式不断扩大对华威胁认知试图阻止中国在亚洲大陆日益增长的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OF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e.pdf>,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1日。

② 孟晓旭:《岸田内阁新“安保三文件”评析》,载杨伯江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225-226页。

③ MOFA,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 https://www.mofa.go.jp/fp/ipc/page4e_001366.html,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1日。

④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wp2023/DOJ2023_Digest_CH.pdf,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1日。

地缘战略影响力。^①此外,日本在2023年防卫省白皮书中还提到,要想彻底捍卫国民的生命和生活,必须通过努力做到“自己国家要靠自己保卫”,不断提高威慑力,也就是说,必须让对方认识到“即使攻击日本也无法得逞”。^②这类表述在日本政府的多数安保相关的文件众屡次出现,这体现出日本不断要求“安全自主”,一改战后日本安全依附美国的“吉田路线”。

(二)同盟约束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行为选择同美国一致,甚至在一些议题上态度更为激进,表现出积极充当美国“印太战略”中遏制中国的东亚急先锋。日本为何会采取这种行为?本文认为美日同盟这一对非对称同盟中的同盟约束(尤其是美国对日本在安全层面的承诺)是日本采取该对外行为的主要原因。

日本将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解读为限制自身发展的政治和安全威胁,这种错误的威胁认知导致的安全焦虑使得日本和能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同盟国——美国愈发接近,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一致甚至更有甚之,正是日本以外交立场交换盟友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的最好体现。《日美安保条约》本质上是“用驻日美军基地换取美国安全保护的贸易”,这和北约第五条有关集体自卫权的声明差异很大。^③

自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因为惧怕来自周围三个拥核邻国的安全威胁,不断加强美日同盟,屡次强调美国“延伸威慑”的重要性。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认为,“延伸威慑是拥有核武器的一方依赖其核威慑力给予友邻或盟国的核保护,是将敌对双方以防卫彼此领土为目的的核威慑延伸到防卫第三国的程度。”^④简言之,就是把敌对双方以防卫攻击彼此本土为目的的核威慑,延伸到以防卫攻击彼此友邻、盟国的程度。日本是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坚定倡导者,面对周围三个拥核国家的安全焦虑使其坚定的加入美国“延伸威慑”体系下的核保护伞以维护自身安全。日美外长、防长于2024年7月28日在东京召开了关于延伸威慑的美日部长级会议。在会议上,部长们强调了“面对来自中国、朝鲜、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和日本重申需要加强北约的威慑态势,并通过威慑、军备控制、降低风险和扩散来管理现有和新出现的战略威胁。”“部长级会议在加强威慑方面的重要性,并确认两国将通过延伸威慑对话(Extended Deterrence Dialogue, EDD)继续探索如何最好地加强延伸威慑,以促进地区

^① Rafyoga Jehan Pratama Irsadanar, “Japan’s Security Policy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Shinzo Abe Administration: Case of Japan – Indonesia Security Cooperation”,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 No.2, 2023, pp.190–222.

^②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wp2023/DOJ2023_Digest_CH.pdf,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1日。

^③ 其具体内容为:一旦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外部武装攻击,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应将此视为对整个北约联盟发动的攻击,并有权单独或集体行使《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利,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行动,为遭攻击的成员国恢复和维护安全。参见, NATO–Topic: Collective defence and Article 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10496.htm,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0日。

^④ Morton Kaplan,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Retaliati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cy Memorandum*, No.19, April 9, 1959, p.79.

稳定并阻止冲突的爆发。”^①

此外,除了来自邻国拥核国家的安全威胁以外,俄乌冲突对于国际秩序产生的巨大挑战,使得日本恐惧俄乌冲突危机外溢到“印太”地区进而威胁其自身安全。由于恐惧俄乌冲突危机外溢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刺激日本同美国走的更近,把美日同盟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视为维护自身安全的唯一出路,美国通过安全保障这一筹码,通过“延伸威慑”等手段,将自己盟友日本的安全命脉牢牢掌握在自身手中,在自身战略目标——遏制中国上,对日本施以安全约束,使其在台湾问题这一重要问题上立场同自身一致,美国甚至可以用安全为筹码让日本充当“马前卒”,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加强硬。从此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行为选择同美国一致,甚至在一些议题上态度更为激进便不足为奇。总而言之,日本受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两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上采取了同美国一致的对外行为选择。

五、结 语

本文基于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的视角研究日本参与“印太战略”过程中为何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同美一致问题。研究发现,在参与“印太战略”过程中,作为盟伴国的日本应从地位寻求的角度顺应本国利益诉求,不在中美竞争大局中选边站队。同时,日本不会用“打台湾牌”的形式挑战邻国中国,以恶化自身外部安全形势。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以安全保障为筹码的同盟约束在台湾问题上选择同盟主国美国立场一致,甚至更有甚之地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为激进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地位寻求和同盟约束的视角对该问题做了初步的解释,但仍然存在理论性不够强、学理化程度不够深、论述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如果更进一步研究该问题,还需要将解释因素和解释框架进行学理化和理论化的打磨,进一步思考我国应该采取哪些办法冲出美国布下的“盟伴体系”包围圈,以缓解我国东南沿海的巨大战略压力和安全威胁,争取为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日本参与极具遏华性的“印太战略”对中国和平发展增添了巨大战略压力和安全威胁,对此,应该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持续跟进以期待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做出研判。石破茂上台以来,在其竞选期间屡次提及的“亚洲版北约”没有出现于其就职演讲,这并不代表日本遏制中国的结束。石破一直在竞选期间提及的重塑日美同盟关系,曾建议日本政府管理在日美军基地,并提出日本自卫队在美国建立军事设施,以改变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②石破即使在竞选期间言辞极尽激烈,也在其上台后转为进一步巩固提升美日同盟。只要中美仍处于战略竞争,日本的选边站队(靠美国)的姿态恐怕也不会改变。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时刻保持高度战略警惕,知己知彼,才能在并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S.-Japan Ministerial Meeting on Extended Deterrence”,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u-s-japan-ministerial-meeting-on-extended-deterrence/>,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0日。

^② 廉德瑰:《日本“对美平权”依然前路渺茫》,载《环球时报》,2024年10月14日,第14版。

反叛的学问

——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中的战后思想

李承坤

内容提要 明治时期,幕末武士阶层重新被激发的“谏诤”精神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传统武士精神的全面替代。与此同时,日本国民被卷入一场以天皇为中心的忠诚竞赛,忠诚对象的高度集中虽短暂维持了政治稳定,但却因缺乏主体性而呈现出病态和脆弱,最终成为昭和 Japan 走向对外侵略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一过程揭示了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逻辑,尤其是通过天皇制的运作和对社会底层的反叛力量的系统性削弱而得以巩固的动态机制。在丸山的语境中,他对近代知识分子与民众欠缺主体性意识、对战争责任反思不足的批评贯穿始终。因此,将“忠诚与反叛”问题置于丸山对“无责任”意识批判脉络中重新思考,不仅深化了对其思想的理解,更为探讨国家与战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丸山真男 忠诚 谏诤 军国主义 战后日本

作者简介: 李承坤,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23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生)”(留金选[2023]49 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丸山真男被誉为日本战后思想界的进步派知识分子的先驱,其战后思想主要聚焦于如何实现市民自由和民主主义等日本近代化的核心问题。1960 年,作者以“忠诚—反叛”为视角重新探讨了日本思想史中的现代性问题。这篇文章被列为 1992 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忠诚与反叛》的首章,足见其在丸山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探寻丸山战后思想的演变轨迹,不禁令人追问:丸山执笔“忠诚与反叛”的用意何在?在日本战败十五年后的这一时点,他是否通过此文唤醒国民的责任意识?本文旨在回归文本,追溯丸山政治思想史的根源,并考察他如何在特定时空中介入战后日本社会的复杂局面,从中剖析昭和 Japan 的问题症结。

一、丸山真男的思想根源:从权力批判到“忠诚与反叛”的理论探索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明治时期的国民行动所体现的忠诚与反叛观念,横亘在历史惯性的延长线上。若进一步追问明治日本从幕府旧制中抛弃了怎样的精神气质?答案在于武士阶层的主体性意识,即谏诤精神。《“忠诚与反叛”》的核心并非聚焦于忠诚对象的具体描述(忠诚于谁、反叛什么等明治时期的混乱表象),而是以明治日本为背景,展开对忠诚与反叛观念的原理性讨论。一方面,丸山认为,在儒教等正统思想的绝对垄断

下,明治国民不具有从时代的给定条件当中跳脱出来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也指明了昭和时期日本社会的诸问题势必要从明治时期的社会语境和思维范式中加以回溯和反思。

较之幕末,维新运动后的日本社会在接受外来制度的过程中,传统忠诚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受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丸山利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方法,揭示出了传统忠诚中蕴含的非理性因素。他指出,“比起合乎目的的筹措或呈现在外部的结果,信念的纯粹性越来越多地被当成忠诚的证据;比起道德义务,它越来越像一种宗教行为。”^①在丸山看来,忠诚与反叛并非互相排斥的对立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家产官僚制下静态的忠诚有所不同,江户时期武士阶层的忠诚更体现为一种动态的行动方式,其特征就在于能灵活应对复杂的现实状况。然而,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再到军国主义逐步抬头的时期,这种“动态忠诚”经历了深刻转变。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忠诚的内在张力逐渐瓦解。一方面,它被用来强化国家对个体的全面控制;另一方面,它被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所侵蚀并极端化,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和道德平衡力。最终,日本帝国在军人干政的误导下,滑向了法西斯化的深渊。

江户幕藩体制通过儒教、朱子学等伦理思想,强调君臣义礼及上下尊卑,以维持其统治秩序。虽然德治思想在官方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幕府在实际统治中更多依赖法治和经济控制(如参勤交代制)来巩固权力。然而,随着幕藩体制濒临崩溃,忠诚观念也随之转型。从效忠具体主君(如大名),逐步转向对超越性原则(如天皇制或国家主义)的忠诚,这一转变是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变迁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武家思想中以道义约束或隶属形式维系的封建忠诚关系(如君臣义理、主从契约)逐渐被近代民族国家的忠诚观念所取代。这种“封建忠诚”的解构,不仅带来了其内含的反叛精神的瓦解,也使忠诚与反叛之间的张力更趋复杂。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利益至上观念在明治维新后的社会转型中逐渐盛行(尤其在昭和初期军国主义抬头之际),对“忠诚”和“反叛”的定义权成为权力争夺之焦点。这种变化最终促使忠诚观念的内核解体,也点燃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火药桶”。

丸山在战后对天皇制国家的思想结构提出了猛烈批判。^②他指出,政治权力本质上具有“自我目的化”和“统一化”的倾向,即权力倾向于以自身的延续与扩张为目的,并试图将多样性的社会整合为单一的服从性体系。这一倾向在压制了个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同时,试图重塑个人的价值观念与行动方式,因而构成了对“私”领域的侵犯和威胁。为应对权力的这些特性,丸山进一步强调,“抵抗精神”是批判权力并维护主体性自由的核心条件。换言之,自由的信仰并非权力的恩赐,而是通过对权力保持自觉批判和抵抗意识而获得的。这里的抵抗精神并不必然走向革命或激烈的政治批判,但要求从根本上摒弃信仰与政治权力合一的理念,以保障信仰的独立性。^③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丸山的研究并非仅仅关注明治时期的历史还原,而

① [日]丸山真男著,路平译:《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② 参见西田毅「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学』1999年、第31期。

③ 李鎔哲「政治権力と自由(下)丸山真男の「信教の自由」論を中心に」『中央学術研究所紀要』2001年、第30期、137頁。

是以明治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笔下的大量史料为依据，试图描绘从幕末到战后日本社会意识变革的全貌。他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叙事，深入揭示了权力与个人、社会之间的复杂张力，进而探索抵抗精神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生成和演变。

二、天皇统治下“忠君爱国”思想的内在矛盾与反叛性

明治时期，日本在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随着封建君臣关系的解体与国民国家意识的形成，以“忠君”为核心的忠诚伦理逐渐弱化，而“爱国”作为更具普遍性的观念，逐步凌驾于君臣关系之上。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忠君”与“爱国”之间的排他性逐渐被解构，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反映了现代国家转型中权力结构和国民认同的双重变革。丸山引用了植木枝盛在《论人民对国家的精神》（《爱国新志》第13-16号，明治十三年[1880]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五日）中的观点，认为“从国家(nation)意识中再分化出政府(state)意识和国民(people)意识的阶段。即使不如植木这般彻底，几乎所有的民权论者也都强调政府的首长或代表者，与国家(nation)本身是有区别的。”^①这种意识分化标志着国民身份的双重性——既是国家的臣民，也是政治参与的主体。

当谈到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多元身份认同下的政治参与亦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植木所谓人民是否内生出了“身为人民者成了完全的人民”之意识，便是评判和衡量人民对于国家理解处于何种阶段的标准之一。然而，国家意识的转型并非是线性发展的。在实际政治中，这种分化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撕裂，“忠诚”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面对这种撕裂，知识人不仅未能以对抗姿态应对之，还因其政治无力感而选择沉默。因此，丸山才更加强调积极的公共参与和构建政治讨论场域的重要性。^②尽管丸山在本文并没有就此展开过多评述，对于知识人和人民也未另作区分，但不难窥见他对知识人的沉默所表现出的不满。直至近代国家产生之后，衍生出了国民意识和政府意识，忠诚观念中的“爱国”和“忠君”才有了各自对应的投射对象，而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定义权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诚然，掌权者若仅依靠定义和垄断忠诚观念，难以在现实层面真正实现统治国民之意图。因此，通过回溯历史并强化如“万世一系”神话的方式，天皇的正统性才得以确立，尤其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抬头之际，通过强化历史叙述与神话建构，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并进一步为战争动员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帝国殖民地亦未能幸免，被置于与日本内地“同源同祖”的历史延续之中，并被裹挟进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歧途。显然，这并非自然演变或历史传承的结果，而是通过人为操控和政治设计所促成的。正因为如此，与上述神化观念相悖的“吾等凡人非神之宿命”之非神化论难以自觉并转化到国民行动中。又由于个人放弃主体性追求的

① [日]丸山真男著，路平译：《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② 李鎔哲「政治権力と自由(下)丸山真男の「信教の自由」論を中心に」『中央學術研究所紀要』2001年、第30期、137頁。

同时,选择跟随大势的态度,由此滋生的“无责任”之自恃,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崛起的重要社会土壤。由此可见,日本国民非理性地支持天皇发动战争,是政治塑造和国民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如佐藤瑠威指出,日本对外战争并非简单的历史错误,而是结构性问题的产物。^①这一论断契合了丸山对权力结构与社会环境共谋的深刻分析。“作为方法的哲学”也沉淀为一种问题思考的方式,为后来者提供了战争反思框架。

回到国民意识的问题,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针砭时弊的论点也引起了丸山的关注。内村从人类应有的同理心出发,将“爱国”与“爱人民”有机结合起来,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实际上“不可分割地从属于这两个(分别指在神的无限恩宠与荣光下恪守天职的日本与充满腐败、粉饰和伪善的日本——引者注)日本的内在意识”,这也是内村忠诚观的辩证法,即“难道有人生于日本而不爱日本吗?”。进一步地,从对“爱日本”具象化表现的辨析中,可以探讨国家这一虚体究竟与上述哪个实体相互关联,抑或为某一类型的意识形态代言。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民主精神结构发生了显著倾斜。家族观与部落共同体意识被强行吸纳进国体论体系之中,“祖国爱”在乡土爱的粉饰下悄然扎根到个人的道德观中。传统封建家长制的忠诚虽已被历史颠覆,却被重新动员起来,与国家意象相结合,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②

纵观日本的战中和战后,乡土意识中萌发出的与周边之人的连带感被法西斯军国主义切断,原有的内部牵引力遭到破坏,个人陷入孤立化和原子化的状态。在军国主义精神的欺瞒、美化与煽动下,日本民众非理性地陷入激进的行动主义,又在极短的时间内遭遇挫折,随后被统治者以“爱国”之名加以粉饰。^③丸山在《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中进一步探讨了战争时期的精神结构,深刻批判了极端国家主义通过瓦解个体主体性来强化对整体支配的机制。^④由此可见,战争责任最终在自上而下的“爱国”意识灌输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冷漠、对权力盲从以及放弃思辨的合流中遭到了抵消和淡化。面对这种困境,丸山试图以自身的“战争体验”唤醒国民沉睡的战后责任意识,敦促日本国民承担加害者责任,直面历史真相,摒弃逃避、诋毁、无视和沉默。如前文所述,他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近代和前近代的日本,也直指知识人在战争问题上的沉默与失语,包括对自身的省思。正是源于这种心境,才对知识人的“责任伦理”直言不讳。^⑤丸山真男、高桥哲哉、鹤见俊辅、小熊英二等学者基于各自的战争体验,

① 佐藤瑠威「カール・レーヴィットと丸山真男(2)ー学問と政治ー」『別府大学紀要』2000年、第42期、132、136頁。

② 板垣哲夫「丸山真男における内在と超越」『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2004年、第15卷、第3号、11-12頁。

③ 佐藤瑠威「カール・レーヴィットと丸山真男(2)ー学問と政治ー」『別府大学紀要』2000年、第42期、137頁。

④ [日]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页。

⑤ 松田博「吉田傑俊『丸山真男と戦後思想』(大月書店,2013年)」『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2014年、第49卷、第4号、152頁。

自发形成了“悔恨共同体”的共识。^①在这一共识推动下,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进行了深入界定。在东亚各国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下,围绕“慰安妇”、战俘和在日外国人等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这些长期被忽略的议题也逐渐浮现在大众视野中。

丸山揭露了日本从“封建忠诚”时代跳跃到“爱国”时代的缺陷和矛盾,并剖析了日本社会在理性爱国和非理性爱国之间的底层逻辑。当剥开这些互斥的“忠诚”意识表层,不难发现,明治日本非理性陷阱的本质便显露无遗。所谓的国家中心主义,无论在原理上看似如何进步,本质上不过是形式化和虚构化的意识形态。一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潮流中坚持底线,保持对武力扩张和膨胀的警惕与抵抗,方能真正走向理性的社会。

“忠臣还是国贼,只关乎正义,无关成败。”^②的观点,固然是价值导向的思想谬误,却在历史中表现出一定的现实逻辑。当“忠君”和“爱国”之间产生分裂时,正义的定义也将随之异动。在此时的极端环境之中,任何行为都可能被打上“反叛”的烙印。不难想象,当权力高度集中时,国民既要无条件地遵循掌权者所定义的“正义”,又不能对权力和“正义”提出任何质疑,否则便会被视为“反叛者”,遭受惩罚或社会的排斥,甚至陷入社会性死亡。这种社会状况——即权力高度集中、个体失去主体性、社会连带感瓦解——已基本满足了法西斯主义萌发的条件。若此时的国家机器与军事暴力相结合,且社会内部的压力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释放,便可能走向对外侵略的道路。“忠君”与“爱国”不可等同视之,在如明治维新或昭和军国主义等历史节点上被反复提起,凸显其重要性。日本人热爱自己的国家,不必然等同于热爱天皇或首相。无论人民发自内心地热爱其中之一、两者皆抛,抑或兼而有之,关键在于权力阶层是否刻意模糊“忠君”和“爱国”的界限,以实体化情感操控,将“忠君”的思想强加于人民。这种将“爱国”简单化为“忠君”的过度阐释,往往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单一化和政治体制的极端化,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健康状态和政治畸形的典型表现。反观明治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中,武士阶层对封建忠诚的强调,更多是为了捍卫现政权的稳定,迫使主君成为“明君”。然而,由于其行动并未深入社会基础,与社会变革的实际需求脱节,即使尝试与抵抗的构想相结合,但因缺乏广泛社会支持的呐喊,终究不过是“荒野”中的孤独之声,难以对社会结构产生实质性变革。日本帝制的兴起到衰落表明,一条错误的道路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深远的打击——如战争失败后的政治崩溃、社会失序和经济动荡等。战后,由GHQ主导的民主化改造,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将日本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歧途中带入新轨,为国家秩序和社会结构的重建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更是对国民忠诚观、民族身份以及历史错误的再审视,构成了丸山战后思想转型的核心命题。基于自身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深刻体验和观察,作者尝试重新审视维新以来的历史逻辑及其后果。而他的反思不仅局限于战时和战后的日本,更为理解更广泛的战争与社会问题提供了视角和借鉴。从其思

① 西田毅「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学』1999年、第31期、38頁。

② 《东京都立杂志》第50号,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二十五日。

想脉络中不难窥见的是,历史从未孤立,战争与社会的逻辑一脉相承。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俄乌战争等现实政治冲突,皆能看到类似的国家主义与集体行动的痕迹。

山路爱山于20世纪初发表在《现代日本教会论》的文章中指出,“他们(指内村鉴三、本多庸一、植村正久、井深梶之助、押川方义等明治初期的基督教指导者、旧幕臣——引者注)在青少年时代里对‘战败者的痛苦’‘国破山河在的逆境’的体验和对世俗地位的断念,成了他们信仰告白的心理契机。”^①丸山等一众学者从战争的视角着眼,深刻体悟到了他人的“国破”与自身的“战败”。正因如此,他们才努力将历史中的人和事与当下活着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紧密相连,试图以历史的深刻反思为当代社会提供启示。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不仅揭示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也表明了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现实。回到山路爱山的观点,他指出旧幕臣的行动方式源自武士的精神气质的延续,这种能量的传递在一定程度上与丸山将研究起点设定在幕末及明治初期的意图形成了呼应。丸山意在探究近代日本思想发展的脉络,从武士精神的断裂与延续中解析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路径,为战后日本社会重建主体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围绕议论者(可能是植木枝盛)的论述中,丸山指出:“对公共事务的日常性关心,与为了公共事务的反抗是互相照应的;与之相对,对公共事务的日常性冷漠,则与非日常性的‘一揆’相互照应”,^②其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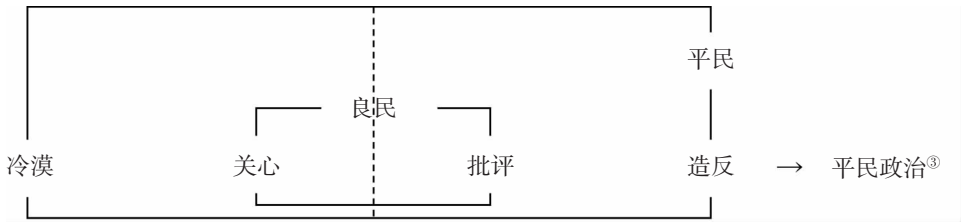


图1 平民与良民的政治参与

简而言之,政治冷漠理论上是平民的专属物,平民是相对于精英阶层而言的概念,往往意味着处于依附地位或不起主导作用,甚至沦为少数人的工具。^③这显然与丸山所论述的平民的造反不尽相同,因此丸山一再强调平民造反的契机并非源于“忠诚与反叛”。这里丸山更想强调的是平民政治冷漠的严峻现实,并阐明了原因:其一,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其二,体制的全盘官僚化带来的组织僵化。而丸山批评的状况并不只存在于明治时期,观察战后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日本与半个世纪前的日本有着高度的连贯性。

青年们除了学问,什么都没有,就算想自行创业,但想要在这样的企业界闯出

① 《现代日本教会论》,明治三十九年[1906]。

② [日]丸山真男著,路平译:《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5页。

③ 徐峰:《近年来西方平民政治基本内涵、特征及兴起》,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49页。

一片天地,谈何容易。因此他们以月薪族为理想,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不过,一般的雇主并不需要如此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雇主只需要些下等雇员。……青年们有智识,却没有工作,自然会心生烦恼,心有不平,最终落得自暴自弃。激进的社会党和无政府党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鸟谷部春汀《青年与现代生活》(明治四十一年[1908])^①

这种结果的出现有另外一种解释,不妨看一下雪岭的说法。“日俄战争后,在忠诚与反叛双方的能动性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出现的‘颓唐’的变种罢了”。笔者将在下一章利用相关的理论模型对这一观点进行解释。

三、忠诚观的动态配置与补偿原则

明治日本从西方嫁接现代政治体制,从而在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的土壤中,步入了近代化的行列。来自西方制度的冲击并不妨碍统治者制造出一种虚假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形态的幻影,替代业已沉淀下来的、普遍的公共秩序或风俗习惯。那么,在统治者定义的“忠诚”伦理框架和边界之内,平民的思想及其能动性被统治观念加以约束和控制,以此维持社会形态的稳定,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低成本、高回报的维稳手段。随着外来思想的引入和冲击,统治者筛选后的复数观念被资源化和工具化,并在扬弃传统与吸纳外来思想之间的矛盾中,建构起了适应统治需要的忠诚模式。进而消解了潜在的内在反抗性和批判性,民众的主体性随之异化。当社会中的个体从属于多个集团时,复数观念将会同时在个体身上发生作用,那么就会出现如下的情况:

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忠诚被多样分割的社会——引者注)——尤其是当其中的多样集团所依据的价值原理和组织原理也是复数的时候——即使个人被集团或其价值原理所异化,抑或归属感发生减退,这种异化和减退也会因个人向他人同时从属的其他集团或价值原理投入更多的忠诚,从而得到补偿。因此,在整体上社会的精神安定程度较高。^②

鉴于丸山所述,在有效忠需求的社会类型中,若存在若干可供选择的忠诚对象时,在某个对象身上的忠诚感的减退,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个忠诚对象身上。基于这一特点,笔者暂将其称之为“忠诚补偿原则”。他也论述道“政治权力想要独占国民忠诚,或要在战争等紧急事态下快速集中国民的忠诚,都是困难的”;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当社会的反叛趋于集中时,基于自主的反叛精神应当会对权力本身造成冲击,甚至推翻原有的权力布局。然而,就像福泽谕吉在《觉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个人应具有独立意识,不依附于外部权威,这在其论

① [日]丸山真男著,路平译:《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0 页。

② [日]丸山真男著,路平译:《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7 页。

述中占据核心地位。福泽对旧有体制的批判较为鲜明,鼓励通过教育和启蒙推动社会变革。^①这一点与植木枝盛的议论中对武士精神的赞美存在一致,也进一步揭示出了日本的集中主义倾向与自主性团体的传统薄弱有关;同时,武士精神被权力阶层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所解读和占有,在及物的具体行动中与军国主义渐趋同向。

当忠诚补偿原则与作为社会问题的忠诚与反叛规律的边际效应法则合流时,遵循一种动态平衡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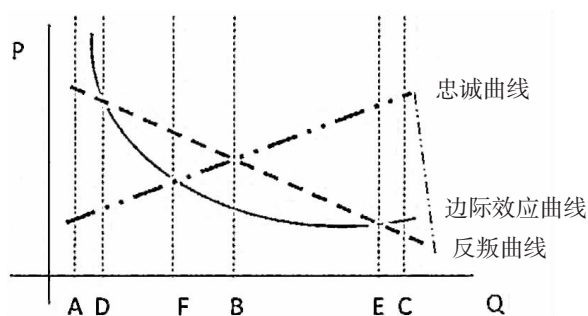


图2 忠诚与反叛的需求供给曲线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忠诚与反叛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规律与相对平衡状态。简单来说,当社会处于A点时,社会巨变、政权颠覆,此时往往由社会底层推动社会发生变革;处于B点时,多为良民占据社会主动权,忠诚与反叛的定义处于开放状态,忠诚与反叛的交点即说明达到了均衡状态;处于C点时,即社会进入了一君万民、高度集权时期,此时往往是权力阶层主导;D、E点是社会变动的临界点,当处于AD、EC区间时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制度动荡不定;F是最优点,由于忠诚曲线和边际效用曲线在交汇而形成的点往往意味着社会忠诚的最优配置。^②作为民众的忠诚与反叛的范畴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外延,同时权力阶层也会根据本阶层的利益而重新定义忠诚与反叛的内涵和外延。而正是随着对忠诚与反叛的主导权的扩大,忠诚与反叛的无差别曲线将外移,此时,民众与权力阶层的无差别曲线的交点(E点)即帕累托最优。而权力阶层因想获得更多的忠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提高忠诚度的数值),随即选择将交易点落在G点而非E点,^③那么其结果显然这会使得大众被强制卷进忠诚溢价的通胀当中。当然,在这场博弈之中的力量悬殊一眼可见,因此可以得出实际上的忠诚教育并非由双方协议完成,而是由外力所导致的忠诚总量异动所带来的结果。^④还有一种

① 慶應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7卷)岩波書店、1959年、657-689頁。

② 参见李绍荣:《帕累托最优与一般均衡最优之差异》,载《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吴永臻:《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载《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5期。

③ 理论上,由于不甘于接受统治阶层的定价,G点的交易原本不可能达成,但这种与假设相悖的情况在事实上存在。

④ 此处的议论参考:郭本海、黄良义、刘思峰:《基于“政府-企业”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节能激励机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8期,第160-164页。

特殊情况,^①在图 2C 至无穷大的不特定区间内,忠君爱国思想的转变以内在的忠诚结构的同一性为前提,自主地进行了忠诚转移这一观点是有现实可能的。故引出了日本在权力高度集中之后经历 180 度转弯,最终落入绝对服从的极端状态,但要区别基于义务心的服从和基于奴隶根性的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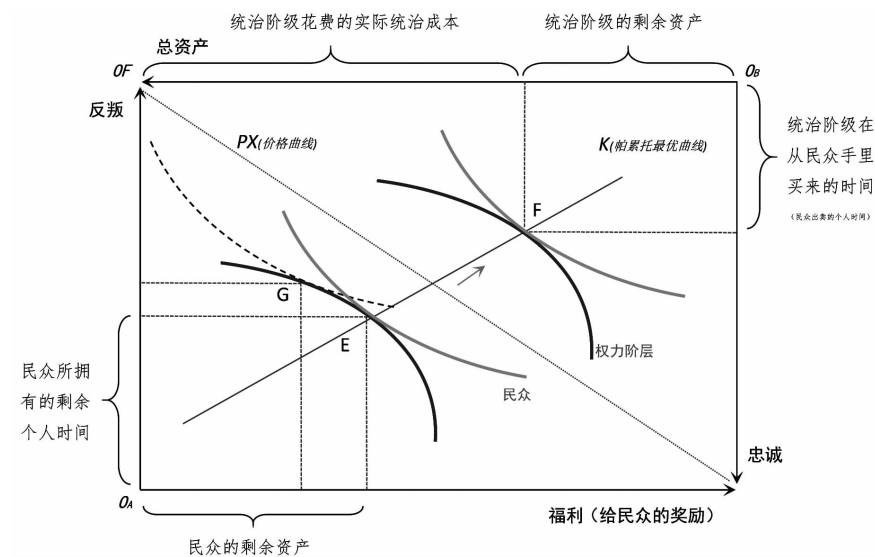


图 3 忠诚与反叛的帕累托最优曲线分析 - 埃奇沃斯模型 (Edgeworth Model)^②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丸山对忠诚与反叛的动态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借用供需理论与博弈论来进一步阐释其内在逻辑。这种分析不仅在大多数社会状况中成立,而且对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进化过程也具有重要解释力。^③这种现象表明,忠诚与反叛的动态平衡不仅是社会内部博弈的结果,更深受外部文化冲击与本土文化韧性的共同作用。外来文化在冲击传统忠诚观念的同时,也为权力阶层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而民众则在外来与本土的张力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忠诚逻辑。外来文化带来的实质性改变与“日本式事物”执拗存续之假设,对于如

① 上文讲到“日俄战争后,在忠诚与反叛双方的能动性普遍衰退”在图示中显现为忠诚高度集中突破极限之后急速向下,与反叛曲线保持同一方向,这就能够解释丸山说的“并不等于由积极原理的忠诚而带来的反叛”,因为这种反叛并非源于忠诚或反叛本身。

② 如果把忠诚竞赛比作一场交易,分析权力阶层和民众对于忠诚与反叛的博弈就需要计算帕累托最优。民众所拥有的剩余个人时间越多,内在的反叛性随之强化;统治者为了加强民众对自己的忠诚,便会从民众手中购买其拥有的时间。如图 3 所示,民众和权力阶层的无差别曲线分别在埃奇沃斯模型 (Edgeworth Model) 的坐标系内进行交易,二者的曲线都遵循忠诚总量恒定的原理,即随着投入的忠诚总量越多、反叛的总量随之递减;相反,随着投入的忠诚总量越少、反叛的总量随之递增。

③ 这里的进化并不意味着进化论式的自然演变论调,而是忠诚意识在明治这一历史语境之下的变质过程。如何思考明治时期对外来事物的接受方式,日本面对外来的事物是如何受容于己,这些外来的事物又是如何进入当下并与传统的东西杂糅混合这一点上突显了日本的特殊之处,即外来的以大幅度修正的形式和“日本主义”式的习合之过程。

何阐释近代化与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之关系，亦属于战后一代日本知识人着重思考的另外一个课题。

四、武士阶层的忠诚困境：复数忠诚的“枷锁”与两难抉择

丸山真男对于军国主义的深刻反思，根植于他对于战时军国的切身体验，青少年时期遭遇的政治暴力和屈辱经历。^①对亲身体验的理论化和抽象化，被丸山内化为他论述日本战后政治问题的理论源泉。

江户日本并非是在武士阶层的“谏诤”中走向明治帝国的，而这也间接地表现出了抵抗精神本身在底层的弱化倾向，取而代之的便是忠诚对象被高度一元化的统治模式。在等级森严的江户幕府，随着忠诚对象的扩大和上升，武士的身份认同会经历一系列的混乱状态，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幕府统治下的武士究竟要不要忠诚于天皇和如何忠诚于天皇的问题，即下图中的顶端箭头（实曲线）所指的路径该如何定性。在明治时期，极为复杂的复数忠诚的形成状况当中，统治者利用天道、大义名分论等思想武器率先完成皇权统治合法化这项工作。

无疑，在日本的封建制度框架下，天皇对武士不具备封建制度上的主从关系，但在近代化过程中，这一矛盾凸显了出来。可以说，在幕府统治下的武士道成为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和武家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柱，其中儒家思想起到了关键的调和作用。自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将传统的武士道融合中国的儒学理论中“道”的哲学，在传统武士伦理之上构建起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武士伦理。^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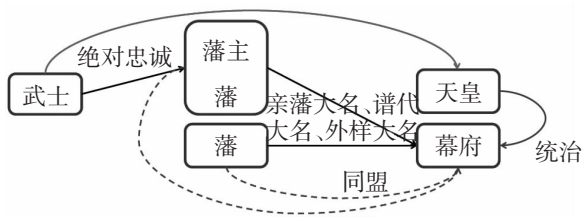


图4 幕末复数忠诚示意简图

注：实线箭头指向为忠诚的对象

赵宝煦曾经指出：“‘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原则。传入日本后，曾对其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积极作用。”而当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时，儒教思想与“军国主义”思想却并行不悖。^③对此，他认为“这是与日本本土政治文化，诸如‘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

① 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学术研究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第180页。

② 王志：《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5页。

③ 如何结合的请参考《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二战日本的军国主义，实际上打得正是振兴亚洲、复兴儒学等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旗号。

识、‘武士道’精神,以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等相结合的结果”。^① 在天皇制的统治体系中,武士阶层扮演了复杂且多重的角色。首先,武士道作为一种“皇道武士道”,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下得以发展,体现了天皇制在整合军事暴力的过程中,如何将武士阶层直接纳入国家机器的运作。这一过程中,武士道的价值观与“万世一系”理念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统治结构。其次,军国主义的兴起使得对战争胜利的渴望趋向极端,这种无底线的胜利追求使得武士道中所强调的“谏诤”精神难以与之对抗或调节。武士阶层的传统义务与国家暴力机器之间的张力,暴露了武士道与现代军国主义理念的矛盾。^②

明治时期,以天皇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1882年)和《教育敕语》(1890年),武士道发展转化成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及行动准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正是由于将忠诚的对象全部集中于天皇一人,法西斯军国主义与绝对的忠诚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重叠,传统的忠诚观念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被加以过滤。此外,一同改变了原“忠君爱国”的内涵,将其明文规定为“拥戴皇上,忠于朝廷”,忠诚对象被高度限定;摒弃了传统道德,尤其在战时突出“一亿玉碎”,大肆宣扬为国捐躯的崇高性便是任其发展的结果。^③ 而正是武士“尽忠”的思想外化为“赴死”的能动性,才使得军国主义有了发生异化的精神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对内荼毒国民主体性的精神工具、对外侵略他国的武器和力量。与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对消解个人主义的内在机理和思想发展模式的分析,往往会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法西斯主义中的能动性虚无主义做类比。其中,反理性主义试图破坏普遍主义理性的志向(超越性悖反),强制性社会同质化试图在制度性的解体过程中将个人封禁起来(内在),最终在前者的内在驱动下生成了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等特征。^④ 日德两国在这一过程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一言以蔽之,忠诚与反叛的定义在权力阶层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几经逆转,尽管天皇将忠诚对象的高度集中并合法化的初衷在于实现武士阶层的忠诚转移,这一过程却未能阻止忠诚意识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中逐步失控。而丸山意欲强调的,正是抵抗日本法西斯化的“近代”之可能。^⑤ 他通过对在近代化过程中,被明治日本舍弃的武士精神气质的重新解读,进一步探索当下应当追求和复原的思想资源,从而为战后日本思想的重建提供理论支点。日本战败之后的丸山思想经历了从近代以前的学问向近代的学问之转变,对于权力和体制的批

① 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49页。

② 娄贵书:《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辩护词——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20-128页。

③ 杨绍先:《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第64页。

④ 佐藤瑠威「カール・レーヴィットと丸山真男(2)——学問と政治——」『別府大学紀要』2000年、第42期、132頁。

⑤ 松田博「吉田傑俊『丸山真男と戦後思想』(大月書店、2013年)」「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2014年、第49卷、第4号、152頁。

判却是其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问题，应基于这一思想史文脉去探寻和解决日本帝国问题的路径。然而，这一系列遗留问题是否被后人清晰地认知，恐仍存疑。

五、从思想批判到现实指向：战后日本的责任意识与社会转型

在前文中，丸山早已对自然进化式的事大主义^①观点提出批判，不免指出了日本对欧美潮流的盲目追随的适应性逻辑。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无条件服从姿态，似乎正能从这种理论根源中窥见端倪。从美国佩里舰队来航，开启向欧美学习的先例，到被外来冲击裹挟着步入近代化，日本的依附姿态似乎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到了战后，美国最初甚至设想“对日本实施 20 年的军事占领，以报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②虽未完全落实，但却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发展轨迹。GHQ 占领时期，日本在保留天皇制这一软弱象征的基础上完成了民主化改造。然而，在看似坚固的同盟阵营之下展开了军事合作、经济重建，但本质上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外交和政治格局。^③20 世纪的日本外交史，其基本策略可以概括为“与强者为伍”。从明治时期与英国的结盟，到战后依附于美国霸权，日本的外交主流价值观始终围绕“强国崇拜”而展开。^④尽管这种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的自主性，但不可否认，GHQ 的战后改造以及日美同盟的建立，从宪法制定到制度改革，都为日本战后重新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本政府在承担战后责任时的消极应对，引起了东亚各受害国的强烈谴责。官方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与美化，民众对历史真相的遗忘，以及以“无责任”模式运作的天皇制帝国，共同塑造了日本在战后处理历史问题上的特殊景观。然而，仅止于此并不足以充分揭露丸山真男的深切失望。他更为痛心的是日本近代知识人对国家权力批判性反思的缺失，并在历史与现实重大关头集体失语。这样的沉默不仅是对知识人社会责任的放弃，更为政治权力操控历史记忆和剥削社会反思能力留下了缝隙，致使“反叛”意识的进一步消解。因此，丸山的批判超越了对政府或体制的谴责，更多是对日本知识界自我丧失的深刻悲叹——一种“怒其不争”的切肤之痛。近代知识人应当从正统世界阐释者的身份、制度归属和权威制约中解放出来，在他者、传统、权威的普遍联系中重新确立与自我的动态平衡，并通过主体的能动性，从根本上克服内在的普遍性困境，担负起日本社会实现真正的市民自由和民主的责任。^⑤丸山指出，“非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众容易陷入狂热的排外主义”，其根源在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的不满已经没有可委让的地方，所以必然要向外爆发”，而统治层则利用并煽动底层情绪以转移

① 雪岭在“事大主义是危险思想吗”一文中写道：“个人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其实是最纯正的事大主义，谈论新时代的新人应与旧时代的老人抱有不同心态的契机，则是源于他们的精神深处认为新时代必然会取代旧时代，或因欧美流行所以跟着唱高调而已。

② 祝曙光：《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10 期，第 9-15 页。

③ 丸山同著作中收录的文章“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与这一议题的论述相互关联。

④ 张卫娣、肖传国：《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82 页。

⑤ 板垣哲夫「丸山真男における内在と超越」『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2004 年、第 15 卷、第 3 号、36 頁。

矛盾,防止内部不满的逆流,却反过来让自己失去了主动权。^① 尽管丸山对战后民主主义课题抱有热忱,但他对承担这一事业的民众投去了冷峻目光。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中,将其态度归结为一种“对‘大众’的厌恶”,这种观点在当时也被多数人所共有。^②

六、结 论

《忠诚与反叛》无疑是丸山真男在战后政治思想研究中最经典之作,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总结之一,深入剖析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主体性丧失与权力结构延续的复杂问题。这本著作并非单纯探讨对谁忠诚和何谓反叛的问题,也并非仅分析认识装置的历史变迁,或争论日本近代思想中国家理性的有无,而是以幕末以来的历史事实为逻辑起点,深刻讨论近代日本的思想转型。丸山试图揭示近代以来日本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中,在这一过程中武士阶层原本蕴含的主体性精神逐渐消亡,而这种精神的遗失,对战后日本来说是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断裂。对于丸山而言,他的关注点并非局限于武士阶层本身,而在于武士精神中残存着的谏诤血液,这种批判性和主体性的特质在战后日本显得尤为珍贵。正如松泽弘阳所言,丸山的最终目的是对近现代以及所谓的负面、谋求创出真正的传统这一观点提出批判。^③ 将本书的核心观点串联起来,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丸山借历史问题对现实课题进行批判与指摘的深意。这部鸿篇巨著不仅是对日本思想史的反思,也是对战后日本社会现实的警醒与启迪。

① [日]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9页。着重号为原文注。

② [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译:《“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1-82页;河岛真「丸山真男の孤独」『神戸大学文学部紀要』2014年、第41期、52頁。

③ 区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载《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第136-166页。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对中共领导的 抗日武装认识的转变

李 越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物资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以劣势装备进行游击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占据军事优势的侵华日军,以“治安工作”为名的战略战术,试图在华北战场上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与中共抗日武装的对抗中,侵华日军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轻视到逐渐将中共抗日武装视为主要对手,再到百团大战后对中共实施全面的“总力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打击。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根据中共抗日政权和武装的特性,不断调整其战略和政策计划,并付诸实施。然而,即便这些战略和政策行动在短期内给中共抗日力量带来了困难,却未能实现其预期的战略目标。相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和根据地持续发展壮大,成为领导华北敌后战场进行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侵华日军 “治安战” “点线面”

作者简介: 李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市民族学视域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2JD850012)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拉开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开战初期日军的陆、海、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有相当优势。自1938年末,侵华日军就在军事上基本实现了对华北全境的占领,国民党正规武装力量基本从华北撤离,只剩下山西南部的一部分武装。但是,华北地区幅员辽阔,侵华日军对华北地区的占领只限于“点和线”,国民党军队撤离后,华北一带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权力真空,而在长期持久战体制之下,日本迫切需要在华北地区获取更多的战争资源。为此,侵华日军企图依照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所谓“剿匪”经验,尽快消灭他们眼中的“残存匪贼”,以便在华北地区实现稳定的殖民统治。

一、侵华日军华北“治安战”的军事展开

侵华日军占领华北以后,立即对占领区实施“扫荡”作战,企图尽快消灭他们眼中的“残存匪贼”,以便尽早实现对华北地区的稳定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的所谓“扫荡”作战,很大程度上都在参照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所谓“剿匪”经验和战术。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对东北各地实施了毁灭性“扫荡”。占领东北后至1933年5月

为止,迅速在各地实施了针对抗日力量的“第一期大讨伐”,此后又于1933年秋和1934年春分别实施了“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和“第三期治安肃正工作”。前期以关东军为主,伪满军为辅,后期由于关东军开始实施对苏作战训练,“讨伐”行动则交由伪满军队独立实施。关东军将“治安肃正”分为“治标工作”和“治本工作”。“治标工作”即由关东军、军政部(治安部)、伪满军队实施的“武力讨伐”行动。“治本工作”则是在“武力讨伐”后,由特务人员利用汉奸人员等,通过组织“村落集团”(即保甲制度)、自卫团、收缴民间武器、修建“治安道路”“实施宣传等思想对策”等方式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由日本顾问下山琢磨、小越信雄等进行策划和领导。1937年冬,关东军和伪满军在三江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讨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时期,人员伤亡巨大、损失惨重,一时间很难再组织起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有效的进攻行动。

日军侵占华北地区以后,期望能够参照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经验,在华北地区实施所谓“治安肃正作战”。为此,曾在伪满洲国参与过“肃正作战”的中国驻屯宪兵队司令官陆军中将佐佐木一中专赴华北,帮助侵华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陆军中佐田村义富起草《治安肃正要纲》,为侵华华北方面军的“治安战”提供理论和战术指导。

在占领东北初期,即1932年至1933年期间,关东军曾将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统称为“匪贼”。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讨伐”作战后,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进一步将这些所谓“匪贼”分为三类,即专门抢夺财物的“土匪”、以“反满抗日”为口号的旧军阀体系的军事团体和“共产匪”。《战史丛书·关东军》上册中论述:“至1934年,残兵当中大量人员都开始从事正当职业,剩下的仍然散落各地的都是精锐分子,其性格当中,都有着坚韧的政治色彩……这些持有如‘反满抗日’、‘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政治匪徒,才是治安肃正方面之癌。……特别是‘共产匪’极为难以对付。他们擅长在民众中获得支持,受到日满讨伐队攻击时,经常会部分散藏于民众当中,或者穿越国境(此处指伪满洲国国境—笔者注)到苏联或中国境内”。^①上述关东军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最为艰苦的时期,能够坚韧不拔地实施抗日游击战的,还是日军眼中的“共产匪”,无论是在伪满洲国还是在后来的华北地区,侵华日军都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视为“治安肃正方面之癌”。

这样,侵华华北方面军企图以关东军为经验,在华北地区也实施相同的方策,在以优势兵力压制华北抗日武装的同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开展军、政府、新民会、民众一体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推进“治安肃正建设”,并强化对中国抗日力量控制地区的经济封锁。但是,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实施情况却表明,关东军在东北的经验很难在华北地区复制。原侵华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参谋长折田贞重曾于1927年起担任日军十四师团步兵第五十九联队副中队长驻扎沈阳,在此期间作为日军派驻伪满洲国特务机关的派遣军官从事情报工作。1932年至1934年,折田升任该部中队长,曾驻扎于以北满泰安为中心的地区的,在此期

① 『戦史叢書 關東軍 1』朝雲新聞社、1969年、128頁。

间在日军占领区实施没收民间武器、进行所谓“土匪讨伐”，在所谓“匪情恶化地区”执行筹建“战略村”等任务。这一时期的经历对其之后与中共抗日力量作战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折田贞重也承认在山东地区的对中共作战，与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匪贼讨伐”有相同之处，但是将两者的作战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后，折田贞重认为：“正是由于在‘满洲国’地区的作战经验，在对之后日军对中共作战产生了巨大影响，才成为笔者自身，乃至日军全体在对中共作战的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①折田贞重认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作战地区的民众，其作为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比中国本土要低得多。而且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还未在满洲渗透，才使得当时毫无经验和素养的日本军队的治安确保成为可能。带着这种轻率简单的自信和经验，进驻中国本土的大部分日本军人到终战为止，都没有能够理解对中共作战，因此以失败而告终。”^②实际上，随着华北抗日运动的发展，伪满洲国的抗日共同战线又开始活跃，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下，几乎皆由共产匪徒所领导。……由于日满军警不断地讨伐，尽管这些共匪的势力表面上不断减弱，但在民众当中理应潜藏着惊人的力量，正在形成“满洲治安之癌症”。^③

游击战本来就有两个战场，中国军队可以说是在自己的主场上行动，而日本军队则是在对手的地盘行动，从这一点看来，中国军队似乎有着巨大的优势条件，更有利于游击战的实施。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游击作战的。在抗日敌后战场上，还有国民党抗日武装力量和其他民间抗日武装力量的存在，但是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向战略范畴发展。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折田贞重深刻认识到，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经验很难在华北地区复制。而且，不仅在游击战战略理论方面，在游击战的战斗意志方面，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也很难与中共抗日武装相比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正规军从正面战场上以正规战阻止日军的进攻，抗战意志不可谓不坚定，但是一旦转入敌后战场就很难维持之前的斗志。侵华日军第59师团司令部勤务陆军中尉泽登贞行在记述1943年至1944年初其所占师团面临所谓“敌情”时坦言，“师团作战警备区域内的国民党系（张治中系）正规军已经完全被驱逐，只有同系统的地方军队，如张景月部队、刘佩沈部队等，其势力不振，还经常与八路军产生冲突，甚至要求日本军队的救援，基本上都跟我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④

① 折田贞重『对中共戦回想』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蔵 文庫 委託 379、5-6 頁。

② 同上。

③ [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中心資料室編，樊友平、朱佳卿译：《华北治安战上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④ 沢登貞行『沢登貞行中尉手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蔵 大東亜戦争日誌回想 58、0341 頁。

二、侵华日军由“点”“线”向“面”的军事延伸

如上文所述,侵华日军占领华北以后,立即参照伪满洲国经验,对占领区实施的“扫荡”作战,企图尽快消灭他们眼中的“残存匪贼”,以实现对华北地区的稳定的殖民统治,将华北地区划入日本政府一直谋求建立的“日满华”经济圈,尽可能地开发并掠夺华北资源,实现“以战养战”的长期占领战略。

经过保定和石家庄会战,尽管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击败,日军占领了华北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其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战略目的没有能够实现因此,如何快速实现对华北地区的稳定的殖民统治,支援日军在华中和华南的作战,就成为侵华华北方面军1938年底最为迫切的任务。然而,由于华北占领区域广大,仅仅依靠其军事力量,能够确保守卫的只有重要城镇和铁路、公路沿线,很难实现日军所期待的对占领区的全面守备任务。而所谓“点、线、面”的说法,也经常被国共两党,乃至日军自身用来形容当时侵华日军对于华北的占领情况。

时任侵华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曾就当时的日军占领形势曾坦言,尽管日军于1938年初就占领了各大主要城市,但日军“不过只是占领了铁路和主要道路的沿线地区,也就是说仅能支配点和线的区域而已”。^①1938年9月15日侵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对天皇侍从武官的“状况报告书”中也言明,侵华华北方面军能够确保的“治安”地带,仅限于点和线的狭小范围,至于向“面”的扩展,“乃是今后的课题”。^②侵华日军明白,仅仅在军事上保持对“线”的占领是毫无意义的。为了确保日军后方稳定和殖民统治,必须保证对“面”的占领,使华北日伪政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够运转起来,这样才能进一步使之承担起向日本国内和对外战争输送所需重要资源的任务。

而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国民党正规军队已经大部分从华北地区撤离,但是还有大批没有被完全击溃的部队纷纷转入游击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力量,也迅速深入华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国共两党在军、政空白地带进行游击战,持续不断地实施袭击、切断日军的交通、联络设施的行动,通过这些行动,减弱日军的机动能力、削弱日军的运输力量和现代兵器的威力,对日军进行持续性消耗。

这样,日军想要在华北地区实现武藤章所谓“面”的统治,首先就必须先追击分散在华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武装,然后以武力为后盾,支撑日伪组织的建立和运作,从而才有可能进一步达到掌握政治主动权的目的。因此,侵华华北方面军决定,一是实施所谓“治安战”,通过追击散落各地的游击武装实现其在“点和线”的军事占领的稳定;二是实施所谓“治安工作”,通过傀儡政府实施政治推进,以此来尽快填补国民党撤离以后华北地区的政治权力真空,进而

^① 武藤章『陸軍中将武藤章手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蔵。(转引自,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治安戦」『戦史研究年報』2016年3月、19号、9頁)。

^②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65页。

实现真正对“面”控制。

直到1940年9月,侵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华北一般状况》中还对“点、线”问题深感头痛:“侵华华北方面军的占领状况,其势力所及实际上仅限于重要城市周边和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为匪战区。……我军仅仅保持对‘线’的占领,是毫无意义的。为保证稳定,必须保持对‘面’的占领,使华北政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运转,尤其应使之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之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事先包括对各个要塞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稳定的首要条件”。^①

为了实现向“面”的军事扩张,侵华日军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

第一,独立混成旅团的大量编制。随着侵华战争中日军占领的面积越来越大,为了长期持久战的准备工作,维持占领地的稳定,侵华日军于1938年前后开始大量编制独立混成旅团,将其作为地方守备部队。独立混成旅团基本上是由旅团司令部、五个独立步兵大队(各大队定员810人)、炮兵队(野炮或山炮二至三个中队,620人)、工兵队(176人)、旅团通信队(175人)等单位构成,编制定员810人。独立混成旅团以从主力师团抽调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无论在火力、机动力还是兵站能力上都无法与正规师团相比,所承担的任务是以静态守备为主。因此,独立混成旅团下属的步兵大队,被部署于各个警备区,比日本陆军的一般大队更具有独立的作战性质,较为适合实施日军稳定后方的“治安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侵华日军共计编成23个独立混成旅团,而直到日本投降前总共编成了104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的大量旅团都成为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分散配置,实施“治安战”的主要力量。

第二,扶植大量受日军控制的日伪武装。为了实现从“点”和“线”扩展到对于“面”的控制,侵华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以华治华”的《日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②在军事方面,建立由特务机关长领导,中国人组成的治安军、警备队(包括县警备队、水上警备队、汽车公路警备队、重要工厂及企业警备队)、保安团(或称自卫团)、铁路警察机关等。警备队常驻县城和县内要塞,负责县城和县内要塞的“警备”任务,并随时出动单独或配合日军实施“讨伐”行动。而保安团、自卫团(河北、山西为“保卫团”,山东为“民团”或“联庄会”,河南为“保甲”)则设于基层的各个乡镇,按壮丁编组,协助警备队共同承担所谓“清乡”“剿匪”行动。在兵力和军费开支不足的情况下,日军企图通过由中国人组成的警备团和保安团、自卫团等,在军事层面形成由“点”(县城及要塞)、“线”(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向“面”(基层乡、镇、村)的辐射,进而实现对华北地区的整体控制。这些警备队、保安团和自卫团等,名义上是地方组织起来的所谓“自发”“自治”武装,由当地“日伪”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因此,他们无法从侵华日军手中获得武器配给和经费支援。但是,在作战方面,却要接受驻地日军、特务机关长、日本宪

^①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113页。

^② 同上,第49页。

兵等的层层指挥领导,且承担情报收集、“讨伐兵匪”、通信网络和铁路的警备保护等各项任务。实际上,日军对这些日伪武装也并不信任,只是将之作为统治工具进行利用。1937年12月22日,侵华华北方面军颁布的《日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以下简称《要领》)中就指出:“由当地中国人自己组织行政机关,且只是局部性机构,故不能寄予太大期望。因此强调,当日军出兵华北,实施警备和讨伐之际,有责任指导、整顿各地警备机关,并由特务机关、宣抚班等负责扶植地方行政机关和民众团体”。^①而1940年侵华华北方面军的《治安军及其他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之整備》,^②进一步强调了对“治安军”“剿共军”“绥靖军”、县警备队等的组建、培训和领导工作,将这些日伪武装作为侵华日军军事力量向华北“面”的延伸的工具。

第三,日军部队部署的高度分散配置。1938年期间,侵华日军将所谓“治安战”的重点放在追击以国民党正规军残部为首的各个抗日武装方面,试图将“点和线”的占领扩大到对“面”的统治。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占领面积为60万平方公里(河北、山东、山西),区域内人口达到1亿。由驻蒙军、第1军、第12军、侵华华北方面军的直辖部队分别占领,共计配备9个师团和12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25万兵力,^③无论是在兵力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凌驾于其他侵华日军部队,成为日本侵华的最主要军事力量,但是就其兵力密度而言,每平方公里只有0.37人,且被分散部署在200个驻军点,军事威力很难扩展到县城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其影响力也很难向“面”的广度渗透。^④

为了在军事上实现对“面”的控制,侵华华北方面军采取了“高度分散配置”的部队配属方式,将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在华北广大的地域上分割部署。各部队司令部部署于重要城镇,“大队、中队本部部署于城市或者乡镇,在此基础上更加细部署,只有10到15名守备兵的小分屯队驻扎的情况也并不少见”。^⑤这样就形成了以司令部为中心,各小部队如卫星一般部署在周围地区的分散部署状态。然后再修建公路和通信设施来连接部队司令部和各卫星部队,形成网络。“一个中队通常被分别部署驻扎于5、6个地方,最小的驻屯队由下士官领导,每个分队大约10人”。^⑥以第37师团为例,在1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兵力被分散部署在105个主要据点和129个分屯驻地,在该地域内还有配合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军队89000人。每一个日本兵配6名“中国兵”,管辖平均有39名当地居民的1平方公里土地。^⑦

侵华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实施的部队分散配置,出于以下目的:首先,在兵力有限的情

①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9-50页。

② 同上,第237页。

③ 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治安戦」、10頁。

④ 「軍占領地域治安実施要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蔵「陸支密大日記(昭和13年)」第15号。

⑤ 宮下城一『天運一瞬?中国戦線兵士の実記』桂書房、1986年、84頁、91頁。

⑥ 藤原彰『中国戦線従軍記』大月書店、2002年、24頁。

⑦ 藤田豊『春訪れし大黄河・第三十七師団晋南警備戦記』、第三十七師団戦記出版会、1977年、319頁。(转引自,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応義塾大学出版、2006年、195頁)

况下,尽量扩大驻军范围,并以各个驻军据点为中心,实现从“点、线”向“面”的控制。如果在网状部署区域能够做到稳定统治,还可继续向外延伸,达到对偏远地区控制的目的。其次,这些部署于各地的部队,除了能够占据要塞以外,还有利于灵活地组建并运用谍报组织,密切联系相邻地区的部队,以奇袭、急袭、随时随地分进合击。日军通过分散配置构筑营地后,会进一步在驻地中心区域加强和扩大防御设施,减少守备兵力,增加机动兵员,扩大“讨伐”地区。与此同时,再逐渐增加日军驻地数目,以达到扩大“治安圈”的预期目标。对这种逐步扩大“治安圈”的战术,田副正信用赛马用语“輪乗りと開け”(从极小半径的圈子逐步向外扩张的运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日军试图以“点”(驻兵据点)、“线”(公路、通信设施)为中心,试图向周围扩大“治安圈”的作战意图。^①但是,这种军队的分散配置部署方式,在此后日军与中共抗日武装的作战中也显示出其诸多弊病,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予以分析论述。

以上列举了日军占领华北地区以后,为实现从“点”“线”向“面”的控制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手段,这些军事手段大都是侵华华北方面军仿照关东军在伪满洲国地区实施“治安战”的经验所实施的,但是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形成后,日军的这些军事手段大都没有能够达到其战略意图。

三、国民党军队撤退后华北地区的混乱状况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同浦、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1938年末侵华日军在军事上基本占领了华北全境,自此,国民政府指挥下实施的正规防御战基本结束。除山西南部的一部分武装外,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退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逐渐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角。

尽管没有实现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但是侵华日军,特别是一线作战部队还是盲目自信,对于华北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力量,特别是中共抗日武装并没有特别重视。例如,第一军司令部在最初制定作战计划时,就轻率地设定“于1938年6月底之前,排除在华北地区的游击力量”,^②认为短期内就能够快速将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迅速击溃。时任侵华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冈部直三郎少将(后升任大将)在日记中记载,1938年2月,侵华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一军司令部派遣步兵1个大队和炮兵一个大队担任后方警备任务。但是第一军以任务“不紧急”为由,竟然过了将近一个星期都没有执行该命令。^③关于该事件,第一军的《机密作战日志》中判断认为,“当时后方的不稳定只是暂时现象”,^④自信实现占领区的稳定统治仅仅是时间问

① 田副正信『陣中追想録第一巻』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蔵 支那事变 日記回想 105。

② 『一軍日誌』巻9、1938年5月。(转引自,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195頁)

③ 岡部直三郎『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162—165頁、177頁。

④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191頁。

题。实际上,在挑起侵华战争之前,日本陆军从未预先过实施专门针对游击作战的战术教育和战斗训练。造成侵华日军对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极端轻视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侵华日军一线部队自信于强大优势兵力和近代武器及训练,对中国军队极为轻视。原侵华华北方面军参谋陆军中佐有森清晴在回忆侵华华北方面军的教育训练情况时提到:“方面军依然认为中国军队(包括共军)的军事力量劣弱,先入为主的蔑视观念占据上风,对他们不以为然”。^①在与中共抗日游击武装展开作战之前,侵华日军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轻率地认为可以如击退华北的国民党正规武装一样,迅速消灭华北地区各方努力,包括中共抗日武装在内的抗日游击力量。

第二,当时日本陆军一直都将苏联作为假敌,因此陆军大学和士官学校等,始终都着眼于研究和实施针对苏联军队的常规作战训练科目,对于游击作战的战术和战略几乎没有花费时间和精力。关于这一点,曾在华北作战第一线从军的藤原彰也曾追述,“日军陆军军官和士兵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与中国军队,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相关的战斗战术教育”,^②因此,侵华日军对于游击战基本没有什么概念,也就很难引起重视。

第三,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撤离华北的混乱状态,使侵华日军,对中国军队产生了极端轻视的态度。尽管国民政府的“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战”的战略,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将日军拖入了长期、持久作战阶段。但是,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迅速推进之下,国民党军队节节抵抗、仓促撤退,至1938年底,尽管有部分武装留在华北敌后战场,如留在冀南地区的河北省保安队、太行山南部的前东北军万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部、在冀南晋西的交界处的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部、鲁西南地区以孙桐萱为司令的第三军团、鲁西北地区的山东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部、鲁南地区的庞炳勋第四十军、鲁中地区沈鸿烈率领的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游击队等,但是由于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几乎将所有力量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对从正面战场上撤出后的游击战重视不足,未能在总体战略上考虑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和步骤,战争动员也并不充分,这些部队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混乱无序。

关于国民党撤退后华北地区的混乱状况,《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则有以下描述:

晋察冀三边陲地带,这时处在极端混乱状态中。已熟的禾黍无人收割,平汉线上无数的难民逃至山村小镇,国民党军队沿着铁道公路向南飞跑,大炮、机枪、步枪到处丢弃,旧政权瓦解,土匪蜂起,几个日本浪人拿着日本旗,就可以随意占领县城。^③

①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365页。

② 藤原彰『中国戦線従軍記』,17頁。

③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 第14辑 晋察冀概况》,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第3页。

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则记载：

日军攻陷太原之后，华北正面战场随之解体，失去依托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在山西战场，日军沿同蒲铁路继续南下，于1937年11月中旬占领平遥、文水一线，国民党在晋中的数十万大军仓皇退往晋东南、晋西南。^①

在国民党政权和武装的仓促撤退下，侵华日军因此判断：“国民党正规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实施统一集团攻势的气势，倾向于实施乘我方不备组织游击队等消极行动”。^②看到国民党撤出后华北地区的混乱局面后，侵华日军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对自身能力非常自信，在上述日军关于国民党游击队的表述当中，一再使用“消极”一词，这说明侵华华北方面军非常清楚，国民党军队实施的游击战，并非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战略性游击战，只是战斗失败后无法迅速撤离的无奈之举，因此对国民党留下的“不正规师团”和“游击队”并未引起特别重视。对此，日本学者山本弘昌分析了当时蒋介石荷兰顾问团的报告书及侵华日军第一军《机密作战日志》后也总结认为：“国民党势力在日军占领地采取的抵抗战术极为消极，仅留下了一些不正规师团或给当地居民以少量武器命令他们抵抗日军”。^③因此，侵华华北方面军的领导层面也普遍认为，只要占领了华北主要城市，游击队的活动就能够放缓，而如果进一步进行军事镇压，最终便可将之灭绝。9月15日侵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对来华北视察军情的天皇侍从官进行报告，提到“华北治安”情况时汇报：“我们相信，经过兵团多次讨伐，随着武汉会战的胜利，治安必将逐渐得以恢复”。^④侵华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关于1938年10月末的“治安状况描述”也提到：“现在，国民党系统的正规军已经丧失了成建制的发动对我军进攻的能力，他们消极地组织了游击支队，往往乘我军不备之际发起突然袭击。我们认为，鉴于华中、华南地区国军补给线被我军切断，不久的将来，他们战斗力必然会逐渐消亡”。^⑤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及败退后的混乱状态，让侵华日军盲目自信，以为能够快速解决华北地区的军事问题，甚至将华北地区打造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渐改变了日军对中国抗日游击武装的认识，华北敌后战场成为日军“治安战”和中共游击战的对决舞台。

四、侵华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初步认识及转变

1937年11月8日，太原作战以国民党军队的撤出而告终。自此，华北战场的正规战基本

①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 第1卷（1924—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88页。

② 「北支那方面軍占拠地域内治安状況(昭和13年10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陸支密大日記(昭和13年)』第64号。

③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190頁。

④ [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中心資料室編：《华北治安战上册》，第63页。

⑤ 同上，第66页。

结束,同时这也是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真正的开始。毛泽东在太原作战结束后立即指出,国民党在华北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①

(一)中共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的初期建立

此时,与华北地区各地的抗日游击武装相比,侵华日军在军事方面仍然占有绝对优势。面对侵华日军的优势兵力,在复杂的抗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使全党和全军适应抗战形势要求,制定了敌后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来进行持久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至193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日本军队的治安战》中就日本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看法进行论述:“在日中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日本军队来说,中国大陆一直都存在着两个战场。而在中国,这两个战场则被称为“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场)和“敌后战场”(共产党军队的战场、解放区战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渗透作战的迅速激化,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付出重大牺牲才逼退国民党而获得的占领地,却在后方战场上被共产党军队迅速解放,并进一步被建设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②

而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迅速组织起抗日敌后战场,组织民众和民间武装实施抗日活动的状况,可以参考《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中关于中共抗日武装在冀西、冀中、冀东等地区展开游击战的描述:

独立团很快地发展成了威震雁北察南一带的杨成武支队,骑兵营打开了冀西的游击区,政工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带着一连兵力,到处打击敌人。徒手的群众队伍被带去打扫战场,被抛弃的枪弹重新找到了它们最适当的主人。人民的情绪在逐渐好转。战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在地区每一个村落掀起了动员热潮,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动员委员会又暂时执行了政权的任务,认真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发展,停征田赋,废除了苛征杂税,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实行合理负担。但这还只是过渡的办法,为了统筹全局,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于阜平城,以民主方式确定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组织和人选。

冀中方面,国民党军队南撤之时,吕正操同志带领两个营向敌人后方挺进,摧毁了深泽、安国、任丘、河间、献县、安新、高阳等地的伪组织,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成立了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政主任公署),山地与平原从此便联结起来。一九三九年二月,一二〇师的主力曾进入冀中,进行了有名的河间歼灭战,帮助了平原游击战的展开(一二〇师主力,后经过北岳区参加了陈庄战役,于晋西事变时返回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②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岩波書店、2010年、24頁。

晋西北)。一九三八年六月,朱(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平北,七月九日在李运昌等同志领导下,爆发了冀东七县的抗日大起义,在十七个县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十月以后受到一些挫折。一九三九年春萧克同志到平北组织挺进军,继续开展平北冀东的游击战……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从此建立起来。^①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迅速在日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迅速组织起民众进行抗日活动,日本学者原觉天在《满铁调查与亚洲》一书中也分析认为,与侵华日军此前的主要对手国民党相比,“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各自所领导和动员情况也完全不同。国民党所构想的民众动员是‘依照政府的命令强制动员民众进行军事服务和生产’的,共产党‘将民众动员理解为民众自身的民众运动’,即‘根据民众的直接利益,在组织民众的同时,动员这种组织力量参与到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和生产当中去’”。^②

以上评述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全面抗日路线,是通过动员普通民众,坚持统一战线,逐步进行根据地建设才能够实施的。无论是兵源、武器还是粮食,都需要广大民众的强力支持。这就需要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能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明确目标的政治领导者。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时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二)侵华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初期认识

尽管关东军对东北地区的中共抗日武装已有深入认识,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阶段,华北地区的侵华日军,特别是前线作战部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活动还没有达到真正重视的程度,在侵华华北方面军初期的各类文件当中,经常将游击武装称为“残败兵”“匪贼”等,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的认识,也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方面。

1937年12月22日,侵华华北方面军颁布《日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以下简称《要领》)。^④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该“实施要领”内容,已经开始显示出对八路军威胁的关注。《要领》认为,对散落在华北各地的游击武装应当采取不同的针对策略,即“对于投降的武装团体,应先行解除武装,再让其回乡务农或当劳工等”“对于一般土匪,兼用宣抚怀柔之策,经收缴武器之后,使之另谋出路”。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则“必须彻底扫荡”“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匪,特别是对业已建成的共产党根据地,必须尽早将其捣毁”。从

①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 第14辑 晋察冀概况》,第3页。

② 原觉天『満鉄調査とアジア』世界書院、1986年、253頁。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政治部政教室编:《中共党史学习资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政治部政教室,第286页。

④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8-51页。

对待各抗日武装不同的态度来看,较之其他抗日武装,侵华日军在领导层面已经开始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视为需要坚决打击的对象,但是,上述《要领》仅仅是侵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布的纲领性文件,日军还是将中国共产党武装当作是政治方面的隐患,而在军事方面,当时侵华日军第一线作战部队,无论是在情报,还是在战略战术层面,都缺乏对中共抗日武装的专门认识,只是简单地将“讨伐”对象设定为国民党的残留部队及游击队和一般土匪,并未专门设定针对中共抗日武装的作战方针和策略。

例如,记载时间与上述《要领》同一时期的侵华日军第一军的《机密作战日志》中关于共产党军队的记载始于1937年12月,但只有“其势力逐渐旺盛”等寥寥数语表述。^①如“截至1938年初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停留在将之认为是潜在威胁的程度,并未将之作为在军事上最为紧迫的威胁对象”等。^②同样以1938年5月侵华日军第一军参谋部第一课编纂的《第一军作战经过概要》第八章《占领地肃清战》^③为例,该《概要》中记载了侵华日军第一军占领华北地区后同蒲线以西地区“扫荡”作战(万县、吉县、石楼及永和附近)、同蒲线以东地区“扫荡”作战(太谷、沁县、潞安北部、安泽及沁源等地)、专门针对国民党刘汝明部的“扫荡”作战、测鱼镇附近针对“共产军根据地”的“扫荡”作战、黄河左岸一带“扫荡”作战的战斗经过。但是,尽管文中提及中共抗日武装的次数远多于国民党军队,且专门以附件形式制定了《共产军及败残部队扫荡计划》,该计划命令侵华日军第一军派遣第百八师团、第百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师团对“共产军”展开“扫荡”行动,但是,由于在此期间对中共抗日武装缺乏认识,因此在命令、地图及战斗经过记录中都仅标注了作战地域地名,表述大都为:“继续扫荡在占领地内盘踞的共产党军队及残留部队”等,对中共抗日武装的部队番号、部队人数和规模、指挥员等则毫无概念,涉及中共抗日武装的称呼一概笼统记录为“共产军”。与此相对,《概要》中对于国民党军队都详细记载了部队番号,如第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八至七十二师,以及部队指挥人员,如刘汝明部队、商震部队等。这表明在占领华北初期,侵华日军的一线作战部队对中共抗日力量的情况所知甚少,并未特别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国民党武装区分对待,而是将两者都视作需要“扫荡”的残留军事力量。时任侵华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陆军大佐吉原钜在战后追述:“当时,我军未必不重视共军,但只是把他们作为与残存于我军占领区的蒋系残兵败将一样,早晚都会被我军作为抗日匪团一扫而光的”。^④吉原的追述说明,当时侵华华北方面军中普遍都判断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和伪满洲国的所谓“土匪”的战败部队类似,认为可以将伪满洲国的“匪贼”对策经验直接

①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191頁。

② 「最近二於ケル北支共産党活動概況」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蔵『陸支密大日記(昭和13年)』、第16号。

③ 「第一軍作戦経過の概要 昭和十二年・八・三十一～十三・六・一)(第一章～第九章)」、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蔵 支那事变 北支、0134-0173頁。

④ [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中心資料室編:《华北治安戦上册》,第125頁。

用于对付共产党。

根据上述第一军《占领地肃清战》末尾部分统计,1938年初至5月作战期间第一军与中国军队交战次数共计240余次,至1938年4月末为止仍有“共匪”和抗日军民“企图扰乱后方,若想确立治安,整备中国方面的行政力量尚需时日”。而《机密作战日志》中第二次出现中共相关表述即为《占领地肃清战》结束后的1938年5月,此时第一军已经对中共抗日军民有了新的认识:“由于生活困难,普通居民都逐渐加入‘匪团’当中,因此游击势力逐渐扩大,在此之前如普通‘山贼’般出现的‘土匪’都加入‘抗日匪团’当中,必须注意他们的逐步共产化倾向”。^①因此,尽管侵华华北方面军为了弄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色,通过实地调查和缴获文件、检查邮件等,编制了《1938年11月方面军情报记录》,但是仍未能完全正确地弄清中共的实际情况。^②上述《占领地肃清战》《机密作战日志》《1938年11月方面军情报记录》等都显示,在国民党武装撤出后,尽管侵华日军对于中共抗日武装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但是自1938年起,侵华日军的“扫荡”作战目标就逐渐向继续在华北地区以游击作战,扰乱日军后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方向转变。

(三)侵华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认识的逐步转变

正如前文所述,侵华日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虽然也将中共抗日武装看作是一定的威胁,但是其认识只是局限于将之与一般土匪同等的武装力量,认为迟早会将之消灭。但是在与中共作战的过程当中,日军逐渐发现在中共领导的政治动员之下,抗日力量已经广泛地深入到华北,特别是农村基层地区,抗日游击战逐步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这对侵华日军构成了巨大威胁。以侵华华北方面军第二课为中心的部分侵华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开始认识到:“这种威胁的本质,就是中共党、政、军的三位一体,以及与民众的强力的协作关系”,^③并开始寻求专门针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和武装的战略战术。

1938年11月,侵华华北方面军成立“灭共委员会”,由侵华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担任委员长,委员除侵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各课的课长,宪兵司令部总务部长警务部长以外,还有来自领事馆、内务省警保局、司法省北京公馆、朝鲜总督府警务部、兴亚院、伪满洲国政府治安部,以及华北开发、华北交通、华北电力等的人员。该委员会成立对共调查部,由于对共调查部成立北京西城的黄城根,该机构又被称为黄城事务所。1939年末,根据侵华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联席会议上侵华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口头讲演要旨记录显示,侵华日军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产生巨大的巨大威胁:“以地方武力为中心,以政治和民众为基调的抗战组织,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背景的民众抗日组织,正在日益扩大并强化其秘密的地下活动”,侵华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甚至断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事势力是华北治安之

①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191頁。

②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82页。

③ 「最近二於ケル北支共產党活動概況」。

癌”。^①这种危机意识也渗透到低级军官和士兵当中。上文山本昌弘在论证日军基层官兵对中共抗日武装的认识时曾引用侵华华北方面军第六十二联队军官回忆录《新品将校奮闘記》中记录的一个场景：“某日，一个新任士官在接受方面军司令部培训时，教官参谋先提问道：‘如果蒋介石军和共产党军两者都向我们发起进攻，该怎么办’随即，教官又立刻大声解答道：‘毋庸置疑，要打共产党军’接着又敲着桌子说：‘我们应当知道，共产党军才是真正的敌人，这样放任下去的话，不久的将来必留祸根’”。^②从这个片段可以显示，侵华日军的统帅部参谋和前线作战官兵，都已经开始深刻意识中共抗日武装的威力所在，将中共抗日武装视为了在华北的头号敌人。1940年7月，时任第三十七师团长的平田健吉中将在第一军兵团长会议上甚至主张，因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应当停止针对国民党的战斗。^③

至此，侵华日军专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所实施的作战开始逐渐明朗化，并在此后逐步展开了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为目标的，大规模的“治安肃正作战”。侵华日军已经深刻意识到党、政、军、民为一体的中共抗日力量的强大和坚韧，华北战场上日军的主要敌人，由国民党正规武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抗日武装和广大抗日民众。

五、结 论

本文论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认识的转变过程。从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的轻视，到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意志和抗日战略方面的巨大能量，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华北战场的主要敌人，再到百团大战后对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疯狂反扑，侵华日军不断刷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认识，研究并采取针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新政策和新措施，试图以多元的、综合性措施来遏制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武装的发展。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抗日军民的存在，日军的各种“讨伐”“扫荡”“肃正”等作战，及“治安工作”始终都没有取得其预期的成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存的大量史料，如将官回忆录、战时日记、战斗详报等，都有大量对当时这些作战的记载和评价。尽管很多日方的战史记载不够全面，而且在这些史料当中，有很多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战术的言语，如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术形容为“退避战术”“保存实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等，但在他们看似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的叙述当中，却不难看出，尽管日军不间断地进行着各种作

① 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情報活動—北支那方面軍の共産党軍対策を中心をして」『防衛研究所紀要』第21卷、第一号、2018年12月、131頁。

② 池田次郎『新品将校奮闘記』共栄書房、1981年、52頁、100頁。（转引自，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

③ 藤田豊『春訪れし大黄河・第三十七師団晋南警備戦記』第三十七師団戦記出版会、1977年、319頁。（转引自，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

战,试图以其优势兵力压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但却无法遏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甚至可以说,在日军不断地实施“治安肃正”作战的过程中,抗日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摧垮,反而日益增强,根据地也日益扩大。

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基层组织的不懈努力,尽管侵华日军表面上在华北地区占领了大量土地,但是控制的区域在大部分时间都仅限于点和线,却很难实现对所占区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际控制权。这些都充分回击了侵华日军和部分国民党人员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权所谓“游而不击”“占领地盘”的污蔑之词,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广泛地群众性游击战战略的正确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日军深感在日军占领区内,“特别是晋北、晋东和河北及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共军无论是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①这与1939年之前侵华日军对“治安战”的盲目自信和对中共抗日武装的轻蔑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由此,1940年度侵华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便完全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了领导华北敌后战场进行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①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227页。

青春的幻灭与罪责的省思

——中藁英助《第一次公演》的战时与战后

仲咏洁

内容提要 沦陷时期曾旅居北平的日本作家中藁英助因其自觉的罪责意识而在战败后四十一年间不曾造访中国。所谓的“罪责”源来有自。一则,是他自认为未能给予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中国友人陆柏年以帮助;二则,他在战时凭《第一次公演》参加以“建设大东亚”为主旨的“北支那文化奖”征文活动并获奖。面对中日敌对的政治世界,他在以现实中不辞而别的陆柏年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营构了两国青年友好的文学乌托邦,而这事实上与当时日本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理念形成了暗合关系。战后,中藁在以此为底本改写的作品《烙印》中,以病变初现的隐喻交代了自己由麻木到复活的知觉觉醒。此后生涯,他不断在北京题材系列作品中书写个人青春幻灭的物语,以具体的人之友爱为基点来反思抽象、空洞的口号,以直面自我的勇气、主动而外向化的内省试图召唤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人对战后责任的自觉。

关键词 中藁英助 《第一次公演》《烙印》 沦陷时期 战后责任

作者简介: 仲咏洁,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

早年曾在沦陷时期的北平学习、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中藁英助(1920–2002)在战后留下了以这段生活经历为蓝本的北京^①题材作品群。其中,中国友人、后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抗日青年陆柏年是其叙事的核心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战时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第一次公演》及其战后改写之作《烙印》成为理解中藁战时战后思想变迁的重要视角。对此,迄今为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孤立文本的内容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前后变化以及后知史实与文学虚构的对应关系等,而对作品的载体和问世方式、作品群中不同体裁间同一主题的多样化表达,以及创作与事实的发生顺序之先后等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弱。立石伯、田中益三、杉野元子、户塚麻子等诸位前贤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和专题作品论视角,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命题。本文拟在战时与战后贯通的视域下,将上述两篇小说置于历史生成脉络中,兼及作者的战后相关活动、言论和创作,以此探讨沦陷区日本文学家的

^① 本文所引相关文献中出现的“北京”实则“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北平”的改称。若均以“北平”置换,则不符合历史史实。有鉴于此,本文引文均以原文“北京”录入,行文则使用“北平”,以示区分。

政治时局因应心理及其以战败为契机而产生的精神流变轨迹,并为思考战后责任^①这一重要议题提供一个个案视角。

一、“战犯”身份与羞怯心理:从战后回望沦陷北平

作为一位将八年之久的青春时光留给中国的外国人,中藺英助有足够的理由重访“故乡”,重会旧友。然而,1982年1月末,当中藺得知昔日好友、曾经的沦陷区同时代作家袁犀早在一年多前便逝世的消息时,他认为自己已无回去的理由了:“我虽然也很怀念(中国),但真正想见的朋友都已不在人世,谁也不在那里了。”^②约一年后,另一位好友原通久因病入院,中藺探病归来“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③毋宁说,中国友人与同道朋友的渐次离去,使中藺感到,若一再推迟回到中国的行程或将造成永久的、无可挽回的遗憾。但解开心中的郁结需要理由与契机,他无法随意推翻战后一直以来践行的作为赎罪的不回中国之信念。直到这一年的九月中旬,他在东京观看了在日本公演的话剧《茶馆》后,才真正开始为自己“解结”。关于这一契机,有相关记述如,“池袋阳光剧场帷幕拉开的同时,北京的天空‘哨——’地划过鸽哨之声。(中略)近四十年后再次闻此凛然之音,我想我终于能够以沉静之心重访中国了。”^④又如,“实话说……我之所以鼓起勇气来这里(指中国),是因为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团在池袋的剧场演出,老舍的戏剧《茶馆》。(中略)然后,就有鸽哨‘哨——’地划过天空啊。但我想,注意到这鸽哨的观众有几人呢。”^⑤而在与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实谈及“北京人的娱乐”时,他也回忆道:

“还有鸽子。七十年代末,我在阳光剧场观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时,当帷幕拉开,可以看见茶馆外的天空,空中传来“哨——”的鸽哨声。闻此,一种‘啊,是北京啊’的情绪涌上来。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都认为自己再也不要回北京、没有回资格了。(中略)尽管一直有这种想法,但就在那时这种固执的心情消解了。我们在那里呼吸着同一种空气一起生活过,好想再回去看看啊。这也就成为四、五年后我去

① 关于“战后责任”一词,武井昭夫在1956年提出“因回避战争责任而开始的战后责任”,强调其与战争责任的密切关联;高桥哲哉则在1998年将“战后责任”解释为“应答的可能性”,重视对亚洲诸战争受害国的回应性。而中藺英助在2000年谈到,“我站在欲承担战后责任的立场上,于60年代至70年代的十年间,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亚非作家会议文学联合活动。”(引文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这里中藺所谓的“战后责任”,在呼吁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人自觉承担战后责任的意义上,兼有武井和高桥所言的两层意思。武井昭夫『戦後の戦争責任と民主主義文学』『現代詩』1956年、第3卷、第3号、7頁;高桥哲哉『戦後責任』再考(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1998年8月15日)、高桥哲哉著『戦後責任論』講談社、1999年、23頁;中藺英助『戦時下北京から五十五年を経て』、杉野要吉編著『交争する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淪陥下北京1937-1945』三元社、2000年、56頁。

②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11月25日、64頁。

③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7月22日、64頁。

④ 中藺英助『鳩笛の空』、225-226頁。

⑤ 中藺英助『鳩笛のない空』(『中央公論』1988年3月)、中藺英助著『北京飯店旧館にて』講談社、2007年、14-15頁。

北京的契机了。”^①

若从上述引文中提炼关键词,可以得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茶馆》——中国(北平)——鸽哨——不回中国的信念动摇(固执的心情缓和)——以沉静之心重访中国。老舍的这部以北平为舞台的话剧自然会让人回想起旧北平城的生活,而作为此地的风物与标志之一,鸽哨声成为怀念曾经的切入点也不足为奇,但纯粹的声音何以令听者决定回来看看北平。它作为回到过去的时光机器,是否承载了某种特别的意义。在《“何日君再来”物语》连载中提及最初观看《茶馆》一事时,中藺更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心理活动:

舞台正面,是北京澄澈的青空。下一个瞬间,我凝神倾听。听见了茶馆房檐外青空中鸣响的鸽哨声。

在鸽子的脚踝系上葫芦或竹子做成的笛子,当鸽子飞起时,便会发出“哨——”的声音,这是以欣赏笛声为乐的鸽哨游戏。我与在上海被杀的友人陆柏年一起听过这声音。

“前门外这个地方有洋钱或铜钱的交易所对吧。那儿的伙计通过鸽哨的音色通知总店市场价格。那是这个游戏最开始的功用。”

这是陆柏年与我一同走在前门外繁华的街道时告诉我的。

我之所以来看《茶馆》,或许是想来见群众剧中可能出现的陆柏年吧。

(中略)

《茶馆》结束的最后一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解放后的中国。话剧落幕时,当时上海电影界的黄嘉谟、话剧界的陆柏年,还有周璇他们实际上都已不在了,这种痛切之感涌上心头。^②

话剧中的北平是中藺所思念的,而他之所以对鸽哨情有独钟,是因为它隐喻了已逝的友人陆柏年——后者告诉他这一风雅玩法的最初功用,因而不难想象,这种声音实际上唤醒了关于朋友的鲜活记忆。而他迫不及待地去看《茶馆》,则是在似曾相识的场景中寻找已传言被日本宪兵杀害的陆柏年,即在同一天空下生活过的“我们”中除了自身以外的所指对象。战后多年,尽管中藺有意避开中国,但与友人拥有共同回忆的事实不曾改变,也正是这种复苏的情感链接让他开始不再执拗于自我惩罚,而是直面想要回到作为“故乡”的他乡这一心灵渴望。

此处有意将材料倒置的原因在于,《“何日君再来”物语》系列连载之后,中藺在自述或向他人解释回中国的契机时,仅提鸽哨,不再同时提及陆柏年(即便是在1987年重访中国后亦是如此)。可以说,前者包含了后者之于答者的意义。与此同时,这种意义似乎又是难以明言、甚至羞于启齿的。并且,尽管《茶馆》中鸽哨之景令他决心重访中国,却仍难完全消除其心中

① 竹内実、中藺英助「われらが中国心象地図」『世界』1996年、第623号、309頁。

②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9月16日、51-52頁。

将不回中国作为惩罚的顾虑,这一心理在《“何日君再来”物语》连载随笔中也有所体现。中藺曾为解开“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谜而去信黎锦光^①询问,当他从后者处获知“何日君再来”作曲者刘雪庵的地址后,一再拖延未给刘氏写信,而观看《茶馆》后,则“像是被北京秋空中鸽哨的乡愁所驱使一样”,^②即刻写了向对方确认词曲作者身份的信件;一年之后收到回信时,却又“等他回信,我就实施去北京的计划,这样的话到了唇边又被我吞回去。”^③实际上,在收到第一封刘氏说明自己是词曲作者的回信之前,中藺已从黎氏处得知不同于此的消息,即“刘雪庵作曲,黄嘉谟作词”,也就是说,无论第二封回信内容如何,他都有必要回一次中国以向当事人取证方可得出最终结论。然而,收到对方要求寄送黄嘉谟相关材料的回信后,他仍旧选择等待第三封回信而非启程前往中国。即便最终“暗自决定,等回信一到就去北京。不,不是等回信到了再去,而是一定要去一趟。”^④但不久后中藺便获知刘氏逝世的消息,向作曲者本人求证的愿望落空,同时也失去了重返中国最有力的外在理由。

两年后,中藺在朋友的邀请下为制作“何日君再来”的纪录片作预备采访而重返中国时,其隐于心中、使自己难回中国的心结也并未完全解开,只是因为采访的工作要做,才使这种心情多少有所减轻。^⑤如此看来,调查这首歌的经纬以及现场采访的需要,间接地为中藺重访中国提供了缓冲带,使其在不完全的心理苛责中踏上一直回避的大陆。可以说,“何日君再来”成了打开中藺战时中国回忆的钥匙,而鸽哨作为记忆之门打开后的绕梁余音,它所唤醒的乡愁深处,半掩着陆柏年的面容。此处在进入核心问题,即中藺英助在回避什么之前,且听听他的自白。不同于因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良好状态而日渐增多的互访旅游团或私人游,中藺却还未曾回过大陆,这不禁让许多人困惑。对此,他回答说,“在中国度过了八年青春时光的我没法像许多蜂拥而至的团体游游客那样兴奋地故地重访。(中略)或许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无法以沉静之心回到心中的故乡那种羞赧与踌躇。我是有着一旦降落北京机场,便想跪在黄土大地亲吻它的乡愁的。”^⑥“无法以沉静之心回到中国”是中藺针对这一问题的诸多回答中最为常见的,且其中的“沉静之心”多用片假名“シズココロ”以示强调。要言之,上则材料可概括为“中藺因羞赧与踌躇而无法以沉静之心重访中国”。

对他来讲,中国“是自己度过整个青春的国家,是不消除羞怯心理无法驻足的土地。并且,若是回到那里,必是要清除所有执拗,宛若流放远方小岛的罪犯回到祖国一样,要跪下轻吻大地。”^⑦在这句类比中,“罪犯”的身份与羞怯的心理在中藺这里关联在了一起。十年后,他

① “夜来香”词曲作者,这首歌的原唱李香兰也是“何日君再来”的演唱者之一。

②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9月30日、60頁。

③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11月11日、63頁。

④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7年新年特別号、66頁。

⑤ 中藺英助「鳩笛のない空」、12頁。

⑥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11月25日、64頁。

⑦ 中藺英助「鳩笛の空」、225頁。

谈到一直认为自己无资格回北京的事,而“有的朋友战败后许多年没有回国,却是与解放军一起战斗去了。他们才有回中国的资格吧。特别是因为我的中国朋友、话剧活动家陆柏年在上海被宪兵队杀害而我未能帮助他。”^①这段坦白提示了两个问题。其一,中藺认为,尽管作为曾经的攻入方,那些后来参与了中国战后建设的日本人已“立功赎罪”,因此可以平等、自由地去往中国了;而决意回国写小说的自己却未能如此,故与之相比,他是没有资格回去的。其二、陆柏年被日本宪兵所杀,而自己作为他的日本朋友却无能为力,并为此感到自责。然而,倘若这是中藺感到羞赧与踌躇的原因,未免稍显牵强。因为其战后活动显示,尽管避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仍致力于承担战后责任、以罚赎罪,只是以例如创作、活动等非直接参与中国战后建设的方式呈现;而获知陆氏在上海逝于狱中则是在日本战败时、已不知其所踪近一年之后,帮助之言不过妄谈。但后者之死于他而言,确是难以接受之事实,以至于他“想尽可能到现场确认此事的真伪,这一愿望难以拂去,而不是因为怯于战犯意识不敢去(中国)。”^②矛盾的是,恰是这种想要确认真伪的心情使之难以以“沉静之心”故地重游,换言之,陆柏年之生死及遇害经过与中藺心中最大的困惑相关联。并且,这种困惑在前者被杀的现行结果作用下变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驱使他回去查明真相,又使他因害怕真实而徘徊。

二、《第一次公演》:与“大东亚共荣”话语的文学暗合

综合相关资料,大约可梳理出陆柏年与中藺英助的交往经过:1942年,南北剧社成员陆氏出演由《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检察官》,中藺作为《东亚新报》文艺部记者为采编新闻而观剧并写下剧评,随后与前者相识;1943年6月,中藺观看陆氏出演的特列季亚科夫戏剧《怒吼吧中国》,不久后者离开北平;同年8月,中藺执笔以自己 and 陆柏年为原型的小説《第一次公演》,10月完成。^③这部小说探讨了中日战争时期敌对两国青年间的友谊能否成立的问题,概要如下:《亚洲新报》文艺栏目记者、日本人早坂顺三经由满洲出身的呼树田介绍,拜访其所在的新华北剧社后,与该社导演兼演员杨孝年相识,其后说服本想退出剧社的杨氏,促使他做出“最后的努力”、决定出演《怒吼吧中国》,尽管演出不很成功,但他重拾信心、准备东山再起。有论者认为,杨孝年主演的话剧虽旨在“抗击英美”,实则借西讽东,暗含“打倒日本”之意,以示他的抵抗态度,作者应是为通过审查,方取此策;^④也有研究者从杨孝年坚持话剧的艺术性而非政治宣传这一点上,肯定作者在当时的言论环境中,因不能直接表现主人公抵抗

① 竹内実、中藺英助「われらが中国心象地図」、309-310頁。

② 中藺英助「鳩笛の空」、224頁。引文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③ 杉野元子「二つの青春——中藺英助と陸柏年」、杉野要吉編著『交争する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淪陷下北京1937—1945』三友社、2000年、139-158頁;中藺英助「精神の残留孤児」『朱夏』2000年、第15号、24頁;中藺英助「青春の墓碑銘」(旺文社文庫『ゴゴリ』、1971年11月)『朱夏』2000年、第15号、56-61頁;中藺英助「わが友陸柏年との新たな死別」『新潮』2000年、第97巻、第9号、150-157頁参考。

④ 立石伯「二つの青春——淪陷区・北京の鬱屈と飛翔」、立石伯著『北京の光芒・中藺英助の世界』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ー、1998年、31、32頁。

日本的苦闷心情而作的折中努力。^①两者都主张当时中藺面对日本当局的不合作态度、在言论表达层面的难为之处。另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仅从小说内容来看,无法判断杨孝年有抗日倾向,或许作者对审查有所顾虑,不能直接刻画人物性格,但这并非作品主要议题。^②如果将对日姿态分类,暂且用“亲日”“不抵抗”“独立”“不求和”“抗日”来表示各种情况,至少在以上诸位论者看来,中藺英助对战时日本当局的态度更接近于“不求和”。正如戸塚麻子指出的那样,对于作品焦点的错位判断将得出并不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她在做此评价的同时又未举出具体论据,因此下文尝试重审这篇小说,以期进一步推进对其主题及政治倾向的探讨。

作品中,杨孝年由于对燕京剧社仅排演无意识形态倾向、无理念的爱情悲剧感到不满,转而到新华北剧社当导演。但当早坂反问新剧社是否有新理念时,呼树田接话大讲“彻底排斥西欧、特别是英美思想,复兴东洋精神,为东亚民族解放与中国建设而努力”的话剧理念,以及立足于“大众启蒙”“政治宣传”的剧社定位,杨孝年则保持沉默。^③当社长王毅打算安排电影演员沈小姐在剧中演唱以增加话剧宣传效果、达到营利目的时,注重话剧艺术性的杨孝年因此与之产生齟齬,扬言若坚持如此,自己则选择辞职。以此矛盾冲突为导火索,小说进入早坂劝说杨孝年不要离去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一次公演》脱稿前这部话剧在当时的中国上演情况^④来看,现实中,人们对这部原本意在反帝国主义的话剧有着不同语境下的两种理解——“反英美剧”和“借西讽东”的“抗日剧”。上文杉野元子之所以认为杨孝年具有抗日倾向,其根据便是主人公的人物原型陆柏年实际参演的是抗日剧,然而其论据却来自中藺英助战后作品中的相关描写以及事后对于陆氏的调查。在小说中,杨孝年的立场并不明晰,其沉默意味如何亦需进一步辨析。在与杨孝年仅有一面之缘的早坂看来,他们彼此间是有友情的,只是因为“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六年间,前者在思想上一直处于混沌、彷徨状态,但现在他从这种挣扎中挣脱出来,想在新时代、新中国祈求着什么。(《公演》-1:154)此处的“新中国”即指于是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七七事变”之后一直处于迷茫状态的杨孝年选择在这个节点试图做出改变,其个人与“新中国”一致的步调令早坂对他怀有好感,他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朋友,此处暗示了杨孝年的亲日倾向。因此,当呼树田来请早坂当说客劝说杨孝年时,早坂觉得,剧社之事无关紧要,将对方看作自己的中国朋友与之谈心方是要事。

① 杉野元子「二つの青春——中藺英助と陸柏年」、140頁。

② 戸塚麻子「境界線と越境——中藺英助の習作群をめぐって」『アジア遊学』2013年、第167巻、246頁。

③ 中藺英助「第一回公演」『北支那』1944年、第11巻、第1号、146頁。这篇小说原分两次载于杂志《北支那》1944年1月号 and 2月号。后文引自同篇小说1月号者简注为《公演》-1, 2月号者简注为《公演》-2, 并随文标注页码, 不再另注。

④ 星宏修「中国・台湾における『吼えろ中国』上演史:反帝国主義の記憶とその変容」『日本東洋文化論集』1997年、第3号、23-58頁。同时,杉野元子的《两个青春——中藺英助与陆柏年》一文在这个问题上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

尽管如此,早坂对杨却并非无半点怀疑。例如,对于杨孝年关于话剧艺术性的坚持,“暂且不论沈小姐的事情,杨孝年对《怒吼吧中国》抱有纯粹的、艺术性的导演热情吗?”(《公演》-1:154)言外之意,杨孝年是否另作他想。“若是他一心想从混沌中走出来,真的想全身心地投入这新时代、这部戏剧中,以获得生存的价值的話……啊,这真是麻烦。这与这部戏作为宣传剧同时也被谋划成营利剧的剧社意志完全相反。”(《公演》-1:154)小说中的《怒吼吧中国》这部话剧作为政治宣传剧的性质是无疑的,从故事发生在距公演仅剩两周时间的节点来看,沈小姐意外出现之前,杨孝年已在为剧社的第一次公演做准备。在早坂看来,以艺术为重的话剧无法起到宣传与启蒙的作用,但能够使人产生共鸣。而能够让观众与演员情感共振,则更利于烘托作品主旨,果真如此,早坂所担心的便是杨孝年的抗日用意了。相较于与王社长的不合,杨孝年向早坂倾诉的则是对《第一次公演》只是一部宣传剧的不满,又说不管是什么剧他都演演看。这引起早坂更大的怀疑,并因此而对杨孝年生出生憎恶之情:“杨氏不是明说了吗。不管话剧是否以消灭英美为主题,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说,他那里不是完全没有他们自己所宣扬的作为东亚民族的共鸣与共感吗。他的所谓救赎还不至于与之相连吗。”(《公演》-2:93)但“不论什么主题都没有关系”这一说法同时也抹杀了杨孝年作为抗日青年的可能性。

早坂在生出“杨孝年与自己永远不过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悲哀之同时,又通过强调杨孝年与自己只见了第二面便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事实,以及由此对他产生的信任感来安慰自己。回想起杨氏在事变之初对日本人的敌意,而后的漠不关心与好奇,到现在对希望的寻求等等这些杨孝年精神上长期的挣扎,早坂竟有痛心之感。甚至,当杨氏经他劝说后放弃辞职、留下成功出演了《怒吼吧中国》时,早坂再次扑灭心中的疑惑之火并说服自己:“他(杨孝年)想通过这部戏剧寻求什么、说什么呢。为民族的黯淡命运,还有如今以真正作为东亚人的自觉,为东亚的黎明以及新的理想之崛起而呼号吗。不,我只要看到他拼命为此次的演出付出全部精力的事实就足够了。”(《公演》-2:112)就这样,早坂有意避开了直接对杨孝年亲日/抗日身份的追究,并不断打消自己的疑虑,而将重心放到他们的友谊是否能够成立的命题上。劝说过程中,有一段奠定了他们友情基调的告白:

“但是早坂先生,当然你是日本人,但也是青年对吧。对,就是青年。你和我同年吧。我也是青年。青年同志间的心是相通的。年轻的感情、精神都应该是相通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够通过我们敏锐的、强烈的感受性来感知在其他年代或社会不通用的、甚至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情。难道不是有超越一切、属于青年的语言存在吗!”

杨边从口袋中掏出铅笔,打开本子,将“青年”二字写了几遍,并圈上圈,打上重点号,最后几乎高声叫着说道。(《公演》-2:94)

“青年”这一在时间上以年龄来划分人群的概念超越了地理意义上国家的界限、抹消了因国籍及文化带来的不同,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无缝对接,并为彼此展开对话提

供了基础。尤其是,这段话出自作为中国人的杨孝年,而非早坂,作者似乎意在向读者表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感受,而非日本人强人所难或自己一厢情愿。得到对方如此的信任,早坂展开了对杨孝年的劝说:批判他逃避、厌世与自暴自弃,认可他曾经的努力、自“卢沟桥事变”六年来正视事实的勇气,鼓励他直面丑陋的现实、继续刚刚开始的新道路。而当杨孝年表示要做“最后的努力”时,早坂感到“彼此的友情如奔流一般浸透全身”(《公演》-2:98)。即便到了演出当天,早坂仍旧担心杨氏可能会离去,“那将是可怕的。对我个人来讲亦是如此。那将意味着,我失去了这段时间以来刚交到的能够敞开心扉谈心的中国青年朋友。但是如果他努力过了,那么自己就全心祝愿他的前途(美好)吧”(《公演》-2:99),从而试图站在朋友的立场理解对方的选择。而当杨孝年顺利出演话剧并向早坂宣告“早坂先生,你看,作为像样的中国人,我相信自己现在有了与你成为真正朋友的资格了”(《公演》-2:112),此时,早坂此前单方面渴望的友谊终于在对方的呼应下成立了。最终,是杨孝年做出了让步,出演了这部政治宣传性质浓厚的《怒吼吧中国》,他也因此成为宣扬“大东亚战争”的一员。至此,想要离开“和平地区”、逃避现实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的劝说下,在“新中国”与日本站在同一条战线时找到了与其一致的“新的希望”,敌对中日青年间友谊的存在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理念形成了暗合关系。

实际上,这篇小说是杂志《北支那》^①为纪念创刊十周年而举办的“北支那文化奖”有奖征文活动获选作品。主办方以“北支蒙疆居民”为征稿对象,并要求来稿小说“取材于以北支蒙疆为中心的大陆且未发表”,“期待对建设大东亚充满热忱的人士踊跃投稿”。^②毋庸赘言,征、投、选均在这三重限定下进行。评审人之一、与当选者多有交游的诗人坂井德三评论说,“中藺英助的作品与从东京一带来北京一瞥而写就的那种(过去大量流行的)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脸颊沐浴着蒙古风的尘埃、气息和浪漫,这正是其作品的美好和前景所在。”^③17岁(1937年)便入“满洲”、在伪满洲国经济部任下级官吏,19岁任职于“蒙疆”张家口的铁道局日本社员功绩调查科,20岁到北平、在坂井介绍下任国策报纸《东亚新报》文艺记者,同时得钱稻孙赏识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作旁听生,而后在此开启了文学创作的生涯,直至战败。^④中藺

① 1934年至1944年由天津的北支那经济通信社发行,主编兼发行人高木翔之助主张“满蒙独立”“冀东自治”。从杂志刊行时期、时长,以及主编立场和刊文性质来看,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份与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日本官方步调一致的刊物。杂志部分细目参见戸塚麻子『『北支那』細目』(1942年1月-1944年6月)、『論潮』2018年、第11卷、69-99頁。

② 「＜社告＞『北支那』創刊十年記念 北支那文化賞贈品作品募集」『北支那』1943年、第10卷、第8号、57頁。论文类征稿要求则更为露骨,要在“东亚共荣圈政治重组的构想”之主题下,“对今后应当会被组织起来的圈内诸民族或国家各自的统治方式,以及对国家或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的具体研究,以可资当权者之参考为意。”而另一个十周年纪念活动则是“北支那皇军慰问队的演出慰问行”。「＜社告＞『北支那』創刊十周年記念 北支那皇軍慰問隊の演芸慰問行」、『北支那』1944年、第11卷、第6号、8頁。

③ 坂井德三「選後評」、『北支那』1944年、第11卷、第1号、158頁。

④ 中藺英助「年譜」、中藺英助著『定本彷徨のとき』批判社、1993年、336-337頁。

英助的大陆履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达恐怕是打动选评人的关键之一。而另一位在评审人中位列第一、此前亦与获选者有过接触的林房雄勉励道，“愿君将此荣誉当做激励，早日向中央文坛扬帆起航。”^①与1940年到北平、先后于兴亚院和北支那开发调查局任职并长居于此的坂井不同，此时的林氏作为“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文化使节”在沦陷区活动，以期加强日华文学交流，同时给予当地日本文学活动、文化活动以反省的机会。^②主办方的邀请人选择与受邀人的指导者姿态，暗含着向“中央”——东京靠近的意味。

对此，中藺却回应说，“少年时代的某段时期和成年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都在大陆度过，这样的我不太能够理解所谓当地文学或东京中心主义这样的说法”，^③他对林氏之辞的不以为意显然根植于坂井式的赞誉，之所以与后者看法趋近，盖因两者相似的移居华北经历。^④不过，他接着转而表示，“若是如今仍要作此区分的话，希望我们的文学与文学运动快速成长起来，与大的日本文学之创造实现合流发展，这才是我的夙愿。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还能在此地从事文学创作，对我们来讲很了不起。所以，我时常在想，面对剧烈动荡的巨大现实，即便失败也好，也想竭尽全力去应对。”^⑤如果说“大的日本文学之创造”在中藺这里成了弥合“当地文坛”与“中央文坛”间细微裂缝的存在，那么，“如今”“风云变幻的时代”，“剧烈动荡的巨大现实”就是促使两者合而为一的实际推动力。具体到1943年的日本，军事上在诸多战场接连失利和败退；政治上与各东南亚国家签订同盟条约、以承认民族独立换取对方支持，发布“大东亚共同宣言”；在文学领域与之呼应的则是召开“大东亚文学家决战会议”。在这种语境下，中藺出于“即便失败也好，也想竭尽全力去应对”而写就的小说恰好为此日本胶着却不惜最后决战的局面作了注脚。于是，《第一次公演》这部获奖作品不论在“建设大东亚”的征文框架中，还是在从文学层面回应“需要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盟友”^⑥之现实需求上，都不可避免地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密切相连。

三、“时造”、国造抑或人造：极端语境下的困境与选择

若对照现实，会发现，《第一次公演》整部小说中贯穿了作者的期盼或想象。如前所述，当

① 林房雄「選後評」、『北支那』1944年、第11卷、第1号、158頁。

② 陈言：《从战地记者到“文化使节”——试论林房雄在日占区的角色转换及其中国观》，载《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第89页。

③ 中藺英助「感想」、『北支那』1944年、第11卷、第2号、95頁。

④ 中藺英助反抗父亲希望他入学旧制理科高中的意愿，以入中国大学为志。坂井德三则早年参加“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他的讽刺诗集《百万人的哄笑》（1936年5月）遭到禁售处分，坂井被拘留，保释出狱后，来到华北。戸塚麻子「坂井德三『北京の子供』と児童文学——日本占領下北京の日本語文学」『教育研究実践報告』2017年、第1卷、第1号、165-166頁参考。两者都将中国大陆视作不同于日本本土的另一处谋生之地，而这种想法与日本不断推进的侵华战争恐怕难脱干系。

⑤ 中藺英助「感想」、95頁。

⑥ 中藺英助『何日君再来』物語『世界週報』1986年12月9日、62頁。引文着重号为原文作者所加。

中藁得知陆柏年离京的消息时,后者已不知所踪。于是,他执笔写出上述作品,在文中不断表现失去友人的担心、自责与恐慌。在与杨孝年仅有一面之缘的早坂看来,前者若是离去,则是“自己作为旁观者未有作为”(《公演》-1:155),因此他肩负重任般决定劝说对方。现实中已失去的变成了此处的尽力挽留。而当杨孝年执意离去时,早坂又觉得“自己即便如此苦心劝说,他似乎仍乐于玩弄着自己的软弱无力”(《公演》-2:97),因而对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憎恶之感。杨孝年的固执让早坂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对方似乎马上要离开的担忧让作者联想到既成的现实——“愿意走就走吧!”(《公演》-2:97)这种无奈仿佛又是对陆柏年不辞而别的愤怒,即便是杨孝年被说服,早坂仍无法消除若是他离开的恐惧。通过书写早坂与杨孝年友谊的成立,中藁试图让自己相信,陆柏年即便离开,他们之间仍然是有友情的。

小说中两者的对话基于“青年”的共同属性得以展开,而现实中,他们在东安市场二楼的吉士林咖啡厅见面,陆柏年问的却是:“中藁先生,你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吗?”^①他在纸上写下的不是“青年”,而是“人类”两个字。^②早坂有意避开对杨孝年抗/亲日身份的追问,正是中藁在现实中未正面回应陆柏年的提问,而是“仅将彼此看作是可相互理解的青年这种暧昧的友爱关系,以消除避开问题的怯懦情绪”^③在小说中的表达。用中藁自己的话说,即“然后,我像是亲自再次确认似的,还将这种理解写入了《第一次公演》中。小说中并没有暗示陆柏年私下考虑借西讽东的艺术手法、借欧美的历史事实以讽刺东洋鬼子的意图,只是我直觉地害怕陆柏年身份公开化并试图掩盖其真相。”^④在对用殴打的方式“解放”对方的亚洲观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中藁与陆氏成了朋友,这一现实似乎给出了答案,他相信,“中日青年友好”即便在敌对的中日两国间依旧能够成立,进而,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友好与共存”也是可能的。只是,当陆柏年于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逝于狱中的消息传到北平时,这种愿景随之被打破:“当时,我感到大厦的水泥床在晃动,自己的青春也降下了宣判死刑的帷幕。因为,或许我们基于青年间的语言而相互理解,但我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站在人类的立场上。”^⑤中藁所受的震荡来源恐怕是多重的。即便不愿直面陆柏年的真实身份,但他真的是抗日青年;由个人间的友好推及民族间的友好,进而认同日本当局所宣扬的“民族共荣”,这一信念在朋友被同胞杀害的现实结果下破碎;陆柏年之死将中藁被迫推向了相反的罪人立场。疑惑之后选择相信的却被证实是假的,曾与国家站在一起不想竟成为侵略合理的共谋者,更何况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便是自己的朋友。自我否定与愧疚的叠加宣告了以敢于质疑现实、对未来充满好奇以及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为标志的青春的幻灭。

① 中藁英助「青春の墓碑銘」、87頁。

② 中藁英助「帰燕」(『群像』1995年9月号)、中藁英助著『帰燕』講談社、1996年、200頁。

③ 中藁英助「帰燕」、201頁。

④ 中藁英助「帰燕」、201-202頁。

⑤ 中藁英助「帰燕」、203頁。

讽刺的是,若是日本战败稍晚几日,中藺则会因与陆柏年的交往而被特高课逮捕。^①如果说中藺英助在痛心之余又被泼此冷水,那么真正使这一切冰封的便是被遣返时所见之情形了。日侨撤退时,放弃了因通货膨胀而变得毫无价值的华北通用纸币联银券,并将它们插在收容所的铁栅栏上,任其在无情的风中沙沙作响,正是这一与中国诀别的时刻,陆柏年的演技再次给中藺留下深刻印象。^②因为联银券使后者联想起与前者初次相识时他在《钦差大臣》中的表演——陆柏年扮演的检察官从袖口掏出当地土豪劣绅们贿赂他的联银券,悲痛万分、高声叫道:“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哪!”^③原本相信这是一部“在中日两民族作为‘同甘共苦的共同体’一同向前推进的大东亚战争中,猛烈地揭发因私利私欲而由内部开始腐蚀的贪官污吏的、令人感动的话剧”,^④而当日本战败、日侨被遣返回国时,实际上这部戏剧的主旨异常鲜明地凸显,换言之,此剧“并非反权力的讽刺,而是——尽管是间接地——对战时当地流通的纸币背后之掌控者,即日军武力的强烈抗议和对抵抗的呼唤”。^⑤因此,陆柏年揭穿日本虚伪面的抗日形象也深入中藺的脑海,以至于他在战后选择以这段经历为底本将《第一次公演》改写成主旨迥异的《烙印》,以实现在战后文学道路上新的出发。

《第一次公演》中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的杨孝年到了《烙印》中变成了抗日青年陆,而成功劝说杨氏积极面对新现实的早坂顺三变成了目睹陆被宪兵逮捕的“小东洋鬼”天野时造,新增角色、天野的两位朋友贺川与长谷部则去往了中共解放区。可见,伴随着战败而明朗的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烙印》中人物角色的设定,杉野元子直接将主人公陆视作现实中陆柏年的化身^⑥恐怕不无道理。一方面,中藺关于创作原型的自述强化了这种印象;^⑦另一方面,以陆柏年之姓作主角之名,这种具有分寸感的表达实际上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户塚麻子认为《烙印》呈现了“我”与“陆”之间“对话和友情的不可能”,^⑧单纯从文本内容上来讲确实如此,然而,若是将这部作品放在小说改写史以及历史生成脉络中看待,那么就有必要对文本中穿插的战后作者自述部分作进一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烙印》中分别以战争末期的北平与战后的东京为主要叙事舞台、采用时间交错的创作手法便值得关注。

返回日本后不久,中藺因急性穿孔性盲肠炎而住院并接受手术治疗。小说中,天野时造在身体极度虚弱、对外在世界几乎无感、感到生命或将消逝的状态下,出于仅有的本能看着插有导管的右下腹部患口处,他由此跌入幻想的深渊——“是的。伤口露出与死亡相连的肉块,丑陋的、本能摸索的触角通过它只顾自向内、向内伸去。从那儿喷涌而出的幻想皆与过去

① 中藺英助「青春の墓碑銘」、86-87頁。

② 中藺英助「わが友陸柏年との新たな死別」、155頁。

③ 中藺英助「夜よシンバルをうち鳴らせ」泰流社、1978年、302頁。

④ 中藺英助「わが友陸柏年との新たな死別」、153頁。引文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⑤ 中藺英助「青春の墓碑銘」、84頁。

⑥ 杉野元子「二つの青春——中藺英助と陸柏年」、141頁。

⑦ 杉野元子「二つの青春——中藺英助と陸柏年」、140頁。

⑧ 戸塚麻子「対話と友情の不可能性——中藺英助『烙印』」『群系』2011年、第27号、66-67頁。

的一个世界相连,因为这是直抵黑色‘幻灭’体验的锁链。”^①中藺对过去那个世界的改观就是通过这种战后幻想式的思想重构来呈现的。他曾撰文谈及这部小说初版时为保持系列作品的体系而删去小说中穿插的战后部分内容,很长一段时间为此而感到十分悔恨,可见小说中的这一部分对于作者想要实现的对于过去的改观相当重要。

中藺在《烙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病情,“据医生判断,若动手术时间稍晚则后果不堪设想。但病情已恶化到相当程度却未引发盲肠炎,也是稀有病例。天野时造的情况似乎是,阑尾如熟透的柿子一般已全然腐化,但比如说因为过量饮酒而导致它并未破裂反倒石化。后又因生活上突如其来的变化,比如受到打击而急速恢复常态,阑尾随即裂开,脓液流入腹腔内部。插入导管即为了将脓液导出体外。”^②一般认为,生病是由于病菌侵入身体、免疫功能无力抵抗的外在表征,与健康状态相比,属于异常状态。但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天野其病并未外显。日本败色渐露时,中藺英助提前将与自己同住在北平的母亲与妹妹送到生活在“旧满洲”的姐姐家,希望他们由此地回日本,而自己则因为是新闻记者,免不了被召集参加最后的大陆决战,因此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于是将母亲留给自己的衣裳典当后便在无望中饮酒度日。^③看来,战败是意料之中,而无异于晴天霹雳的则是好友陆柏年死于狱中的消息,中藺也由此回到常态,病变初现。医生具有暗示性的病情解读“过去是异常的、现在是正常的”^④,对于天野来讲则意味着“‘战争中毁灭的、和平中复苏的’。比如知觉的麻木与复活。”^⑤在中藺看来,战时认为敌对中日青年间可能存在的友谊在战争中毁灭,战后重新认识到中日民族共荣的谎言;过去的侵略行为与认知是异常的,如今的战败与自我审视才是正常的;从恍若梦游般的生活中苏醒过来,开始如实地触摸现实世界。当然,这也是因为看到中日两国从“大东亚共荣”的美梦中剥离出,回到各自清晰的国境线内,而后有所转变的感知。因此,病的痊愈也意味着正确的认知与自主力量的恢复。

如立石伯所言,“对于天野来讲,与中国(人)体验相关的重要核心成为一生难以抹去的、刻在灵魂的烙印。同时,无形中印在这彷徨者灵魂之上的残酷烙印,可以说是提供生之力量的源泉所在,也展示了作者中藺英助的文学核心。他通过写作,多面向、多角度地阐明了这一烙印的意义。”^⑥更加确切地说,是疤痕背后整个青春幻灭的伤痛不断作用于中藺,使他不断书写处于其青春核心、作为抗日青年的陆柏年,反思毁灭这一切的战争,并通过战后活动来试图给自己因“罪责意识”而产生的炎症“消炎”。如此,中藺完成了在“时造”、国造或人造之

① 中藺英助「烙印」『近代文学』1950年、第5卷、第2号、72-73頁。

② 中藺英助「烙印」、72頁。

③ 中藺英助「離散と再会の歌——母、益代の生涯」(『母の友』1975年8月号)、中藺英助著『寄留者の歌』リブプロット、1988年、120頁。

④ 中藺英助「烙印」、72頁。

⑤ 中藺英助「烙印」、91頁。

⑥ 立石伯「ある季節と城——『彷徨のときの世界』」、中藺英助著『定本彷徨のとき』(解説)批判社、1993年、325頁。

间的选择转变。

四、结 语

尽管北平往事是中藺英助在战后文学创作、随笔或对话中常见的主题,但他却因自觉的羞赧和罪责意识而在战败四十一年后都不曾踏上回忆中的大陆。直到《茶馆》中的鸽哨唤醒内心关于陆柏年的尘封记忆,从而触动了他想要回到作为“故乡”之他乡的中国这一灵魂渴望;与此同时,因中国友人被日本同胞所杀害而带来的自责与羞怯也被触发。

实际上,中藺英助所谓的“罪责”不仅来自他自认的因“未能帮助中国友人陆柏年”而带来的“灵魂罪责”,^①还隐藏于他在战时曾以《第一次公演》参加主旨为“建设大东亚”的“北支那文化奖”征文活动并获奖一事中。虽然中藺自述这部小说以陆柏年为原型,但由于彼时他对后者的身份、去向等并不知情,因此并不能在后设视角下将主人公杨孝年等同于陆柏年,从而认为作者在当时严苛的言论管控下无法直白地表明杨氏的政治倾向,尽管事实上这种环境下的表达空间的确有限。毋宁说,作品中包含着中藺对朋友不告而别的疑惑、恐慌、愤怒和哀伤,他甚至通过构建敌对两国间青年友谊之可能,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对方。然而,正是如此个人层面的期望恰好与当时日本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理念形成了暗合关系。于是,无论在征文框架中,还是在从文学层面回应现实需求的意义上,《第一次公演》都不可避免地“大东亚战争”或隐或显地关联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陆柏年为日本宪兵所杀的事实将中藺英助彻底地推向了与自我期望、也与现实中陆氏希望的“人类立场”相反的方向。

战后,中藺决心“不依赖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旧文坛而开启自己的文学道路”,^②他在改写之作《烙印》中,将主人公陆明确塑造成抗日青年形象,同时也以病变初现的隐喻交代了自己由麻木到复活的知觉觉醒,而刊登了这篇小说的《近代文学》,其同人正是战后初期战争责任追究的发起者。不惟如是,中藺在其后生涯仍然不断书写个人青春幻灭的物语,以具体的人之友爱为基点来反思抽象的、无前提的“共存共荣”,并由此承担战后责任。相较于以“认知不足”“被骗了”为借口逃避责任、抑或位高权重却淡化责任等行为,中藺英助坦诚直面自己的勇气是可贵的。对比以被动的、内向化的战败责任认知敷衍来自外部的战争责任追究,主动的、外向化的战后责任自省是难得的。

① [德]雅思贝尔斯著,寇亦青译:《罪责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

② 中藺英助「戦時下北京から五十五年を経て」、56頁。

中心大事记

2024 年下半年

- 7 月 1 日 王广涛赴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访学两个月。
- 7 月 2 日 日本札幌大学校长大森义行一行来访,与中心研究人员座谈。
- 8 月 22-29 日 胡令远与中心原主任郭定平教授、中心资深兼职研究员臧志军教授、包霞琴教授访问德法两国,与法兰克福大学、法兰克福孔子学院、巴黎政治学院、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相关专家,就中日欧关系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 8 月 27 日 以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东海日中关系学会会长川村范行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中部学术访华团来访,与中心成员座谈交流。
- 9 月 9-13 日 中心主办系列主题演讲,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学部长加茂具树教授主讲,主题为“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与中日关系”。
- 9 月 12 日 中心举办题为“后岸田时代日本政局的变化”座谈会,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学部长加茂具树教授作基调演讲,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市日本研究专家出席座谈会,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 9 月 14 日 日本专修大学大桥英夫教授一行来访,与中心成员座谈交流。
- 9 月 19 日 胡令远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理念演进与实践创新”专题研讨会,做主题发言。
- 9 月 22-29 日 胡令远、王广涛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同事 6 人访问美国,与布鲁金斯学会、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及卡特中心等相关专家学者,就美国大选及中日美关系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访问团一行还拜访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新的世界变局与使馆人员分享了研究心得。
- 9 月 23 日 日本成蹊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国际课福田嘉雄课长来访,探讨交流合作事宜。
- 9 月 27 日 中心主办“日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 4 讲,武汉大学

-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清华大学博士黄贝老师主讲,主题为“日本外交研究的数据探索与量化分析”。
- 10月11-16日 胡令远陪同校党委裘新书记出访日本,裘书记与早稻田大学总长田中爱治、中央大学理事长大村雅彦、北海道大学总长宝金清博等,就进一步深化校际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裘书记与访问团一行拜访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与吴江浩大使就共同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一级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促进中日两国人文交流等进行了座谈。裘书记一行还访问了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与总领事王根华校友就促进北海道地区与上海的交流进行了座谈。
- 10月24日 中心主办“国际日本研究”系列讲座第2讲,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系系主任林明珠副教授主讲,主题为“东盟各国的日本研究:个性与共性”。
- 10月26-27日 中心举办“第5届中日青年学者论坛暨博士生工作坊”,主题为“日本研究的学科融合与知识共创”,来自海内外等近3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 10月28日 中心举办“日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5讲,东京科学大学教养研究教育院泽井勇海副教授主讲,主题为“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研究新动向—以‘公议’和‘公法’为中心”。
- 10月28日 中心举办“日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6讲,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石井弓副教授主讲,主题为“抗日战争记忆研究—来自日本的视角”。
- 10月30日 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顾问宋耀明先生主讲,主题为“中日经贸合作的挑战与机遇”。
- 11月1日 王广涛参加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并作发言。
- 11月2日 王广涛参加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地缘政治变局下的国际秩序与地区格局”研讨会,并作发言。
- 11月4-10日 胡令远与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同事访问柬埔寨、马来西亚,与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专家

- 进行了深入交流。
- 11月9日 王广涛参加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4年“南海论坛”,并作发言。
- 11月15日 新任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冈田胜大使访问复旦大学,胡令远陪同校党委裘新书记接待日本客人,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复旦大学与日本的学术与教育合作,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
- 11月19日 中心举办“日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7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潘钧教授主讲,主题为“东亚文化圈视域下的日本汉字及汉字研究”。
- 11月21日 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特别顾问、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委会委员王众一先生主讲,主题为“《人民中国》所反映的中日交往之‘历史年轮’”。
- 11月22日 王广涛参加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和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主办的“东方青年学人沙龙”(2024年第4期),并作发言。
- 11月23-24日 中心举办“第34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东亚:中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的近2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 11月24日 中心举办“长三角东亚研究工作坊第32次例会”,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邹韵以及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公共事务学院马藤出席并作报告。
- 11月25日 中心举办“日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8讲,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小林良彰名誉教授主讲,主题为“代议制民主主义的计量分析”。
- 11月27日 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蔡黎明教授主讲,主题为“汽车科技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 11月30日 王广涛参加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并作发言。
- 12月11日 王广涛参加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主办的第七届长白国关学者论坛暨“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选择”研讨会,并作发言。
- 12月15日 王广涛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中日学术高端对话“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及中日合作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发言。
- 12月22日 中心举办“长三角东亚研究工作坊第33次例会”,苏州大学社会

学院杨峻懿以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高燎出席并作报告。
12月28日 姜茗予参加“大变局·新定位·新作为——首届上海市社联国际
片学会超级年会”并作发言。

(张微晨)